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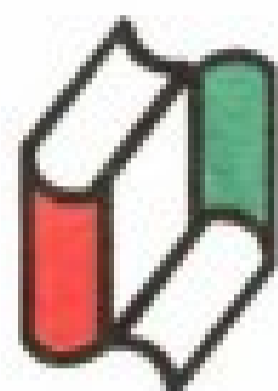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21 世纪的问题

[美] 克拉克·克尔 著
王承绪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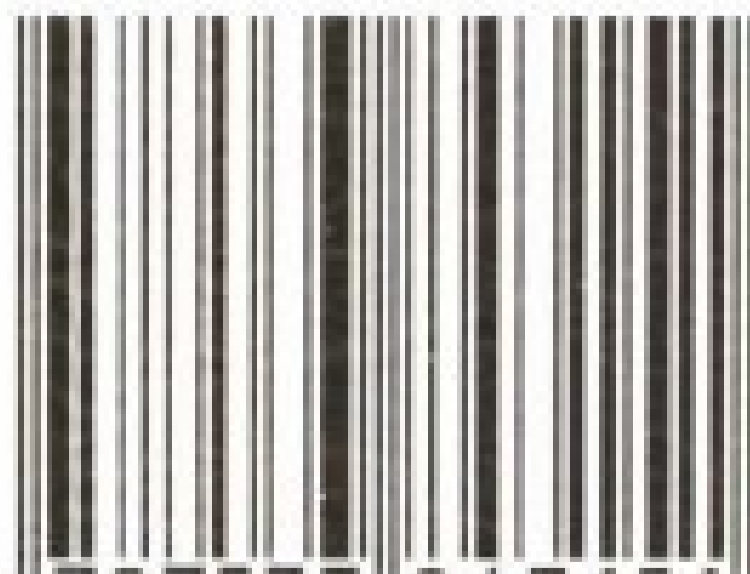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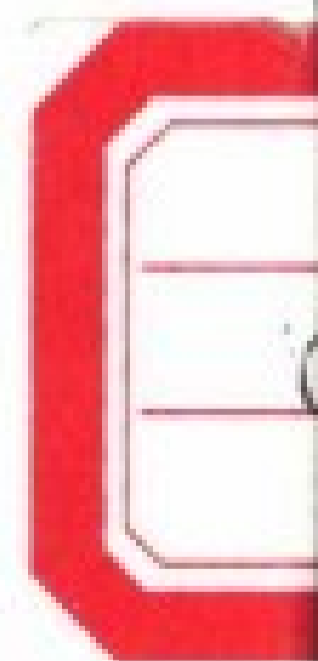
ISBN 7-5338-43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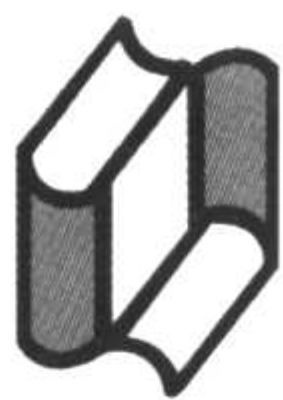


9 787533 843151 >

ISBN 7-5338-4315-0/G · 4285

定价：14.00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高等教育 不能回避历史

——21世纪的问题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美] 克拉克·克尔 著
王承绪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0371629

95
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 世纪的问题 / (美) 克尔
著；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2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4315-0

I. 高... II. ①克...②王... III. 高等教育-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944 号

责任编辑 周 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
——21 世纪的问题
〔美〕克拉克·克尔著
王承绪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5 字数 210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38-4315-0/G·4285

定 价：14.00 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苹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所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本书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原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多校区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博士的三卷本高等教育文集之一。这三本文集的第一卷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型：1960—1980》(1991)，第二卷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忧患时期：20世纪90年代和以后》(1994)，第三卷是《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1994)。第二卷在扉页后引用了“人生于忧患”的箴言。第三卷在扉页后引用了柏拉图《理想国》第四卷中有关教育的话：“一旦车轮已经启动，速度总是不断增加。”以及赫拉克里特斯的名言：“一切都是不断消长，没有东西停着不动。”

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先引进克尔博士的文集的第三卷：《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克尔博士在本书的自序以“主要的问题和趋同的解决方法”为题。全书提出了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1) 民族国家上升到主宰高等教育的地位，但是当代有一个回头走向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主义的运动。普遍主义正在前进，而且将继续前进。

(2) 在高等教育内部，坚持传统和要求变革之间的争夺，以及在变革内部要求优秀和要求平等之间的争夺，每一方都

在强化。作者提出了一个“高等教育的趋同模式”，作为目前解决各方面矛盾和冲突的合适的办法。

(3) 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道德行为，旧时的规范的控制作用削弱。作者认为需要新的规则和机制，用更加明确的契约和更加公正的学术法律制度取代行会的规范和实践。

(4)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使命和高等教育未来的课程发生争论。作者提出了具有几种模式和不断扩展的职能的“多元高等教育”模式。

全书主要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在一系列政治的和学术的斗争中所发生的转变，描述了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发展过程以及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长时期来，作者接受了赫拉克里特斯的名言“斗争是世界的公正原则”，认为斗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果成功地加以利用，它能有利于有益的目的。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完全自治过。

本书的书名采自林肯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本书所选论文的一个中心主题，意译林肯在同一个咨文中的话，就是教育是“人类最后和最好的希望之一”。为了人类幸福，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处于文明进步的前线。

本书是作者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内在一系列场合所发表的论文的选择辑。这些论文多数保持原样，有些论文做了一些澄清、修正和补充。全书除序和跋以外共分六编十四章。各编和各章都有引言，有必要的附录。六编的内容是：①民族国家与学习事业的国际化；②传统对平等和优秀；③高等教育机

构职能的分化和均质化；④知识的道德规范与新的学术文化；⑤使命和目的：众多的选择；⑥对未来的竞争中的各种想像。

作者指出，本书所集论文，特别和美国有关，也和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关。译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下列内容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第一编的高等教育界的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以及附录中的“教育中的全球观点”。第三编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趋同模式、1960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及附录“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摘要”。这个总体规划铺设了加州走向普及高等教育的大道，使加州全体公民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政策文献^①，而本书作者乃是这个规划的缔造者。创建一个多校区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系统是作者的重大成就之一。第五编的大学使命的重新审视、有关美国高等教育目的的讨论以及附录中其他有关高等教育目的的陈述。第六编对未来高等教育前景的设想。这些都值得我们研读和借鉴。

克尔博士出生于1911年5月，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做出了极大贡献，业绩辉煌；1952—1958年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1958—1967年任多校区加州大学校长；1960年制订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3年在哈佛大学发表戈德金演讲“大学的功用”；196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马歇尔演讲“马歇尔、马克思和现代”。1967年，加州大学董事会借口60年代的学

^① 罗思布拉特：《一个人对乐园的追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01年4月27日。

潮,免去克尔博士的校长职务。^①但他仍继续为美国教育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967—1973年,克尔博士任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1974—1979年,任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出版了多卷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著作;1990年,获马克格劳教育奖章;1996年,获加州大学校长奖章。从1952年到现在,克尔博士共获得38个荣誉学位。2001年5月,美国学术界为庆祝克尔博士90华诞,在伯克莱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隆重庆典活动;加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回忆录第一卷《学术上的胜利》。译者1985年访美期间,曾聆听他的演讲,记忆犹新。在《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中文版问世之际,谨向克尔博士致以良好的祝愿。

王承绪

2001年11月

^① 罗思布拉特:《一个人对乐园的追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01年4月27日。

序：主要的问题和趋于一致的解决方法

我曾经作为一个学者，而且作为一个参加者，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两个迅速变化的部门中。在这两个部门，我曾经有机会观察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每一次，由于国际接触增加，由于全世界技术变得既更加高度发展又更加一致，又由于各国之间竞争加剧，我曾经看到共同的问题不断产生，一系列趋同的解决方法被采用。重要的是，在开头要说明，趋同现象乃是一个变得有些相似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自始至终走向完全相同的结果的过程。一个极端趋同的事例是军事强国之间的军用武器，在那里经常发现，在任何时刻，只有一种类型的武器是最好的。完全一致的解决方法的趋同现象，并不是我最熟悉的部门的特征，但是这种趋同过程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所经历的两个部门的第一个部门是劳资关系部门。我的同事和我在《工业主义和工业人》^①（1960）一书中看到一个所谓的“多元工业主义”的趋同过程，其影响遍及工业、劳动、政府，以及做出他们个人决策的消费者和工人。我们看到“王

^① 克拉克·克尔、约翰·邓洛普、弗雷德里克·哈比森和卡尔斯·迈尔斯：《工业主义和工业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朝精英”的失败，“殖民体制”的失败。当时我们想，“多元工业主义”将会成功，因为它运转得最好，能广泛产生良好的结果。在《工业主义和工业人》之后，我又写了《工业社会的未来》^①（1983）一书。我长时期的同事邓洛普（John T. Dunlop）在相同的历史框架内写了一本参考书《劳资关系系统》^②（1958）。在20世纪，劳资关系曾经是一个有着巨大演进性（甚至革命性）变革的领域。

我曾经经历的第二个部门是高等教育部门，在那里我是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在20世纪，高等教育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演进性（甚至革命性）变革的领域。正如在本书中提出的，在这里我又看到一种趋同现象，各国高等教育系统面临很多同样的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法，比各个系统原来的历史起点彼此更加相似。由于知识变得更加普及，全世界所需要的技能更加相似，又由于人们的期望更加解放，高等教育系统倾向于变得更加相似。在扩展中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影响下，我们已经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逐渐远离受文化约束的高等教育系统，走向更加近于一致的学习化世界。

我考虑了四个问题：

（1）民族国家上升到主宰高等教育的地位，但是当代有一个回头走向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主义的运动——这一过程仍在不断变动，特别是现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兴起。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结果将会怎样，但是我认为普遍主义正在前进，

① 克拉克·克尔：《工业社会的未来：趋同还是继续多样化？》，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约翰·邓洛普：《劳资关系系统》，霍尔特出版社，1958年版。

而且将继续前进。

(2) 在高等教育内部,坚持传统和要求变革之间的争夺,以及在变革内部要求优秀和要求平等之间的争夺,每一方都在强化。仍占优势的民族国家主义坚持认为,即使优秀和平等并不完全相容,仍旧可以更有效地对待。我提出一个“20世纪高等教育的趋同模式”,作为目前解决包括对何谓“平等”和“优秀”的冲突在内的一系列将会永远进行的冲突的合适的方法。

(3) 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道德行为。高等教育曾经由多半独立的行会组成,现在越来越变得易受外界公众的检查和控制。而且,旧时的规范不再那么有控制作用,因为在大学内部发展了新的文化行为方式。我建议我们现在需要新的规则和机制,用更加明确的契约和更加公正的内部的学术法律制度取代行会的规范和实践。

(4)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使命和高等教育总的未来的课程发生争论。针对回到旧的模式或永远保存目前的模式的呼吁,我建议采用具有几种模式和不断扩展职能的可以称做“多元高等教育”模式。这里我提出我关于未来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新的视野”。

本书大量地与矛盾和结果所造成的冲突以及可能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有关。我的大部分成年生活是在矛盾和冲突以及解决矛盾中度过的。首先,在劳资关系领域,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工会—资方—政府的关系,在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过程中发生了转变。其次,在高等教育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它们与社会的关系,也在一系列政治的和学术的斗争中发生了转变。

长时期来我接受了赫拉克里特斯的名言，“斗争是世界的公正原则”。斗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果成功地加以利用，它能有利于有益的目的。因而我对以下几点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印象：

(1) 作为第一步，试图对正在发生什么事有更好的理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过程；

(2) 使斗争保持在产生相反效果的和破坏性的暴力的界限以下；

(3) 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对暴力提供良好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4) 作为必须的最后步骤，发展公正和进步的解决方法。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虽然斗争能有助于导致更大的公正，然而像那么多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它也能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当我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曾经有三个暑假作为美国友好服务委员会的“和平旅行队”的成员，为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特别是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而且在1933年秋季，我曾亲眼目睹由加利福尼亚摘棉工人罢工开始的工人斗争的一些地狱般的场面。^①我也看到过校区以及校区与社区之间的一些产生相反效果的仇恨。结果，我不仅对斗争在人间事务中的作用，而且对斗争得到和平和有效的解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近年来对高等教育更加关切。

正如本书这些论文清楚地表明，我看到前面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困扰着高等教育，正和它们在过去曾经常常困扰高等

^① 普尔·泰勒和克拉克·克尔：《1933年加利福尼亚摘棉工人史》，载《违反言论自由和劳动权利》，1940年，第19945—20036页。

教育一样。我对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背景内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有持久的兴趣，充分认识到，甚至在我们还不能想像的比较遥远的将来，将会发生新的矛盾和冲突，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目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自行解决，高等教育如何参与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将决定高等教育的未来如何发展。

这些论文中的讨论主要和美国有关，但并不仅仅和美国有关。这些讨论也和一切经济发达和民主的国家有关。

这些矛盾和冲突是高等教育不能回避的历史的一部分：民族国家以及通讯和竞争的国际化的影响；卷入社会的永恒中心问题之一——优秀和平等孰轻孰重；对社会强加的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高等教育的新世界的适应；目前由于新的学术文化的兴起而得到强化的对公共社会道德和个人私利的(永恒的)争论；以及社会坚持要履行，或允许履行的任务，如柏拉图的“教育的车轮”继续前进。

当高等教育从为王族和上层阶级，为古代行业和教会服务，转到为近代比较民主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建立在新的知识和较高的技能基础上的社会的所有人和一切机构服务的时候，它不能回避历史。高等教育特别在回应教授的愿望时，要遵循它自己内在的发展逻辑，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它还必须回应外部社会的不断变化的环境。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完全自治过。

本书的书名当然采自林肯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第二次国情咨文”。同时，本书所选论文的一个中心主题，意译林肯在同一个咨文中的话，就是教育是“人类最后和最好的希望之一”。为了人类幸福的进步，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处于文

明进步的前线。

本书各章是在大约十五年时间内为在一系列场合演讲而撰写的,但是它们确实比我最初所设想的对未来的探索增加了好多。这些文章多数保持原样,但是做了一些澄清、修正、补充和其他修改。

我要再一次指出,我非常愉快地承认从我的科研同事玛丽安·加迪和我的秘书莫琳·川冈卡沃卡得到的那么充满愉快和合作精神的全力帮助。

这是在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发起和指点下撰写的三卷系列的第三卷。^① 第一卷回顾从1960年至1980年迅速发展的新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以及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第二卷是关于当前和今后几年的发展——“忧患的时代”。第三卷论述长远的趋势,同时我建议当代的忧患时期最好放在长远的前景内来观察。

^① 前两卷是:《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型:1960—1980》,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美国高等教育的忧患时期:20世纪90年代和以后》,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目 录

译者前言	王承绪
序:主要的问题和趋于一致的解决方法	1

第一编 民族国家和学习事业的国际化

引言	1
第一章 忠诚:民族国家和学习的世界	3
第二章 目前的矛盾:大学世界的普遍主义对民族主义	22
附录:教育中的全球观点	36

第二编 传统对平等和优秀

引言	45
第三章 积累的传统面对现代的需要	47
第四章 “平等”:由平等的意义引发的争论	61
第五章 普及高等教育的世界的精英高等教育	71

第三编 高等教育机构职能的分化和均质化

引言	94
第六章 一个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趋同模式	

——既普遍入学又促进优秀	98
第七章 趋同模式中的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	120
第八章 1960 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一个预期的观点	130
附录:《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摘要	151
 第四编 知识的道德规范与新的学术文化	
引言	154
第九章 学术道德和教授职位	
——一个“瓦解中的职业”?	162
第十章 教师公民道德的衰退	178
 第五编 使命和目的:众多的选择	
引言	189
第十一章 大学使命的重新审视	197
第十二章 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	215
附录:其他有关高等教育目的的陈述	250
 第六编 对未来的竞争中的各种想像	
引言	254
第十三章 冰河时代还是新的视野——“教育的车轮”	255
第十四章 高等教育和外部历史不能彼此回避	270
跋:回顾与前瞻	274

第一编 民族国家和学习事业的国际化

引言

今天,世界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既受到不断增长的学习的普及化的拉力,又受到不断增长的国家化的拉力。这在历史上并非新事物,但是,特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但普遍的拉力而且国家的拉力似乎已经强化——普遍的拉力涉及更普遍的学生和学者的流动以及更快更容易的信息传播;国家的拉力包括对扩大学生入学机会的更大的政治利益,对科研和训练多种技术技能的更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对控制和分配较高成本的更大的财政利益,还有对更大的国际经济竞争做出反应。

这两种拉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呢?这里的论点是它们已经比可能被指望的更加相容。主要的理由是国家的目的愈来愈要求大学参与学习的世界,特别是为了接近新的知识和技术,但是也是为了提供给能够在全球学习的环境中操作的公民。矛盾多数出现在边缘,例如秘密的军事科研。重要的事实是高等教育愈来愈被看做世界的一个窗口,让这个窗口进一步开放是有利的。

这里几章普遍赞成新近强调的普遍主义。但是存在一些消极的方面,我只附带地提到这些方面,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

人才流失,阻碍那些国家的发展和它们进入比较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也忽略了存在的起抵消作用的势力,例如在世界的有些地方,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我也没有讨论对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的英语的偶尔的反抗,和对作为很好地传达逻辑思维但非感情和激情以及精妙意义的国际语言的数学的缺乏。

在各国内部,对高等教育的一些重大冲击,是学习的国际化所固有的。研究型大学处在国际竞争的前线,多科学技术型的院校也是这样。这种院校比较的范围在各国内部变得比较小,在各国之间越来越大——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对国内最好的大学。在这些扩大的范围以内,最成功的大学可能对它们的东道国或一国的省变得骄傲自大,有些大学的态度正在变得傲慢。

专门化,特别是在科研方面,并且扩充到教学领域,进一步得到强化。庞大的全球化的专家共同体意味着专家们越来越多地为彼此写作,而越来越少地为了他们的学科和相关知识领域的广大读者服务。越来越多的专业中,有一批学者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生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大量文献阅读活动和大批的相识同事,并且被发动为寻找越来越小的课题而探索,努力争取得到重视。学习的国际化也意味着知识的进一步分化——这是一种变得更加普及的专门化。

第一章 忠诚：民族国家和学习的世界^①

本章是我 1989 年 4 月在苏格兰斯特林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这次会议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主办，纪念该校的海外学习计划。这个计划由 31 个国家参与的大学继续实施。参加会议的多半是参与的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来自欧洲的与会者，都参与他们学校日益加强的三个面向——面向他们自己的国家，面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和面向学习的世界。至少，对他们来说，在如何更好地为他们各自的国家（像所要求的那样）服务的同时，为欧洲不断扩张的高等教育领域（像正在变得可能那样）服务，和为对全球学术界的历史性承诺服务方面，前面有着更大的挑战。但是，很多其他国家的大学在不同的程度上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东欧和前苏联已经发生革命性变革，这些国家重新进入国际学习世界，对高等教育的后果仍不确定。在那里，在为民族国家服务与为学习的世界服务之间有着同样的紧张关系，正如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在会议上所表明的，也许紧张情况还在增强。

^① 本章原文题为《学习的国际化和高等教育目的的民族化：冲突中的两个“运动规律”？》，载《欧洲教育杂志》25 卷 1 期，1990 年。

本文总的纲要是要指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历史运动,从在西欧到宗教改革为止(以1520年路德教会的创立为标志),从每一个文明内部的统一的高等教育模式到一国又一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模式,从拿破仑时代(1800)起迅速发展,并得到进一步加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国际军事和经济竞争加剧;现在到一个部分重新趋同的混乱时期,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兴起,和前苏联的表面的重新联合。目前这个时期可能证明是像1520年、180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是这还言之过早,如果要庆祝,也为时过早。

可以叫做当前推动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的几个“运动规律”^①中的两个是:①学习的进一步国际化;②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有意识地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使用这些机构的兴趣的强化。这两种力量在历史上没有一种是新的。新就新在每种力量的强度在同一时间已经增加得那么快。每种力量有什么样的冲击力?它们合作或者彼此对抗到什么程度?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人类统治方式中的支配力量,同时全世界学习的进步已经

^① 我给“运动规律”加上引号,因为我认识到这个词的“历史”含义。但是我不讲据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支配历史的一个运动规律,而是讲似乎现在和有些过去的时间起着作用的许多“规律”中的两个——不是说波珀(Popper)那么有说服力地论证的那一个运动规律不能永远具有解释的价值,因为知识的状况对社会的发展是那么重要,并且知识的状况在变化,知识状况的变化无法预言。我使用这个短语的意思毋宁是波珀所提出的“解释”是那么“重要”,“每个世代”有“权利”甚至“义务”对正在那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构建他自己的解释”。参见波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253—255页“历史主义”。波珀的解释,确实失去了与包括在起着作用的各种力量和它们的冲突以及不断变化的影响在内的现实的联系。但是“解释”寻找对现实的理解。

变成影响人类社会的一个最有影响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

埃里克·阿什比曾经探索过类似的矛盾，指出大学必须“满足两个生存的条件：如果大学要属于大学的共同体，它必须忠于七个世纪以前使 *studium generale*^①（大学）形成的那个理想；而且它必须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社会，不管那个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天主教的还是回教的；不管它是由美国的专家治国论者构成还是由哈米特游牧民构成”^②。他所研究的“适应过程”发生在殖民地背景下。殖民地背景现在几乎成为历史，但是这两个“条件”之间的适应过程仍旧绝对必要——这两个条件是，一方面是目前形式的普及的 *studium generale* 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各自“自己的社会”的要求。

我的基本主题是，大学按它们对促进普遍知识的承诺的性质而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它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对它们抱有企图的民族国家的世界。我的基本问题是，这些机构处在一个神秘的学术天堂和一个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之间，这种双重身份定位在什么地方？这种双重身份又如何影响它们的行动？

① *studium generale* 是“一个接收从所有国家来的学生的高等教育场所”。见拉什多尔：《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修订本第一卷第 6、7 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 年版。

② 埃里克·阿什比和安德森合著：《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的生态学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 年版。阿什比特别关注英国和法国的大学移植到殖民地或从前的殖民地领土。参见阿尔特巴赫有关亚洲高等教育中有关“学术模式的外国起源和作为发展过程一部分的大学的本土化”的讨论（《扭曲的根子》，载《高等教育》杂志第 18 卷 1 期，1989 年）。并参阅西伯里（Paul Seabury）的评论，“学术和学习的世界应该是一元的”，但是“各个高等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很大地视各个系统和它周围社会关系的特殊方式而定”。

粗一看,也许可以认为学习的国际化和目的的国家化这些力量是彼此完全对抗的,高等教育可能被夹在中间,撕得粉碎。学习是一桩个人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反映统治者的愿望。学习依靠思想和说服,而国家的目的更多依靠压力和控制。学习多半是为了它自己的缘故,而国家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对抗似乎不可避免,至少这两件事不是完全相容的。但是,以下我将讨论,现实要比这复杂得多。

也有人认为,学术界的同行将全部集合在国际化一边,他们将到处和始终献身于学问的自由进步——不被民族的狭隘利益所束缚;他们将站在万能的学习之神一边,而不站在地方私利的猛犸——那些贪心的精灵一边。但是,现实再一次比这更加复杂。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是“惟一的善”,它的价值是普遍的。又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而权力是个别化的,那些有权力的人也许不要分享知识。为这些神之中的哪一个服务呢?普遍的“真理”,还是个别化的“权力”?

趋同、趋异和部分重新趋同

(1) 趋同。曾经有过很多时期和地方,在民族国家和学习的普遍主义之间的冲突并不明显发生,或者至少十分微弱。在那个时候和地方,理智的好奇心的自由精神没有国界。这种神话般的地方,如古希腊柏拉图讲学的学园阿卡德米(Academy)和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学园利塞姆(Lyceum),托勒密的亚历山大和它的大图书馆,波斯的萨沙尼德斯(Sassanids)和

贡迪沙普尔(Gondishapur),印度的达斯朱普塔斯(Das Guptas)和纳伦达(Nalanda),中国孔子讲学的黄金时代,穆斯林世界的哈伦阿尔拉希德(Harun Al-Rashid)和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中世纪欧洲的波洛尼亚和它的后继者,以及巴黎大学创办以后的天主教世界。^① 如果说曾经有过漫游各国的学者的智慧乌托邦,也可能列出这么一个名单。但是乌托邦的环境和飞地曾经(而且特别是现在)在很多地方发现过——例如,目前在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大学。学者和学生来自当时和当地文明的整个范围,不问国籍,他们要学习什么就学习什么,没有民族国家所预期的外部指导或限制。这些曾经是漫游的学者和学生的世界,到处流浪,在知识领域独立自主,不受政府管束。

让我马上说一句,我说不受政府指导和限制。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总是有一个理智在其中运行的环境,除了其他影响以外,受到积累的知识、现存的方法、目前的思想状态、流行的宗教信仰以及待解决的迫切问题的影响。例如,古希腊和穆斯林文化的黄金时代的环境就是这样。它们所缺乏的就是影响或控制高等教育的明确的国家目的。

无论如何,那个阶段的高等教育的真正历史,几乎并不像现在在天真的回顾中所显露的那样乌托邦。例如,当时有苏

^① 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在它们文明的境内运行的全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全世界意义上的“国际”中心,但是在它们文化内部是“国际的”。例如,波洛尼亚大学有它的伦巴族人、特斯坎人和罗马人的“同乡会”,以及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英格兰人、诺曼人、匹卡德人、日耳曼人、荷兰人和瑞士人。阿卡德米、利塞姆和亚历山大从所有受希腊影响的世界内部,贡迪沙普尔从整个中东地区,纳伦达从印度次大陆和中国甚至基督教世界,智慧之家从西班牙到波斯,儒家的书院从中国各省吸收学者和学生。

格拉底的审判和伽利略的被迫放弃信仰；高深学习常常受到国定的教会的教义的限制，像在巴黎^①、牛津和剑桥大学早期的历史那样，受到国王和王子个人愿望的限制^②；像在英国，受到明确规定为富裕贵族和牧师服务的限制；早在波洛尼亚和其他地方在提供律师帮助的商业革命中，受到劳动市场支配的限制。

原来的模式，无论完善与否，是世界主义的大学，不管是在希腊文明，还是穆斯林文明、天主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不束缚于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有在各国漫游的学者，接受从各地来的学生。在穆斯林和天主教文明，信仰一种宗教，采用一种学术语言，使用一种课程；在商业交易方面，有一种经济。高等教育机构的结构相似，漫游的学者在任何大学都感到舒适。这是从阿卡德米到路德历时两千年的高等教育趋同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地球上消失了几近五百年。

(2) 趋异。学习世界被扯得四分五裂。西欧大学(studium generale)模式最大的转变发生在宗教改革时期，大学世界被分成天主教大学和耶稣教大学。虽然早先发生过强调专业训练的较世俗化的波洛尼亚模式和比较强调宗教及哲学的巴黎模式之间的分化，这是高等教育模式大分化的开始。

在宗教改革以后，民族的和宗教的特征导致产生几种模

① 巴黎大学初创时事实上由卡贝(Hugh Capet)所建立的法国王朝所主办，不久由基督教主教接管。

② 国王和王子们，十分平常，像在魏玛，对培养一批有文化的人集合在君王周围感兴趣。作为一个例子，对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国王为了“高质量的教士”和一大批有学问的人担任法官、教师和高级行政人员等等对创办大学的兴趣的讨论。见理查德·卡根：《近代早期西班牙的学生和社会》，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

式。由于宗教改革分裂了从前的天主教世界,又由于民族国家建立了它们自己的管理机构,使用根据它们自己的规格经过正式训练的人员,并寻求新的技能和先进的知识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发展了民族国家的大学。民族国家还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控制了公民和外国人的流动,区别包括学生和学者在内的公民的权利和特权与外国人的权利和特权。由于民族国家用在教育上强调民族的历史、文学和风俗(如“法国文化”)取代许多地方性的依恋,因而也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爱国主义、它们自己喜欢的行为准则(如英国“绅士”)、它们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它们自己的带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的经济、它们自己占支配地位或国家认可的教会、它们自己对主要职业实践的要求——而且在每种情况都指望它们的大学合作。民族语言而不是国际语言得到发展。大学被分成若干不同的模式:除其他一些模式以外,有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苏格兰、美国和日本等模式。不再有一种课程,“三艺”和“四艺”完全消失。

民族国家的兴起,加快了这种转变,但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又进一步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转变。民族主义接着而来,但也是不相连的不断强化的发展。“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别是和法国革命一起,开始了,但是现在已经“传播到地球的最远的角落”。^①“民族要求人的最高忠诚”^②——不再是帝国、教会和部落,也不是行业和阶级。卢梭歌唱“爱国”的颂歌并强调教育对反复灌输这种爱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对所有公民

① 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的理念》,麦克米兰出版社,1969年版。

② 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的理念》,麦克米兰出版社,1969年版。

进行“国家的和世俗的教育”^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要为民族国家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利益服务,而且要成为发展民族身份的重要方面;不仅要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学习中的普遍主义为教育中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大学的收入现在来自公共财政而不是来自学费和捐赠——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多数学校成为“公有”。

(3) 部分重新趋同。今天我们有一种混杂的状态——可以确认为“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大学”,包含表面上的矛盾。我们有一种重新趋同的趋势,从与众不同的民族的大学模式到近代大学的趋同模式。^② 教会和意识形态在界定大学行为方面正起着比较小的作用。其他语言正代替拉丁文(或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特别是英语和数学——统一智力的论述。我所谓“世界范围”的学习现在支配着很多课程。通讯移动得更加迅速而且多半更加自由。但是在大学生活中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也许是西欧宗教改革以来最不稳定的时期。于是我们从趋同走到趋异,现在我们明显地正在大学世界走向部分重新趋同,也许再一次在到学习的普遍主义途中——普遍大学的世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被卷入了第二次大转变。

① 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的理念》,麦克米兰出版社,1969年版。

② 参见本书第七章讨论。

目的的民族化

近代独立的民族国家特别在过去两个世纪,已经成为占优势的政治统治形式,但是有很多先行者,包括英格兰的都铎王朝,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朝,以及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路易十四。民族国家开始时,一个国家进入大学世界,通常各有其特殊的理由。

在拿破仑的法国,帮助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文官制度和比较先进的需要学问的职业体系。法国大学,在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后来在从 1885 年至 1914 年的时期内,开始对“经济发展”感兴趣。^① 由于和德国的竞争,这一点做到了。

在德国,在被拿破仑征服后,通过科学和工程(如在洪堡大学)帮助恢复社会的力量。^②

在英国,在 19 世纪后半叶,通过向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士开放,后来又向妇女开放和强调科研,使牛津和剑桥近代化——用帕蒂森(Mark Pattison)的话说,对是否强调培养“人”,还是生产“书本”掀起了巨大争论。帕蒂森本人改变了立

^① 韦斯:《法国近代大学的出现,1863—1914》,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五章。

^② 严格地说,普鲁士带了路,而且最初重点比较平衡,较少集中在科学和工程,而更多集中在德国所说的哲学。参见本大维:《科学家在社会的作用》,1971 年版,第七章。

场。^① 在英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是一个高潮。

在美国,在内战时期,通过鼓励赠地大学运动帮助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在印度,特别是在柯曾勋爵(Lord Curzon)领导下,建立了合格的英国文官制度。

在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通过创办帝国大学使日本近代化。

在意大利,通过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复兴(Risorgimento),帮助建立一个比较近代和比较统一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体系终结。在很多国家,除了很多其他事情以外,试图培养担任文官、教师和法官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接管社会的文职功能。

无论如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的情况是,有那么多国家,以那么多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它们对高等教育的兴趣。国家有关高等教育的目的已经扩充到超出培养受过训练的公务员,或者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发展技能以促进技术革命的范围。更多的国家现在都以更多的方式利用高等教育。现在一系列新的兴趣包括以下各方面。

更多和更好的科研。工业国家现在一般花费国民生产总值的 2%—3%,而且它们把这种支出的 15%—25%用于高等教育机构。这多半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进步被不同地估计作为增加的劳动生产率的来源——对美国来说,占有所有可测量的来源的 40%—60%;大学已被强有力地引入

^① 这里的“人”是指纽曼(Cardinal Newman)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认为具有英国人的价值观的人;这里的“书”是指有关普遍科学的书。“书”胜利了。

这个过程。

科学和工程以外有很多技能。很多先进工业国家能够而且现在确实已吸收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的劳动力的 20%—30%。

更加强调工商管理学院,这些课程不断增加国际的成分。例如,日本新成立的筑波大学非常重视比较宗教的教育,帮助它的毕业生了解其他文化,并在其他文化中进行管理。

在语言方面,进行更多和更好的训练,特别是在英语以及所有形式的数学方面。

更多和更好的区域研究,虽然在英国很久以前就对它的帝国进行这种研究。^①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重视,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②

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促进机会的均等,甚至为青年创造作为最后一着棋的“就业”。在意大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大学的学额差不多一下子增加到三倍,一部分是促进机会均等,一部分是吸收失业青年。

给所有高等教育的部门更多平等的地位。如在瑞典,根据 1968 年大学法,高等教育的所有部门,至少在名义上给予大学地位。

和其他国家建立更多更好的文化接触。很多国家都在寻找这种接触,以便在全球基础上接近最好的新知识,或者减少

① 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于 1916 年获得皇家特许状。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少有人对区域研究感兴趣。到 20 世纪 60 年代,“区域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兰贝特和巴伯合著:《超越发展:语言和区域研究的新阶段》,美国大学协会,1984 年,第 8 页)。但是,在 70 年代,兴趣迅速衰退。这个领域中的起伏反映了基金会和联邦政府,包括军队,资助的变化。美国区域研究的命运是在一些被挑选的领域的学者努力依赖国家目的转变界定的良好例证。

国家的文化孤立。如在日本目前努力引进更多的学生和教授；或者可以搜罗其他国家未来的领袖，如东方集团国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法国对西非的学生；或者可以减少政治上的孤立，如前苏联；或者可以提供更多有见识的人士在海外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接触，如美国。

为一般公民提供更多有关发展中的世界情况的知识 and 更多的理解。如在瑞典，那里这种知识和全球的理解是教育系统的官方目的之一。

在若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最近的主题是：①对应用研究和转移到生产更加注意，把这看做比迅速在全世界传播的基础研究对国家更加有用；②对促进更加“有用的”多技术学院比对“適切性”较差的大学更加注意。

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对高等教育有这么多的国家目的。转过来，这又导致民族国家政府更多地参与高等教育，如目前在英国和美国的多数州，以及最近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干预，企图使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化，导致在街头发生骚乱。大学一般已经越来越少地成为“国中之国”。

民族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兴趣的增长使加强干预高等教育有着足够的理由（但是，所采取的个别行动是否明智，是另一问题）。过去，高等教育从来不像现在是各国之间经济和军事竞争的潜在工具。由于市场变得更加全球化和更多的国家用更多的产品在这些市场进行竞争，至少在经济领域，这种竞争已经增加。教育被看做支持工厂与工厂和军队与军队的前线对抗。学者和决策者们已经发现，“人力资本”和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同样重要。

经济的更加国际化竟然已经导致大学目的的更加民族

化,这真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十分幸运,军事竞争可能平静下来。虽然它至少在一个超级大国(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的美国)对民族国家卷入高等教育给予一次最大的冲击。但是,经济竞争正在不断强化。

此外,高等教育几乎是所有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600万人相比,现在(1988)全世界有5800万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至少在这样分类的机构)就读。所列举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已经从40年代末的3500所增加到26000所。在先进的工业国,高等教育目前消费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没有计算在内。

重新开始的学习的国际化

在以上所提到的两个“运动规律”中的另一个规律的领域,也正进行着巨大的转变——加速的学习国际化。

学习的国际化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部分:

- (1) 新知识的流动;
- (2) 学者的流动;
- (3) 学生的流动;^①

^① 第三级教育阶段的外国留学生,1950年为10万人,1978年为85万人,其中35万人在美国。英国第三级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10%是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外国留学生的绝对数量比较高,但是百分比只有3%。见夏夫、郭匹那塞和威廉·卡明斯编:《北南学术交流》,曼塞尔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7页。

(4) 课程的内容。

当然,学习的国际化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也许自从第一个小部落或者甚至家族使用它的原始工具和另一个部落或家族接触时就开始进行。围绕“发现者”和他们发现物的分配就能撰写历史,而且已经写了历史。在智力活动层次,在地中海周围,在中国,在印度,以及在西欧,随着文明的创造,这个过程大大地加速。现在文明是全球范围的,学习也是全球范围的。英语和数学取代拉丁文的位置,电波取代马和船的位置。

信息的流动和新的电子学一起,几乎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是全球范围的(现在我们有所谓的电子科学)。随着这方面的发展,对全世界其他人的行为的兴趣和评估也得到强化。现在世界上可以说第一次有了单一的信息流动系统,但是对信息的规范评估仍旧有许多系统。

学习似乎是一种不能被制止的传染病,甚至不能被寻求掌握核武器秘密的民族国家所制止,它现在能以光速传播。知识像水银流进每一个裂缝,并且像气体散布进每一个真空装置。要制止与商业革命有联系的许多货物的流动是困难的,但是是可能的;而要制止与知识革命有联系的事实和观念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太多的新的知识已经流进甚至最集权的国家,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他们的学者对世界发展和文献的了解,似乎比按照国家政策被认为有任何机会了解的情况好得多。

曾经搞过秘密科研项目的奥本海姆(J. Robert Oppenheimer)后来写道,“无限制地接触知识,无计划和无约束地联合人们推进知识——这些是可以构成一个庞大,复杂,永远不断增大,永远不断变化,永远更加专门化和熟练的技术世界,

然而又是一个人类共同体的世界的东西”^①。这个世界远远超出民族国家。由于知识变得更加普及,从事知识探究的个人,他们的身份将更加可以通过他们所了解的东西和他们了解的深刻程度来确定,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出身或目前的住地来决定。但是正如奥本海姆指出,这也变得更难;正如培根所说,“我已经把所有知识作为我的活动范围”。知识的历史也是专门化的历史。

但是,由于正规的学习的国际化至少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我对学习的国际化已经如何不平衡地深入到不同的学习领域有着深刻的印象——尽管至少对有一些不够深入有着充足的理由。从多年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内部参与工作的制高点,我已经观察到为何有些领域现在完全国际化,为何其他一些领域几乎仍旧同等的地方化。我十分粗略地想到以下三类:

知识内容具有全球一致性的领域——如数学、科学和工程。在有些领域,甚至所有著名学者似乎彼此相识——组成一个联谊会,如在天文学、葡萄栽培学和葡萄酒酿制学,以及柑橘栽培学;人类学,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更多属于这一类。

知识具有文化内部相似性的领域——如每种文化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这些知识的文化圈,包括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又有许多小圈。

具有国家内特殊性的领域——如在家庭法、公共行政、教育和社会福利——在国家内容上有很大的多样性。多样性也可能是所采用的方法的结果,如斯梅尔瑟(Neil J. Smelser)指

^① 罗伯特·奥本海姆:《科学和共同理解》,纽约,1954年版,第95页。

出,在社会学方面,在比较经验主义的美国人和至今为止比较少经验主义的欧洲人之间有所不同。^①

在这三类领域内的教授(少数在两类或者甚至在所有三类)有区别地到在不同地点举行的会议和学术中心旅行;为不同的具有国际的,或文化内部的,或国家内部的方向期刊写稿和阅读有关期刊;熟悉全世界的,或在他们文化内部的,或在国家层次的,或者甚至只在地区和地方层次的同事。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和在评论他们的记录中,这是明显的。在第一类,无论哪里的学者都熟悉同样的东西;在第二类,他们熟悉很多在他们文化领域内部相同的东西,以及很少他们文化外部的东西;在第三类,他们熟悉他们自己社会内部的一些相同的东西,而对他们社会以外的东西有时一无所知。

在美国,我们有时谈到三类教授:“世界主义者”、“地方教授”和“守校教授”。^② 第一类教授坐喷气式飞机出席国内和国际的会议;第二类教授自己开车参加地区和地方的会议和约会;第三类教授留在校区参加各种委员会的会议,其中有些人提供学术机构非常依赖的良好的公民义务。个别教授可能属于不止一个类别。

根据粗略的估计,我认为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教授在世界范围的研究领域、在文化内部范围和在国家内部范围的成员的比例大约是 60%:30%:10%。在一所地方社区学院,这种比例将很不相同。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所得到的联

① 斯梅尔瑟编:《社会学手册》“导言”,伦敦,1988年版。

② 古尔德纳:《世界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潜在的社会角色的分析》,载《行政学》季刊,1957年12月—1958年3月,第281—306、444—480页。

邦政府科研经费(总数每年在八亿美元以上)而论,大约有96%为世界范围的研究,2.5%为文化内部的研究,1.5%为严格的国家内部的研究。比较起来,在伯克莱的非移民外国留学生按领域划分,比例有些相似,它们是60%:35%:5%。参加海外学习计划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的划分相反,比例是25%:75%:0%。在国外为学分学习的全部美国学生中,只有10%在世界范围学习领域,其余是在文化内部的领域。

美国吸引的外国留学生多半在世界范围领域寻求技能,而派到国外的学生是在文化内部范围的领域寻求理解,表示每一类学生最需要和最希望的东西。

为什么特别是在教授内部,按国际参与的类别,在他们的分布上一个领域和一个领域有这些差别?为什么有些领域落后?

(1) 语言是一个理由。数学家是最受优惠的,而科学家在其次——他们能比人文学者用较少的话表达更多的东西,而且数学家有时根本不需说话。

(2) 所喜爱的方法的区别,如社会学所知名的,是第二个理由。

(3) 内容是第三个理由:科学有一个内容,经济学有两个主要内容——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学和以计划为导向的经济学——而法律有几个内容。

(4) 意识形态(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对自由主义的)分开一些领域,如政治学。这种按意识形态的学者的分离主义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

(5) 国家对抗有时是一个原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

德国教授与英国和美国的教授分离。^① 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希特勒时代。当然在近代史上还有其他重要事例。

(6) 有些领域纯粹由于知识的负担试图了解一切而导致分离,如在历史领域,趋势是越来越狭隘的专门化对世界史。

(7) 缺乏兴趣是希望详细了解另一国家内部多半只有该国内部的学者感兴趣的所发生的事情的障碍。

(8) 建立跨文化理解有一个沉重的负担。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起,我就是中文大学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该校的课程提出两种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文学。但是,就我所能理解,每种文化坚持自己的优势,很少努力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分析。首先,对两种文化要有深刻的了解。其次,比较分析的工具没有很好发展。同时,比较和评价,尤其在香港的环境中有它们的危险。

因此,学习的国际化的压倒之势的力量,在有些领域,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最重要的观察是,世界范围的研究领域的内容现在已经深入到全世界的巨大——事实上是普及的程度。

世界范围的最大的学术中心已经历史地从希腊世界转移到穆斯林世界,又从穆斯林世界转移到西欧世界;同时,在西欧内部,从意大利到英国到法国到德国,然后,在欧洲以外,到

^① 见沃利斯:《战争与德国形象》,爱丁堡,约翰·唐纳德出版社,1988年版。

美国。^① 知识世界的最有兴趣的推测之一是，下一次领导可能在哪里移动。事实上，它确实从美国移动。^②

① 三友(Mitsutomo)计算每个国家平均占优势时期为80年。美国占优势时期在1920年至1970年前。但是，根据他的计算，德国占优势时期为110年。相当不祥的是，根据美国人的看法，被外国人取去的美国专利的比例，已经从1970年的30%增长到1989年的48%。见德博拉·西冲(Delocoh R. Cichon):《最新国际科学和技术数据:1991》，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91年，第102页。

② 见本大维的《科学家的作用》；三友的《西方转变中的科学活动中心》，载《日本科学史研究》1962年第一期；参见中山茂、八木合编的《近代日本的科学和社会》，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81—103页。

第二章 目前的矛盾：大学世界的普遍主义对民族主义^①

在第一章,我指出了高等教育中从普遍主义到对民族国家的利益做出回应,再回向普遍主义的长期的转变。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二次转变之中,全世界有许多障碍,采取若干种形式,有若干种紧张的程度。这里提到的障碍包括民族国家保护它们军事和工业技术的垄断;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凋谢中的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关系,但在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的紧张关系;外国国民在就业方面受到限制,以及各国利用学生交流进行政治灌输。但是以上这些情况的影响似乎正不断下降,同时在知识世界的普及化方面正做出更大的努力。目前最全面的努力是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次潜在的巨大跃进。

学习的国际化(等等)对美国国内的影响是对普通教育内容的不时激烈的争论——普通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单一文化(西方文化)的还是多元文化(世界文化)的?如果普通教育在课程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争论甚至将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① 本章是登载在《欧洲教育杂志》25卷1期(1990)5—22页的《学习的国际化和高等教育目的的民族化:冲突中的两个“运动规律”》一文的节录。

(我所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一个课程建议《教育中的全球观点》，见本章附录)

对于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如果它们双方都继续增加力量，因为它们完全可能增加，以后可能怎样相互影响，在学术界目前有些担心和有些实际困难的迹象。但是，它们当然并非是仅有的在起作用的力量。

我与知识社会学的接触较少，而且多半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曾经参加过传奇人物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研讨班。他从来没有一次在班上出现过，这使我有更多时间仔细地阅读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部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于是，我对学者(和其他许多人)在处理他们的问题时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性有了直到现在还很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五种思想方法：官僚主义的保守思想方法、历史的保守思想方法、自由人道主义的思想方法、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图式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比对自然科学更加切合。我确实认为它有(我知道这是有争议的)严格的科学思想方法。尽管这样，知识的流动的确部分地视学者的思想方法而定，而且这些思想方法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有很大变化，以自由人道主义的(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最有助于国际的流动。我有深刻印象的其他影响，特别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的历史时的影响，有以下几种^①：

(1) 在本领域和邻近领域的研究的增大，有时缓慢，有时

^① 克拉克·克尔：《劳动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的修正主义者(1940—1960)》，载克拉克·克尔等编：《劳动力市场如何运作：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急速。

(2) 新方法的引进。

(3) 真实世界所出现或仍旧存在的问题和被普遍接受的学说的对抗。

(4) 基金会、政府机构、大学等等对科学研究的不断变化的资助政策；或者，在有些国家，不断变化的竭力压制。

我对在其他领域在起作用的影响，如果有所了解，所知并不那么深，但是我猜想这些影响可以归入相同或类似的类型，但是有时每种影响在各个学科和分支学科的发展中的作用，差别很大。

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民族国家和其他外部资助影响来源的不断变化的资助，或压制，或影响和控制的政策。

至少到此为止，总的来说，民族国家一直是更多地站在学习的国际化这一边，不至于反对学习的国际化。但是有四个重要的例外——①现在不断缩小的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②现在不断增长的南北方之间的政治敏感性的障碍；③德国学术界的长时期（1915—1945）的“回避”状态；④长时期的（特别是从1940年以来）试图控制军事和工业技术传送的秘密。这些是现代宗教改革的等价物。除了这些主要的例外，一般都有利于民族国家支持在它们疆界内外高等教育的扩张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首先，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各民族国家都对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给予强大的财政资助，高等教育的这种增长允许进行更多的科研，并且通过很多期刊和书籍大大增加科研成果的流通。各民族国家还大力资助国际间学者和学生的流

动,如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①。此外,民族国家热衷于分享别国的科技进展,即使有时不那么热衷于分享他们自己的科技成果。他们支持已经在包括卫生和农业在内的许多领域增加知识流通的国际组织。国际信息、学者和学生的流动得到似乎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政策方面的趋同现象的帮助。

一些阻碍

但是,对人民和知识的自由流动的主要阻碍仍继续存在。

在美国,继续努力限制有关高度机密的军事科研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情报的流动。在有些州,如在加利福尼亚,在学生比较多的领域,特别是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对招收外国学生有非正式的限制(明确具体的做法是过去接受 50% 外国学生的地方,设法把外国学生限制在不超过 25%),以及比较关心在研究生阶段的平衡。还有新近出现的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表达的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以试图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招收

^① 在美国,所有自然科学的外国博士后学者的 80% 曾经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参见基德:《1967 至 1980 年年轻科学家进出美国的运动》,《密涅瓦》21 卷 4 期,1983 年冬季,第 387—409 页。

更多的美国公民。^①根据麦卡伦法(McCarran Act),有少数外国学者,由于他们目前或过去的政治观点被拒绝接受。^②

在英国,对外国学生的补助已经取消,他们要为自己的教育缴纳“全部费用”。

在日本,经政府认可,学术团体已经带有非常民族中心主义的成分。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正在改变。

前苏联和一些东方集团国家已经完全为了政治的原因挑选和资助外国学生,而且,已经做出努力,在不同的严格水平和不同的时间,限制从外国引进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学术研究和学者。这里,意识形态是政策的主要来源。

现在正在不断减少的东西方之间的障碍,由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接受外国学者强加要求,造成延误和限制,但现在正被不断增长的北南方之间的障碍所取代。民族主义的

^① 参见阿特金森 1989 年 2 月 16 日提交给加州大学董事会的文件《科学和工程学哲学博士的供应和需求:一个正在酝酿中的国家危机》。阿特金森指出:“外国公民被授予自然科学哲学博士的 30%,数学哲学博士的 50%,工程学哲学博士的 60%,共计 5000 名哲学博士。很多人将不能在美国就业,美国面临哲学博士的严重短缺。建议美国公民享受高额奖学金。”

^② 有关对“思想的传播”和“外国学者”入境的限制的讨论,参见沙特克:《联邦对学术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的限制》,《密涅瓦》22 卷 3—4 期,1984 年。

敏感性已经成为这些政策的主要来源。^①

规范性的标准

前面有关实际做法的实例,提出了一些规范性的标准,以检验民族国家在它们和学习自由流动的国际化的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

在大学校园没有为政府服务或者为法人赞助者服务的秘

^① 参见夏夫、郭匹那塞、卡明斯主编的《北南学者交流》(曼塞尔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的讨论。郭匹那塞和夏夫警告有关“知识保护主义”的发展。特别注意派伊(A. Kenneth Pye)执笔的《学者进入和富布赖特计划》一章。他说,很多南方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少对自由研究开放”而且使“进入成为特权”;他警告说,美国可能以“更加不愿接受来自这些国家的学生和学者进行报复”。核心问题总的来说是很多这种国家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敏感,因为这些研究影响每个海外国家的声誉,因为它们可能引起国内政治纠纷,因为它们可能冲击所研究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根据郭匹那塞和夏夫的意见,一个起作用的问题是,“很多北方的社会科学家”已被“社会化”成为“社会的批评家”——成为特里林所谓的“敌对文化”。结果,“有些学者交流事实上已经增进了相互误解”。结果是接受国家更多地调查什么问题可以研究,谁可以进行这些研究,谁赞助这些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可以有什么用。新兴的民族国家,极度渴望完成经济发展,减少政治脆弱,常常特别被引诱对坚持长远的普遍的学术原则,提高即时的狭隘的关切,把外国学者看做潜在的颠覆分子。结果,国家的需要很可能最终控制国际学术标准。参见南太平洋大学副校长卡斯頓在所著《学术自由:第三世界的背景》中的讨论。参见兰贝特和巴伯在《超越发展:语言和区域研究的新阶段》(美国大学协会,1984)中的评论:“在很多国家,对进入科研场所已变得越来越难于协商。”

密科研。^① 由大学管理的在校园以外的实验室是一个单独而更加复杂的问题。

没有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对学者自由流动的阻碍。^② 对这一标准的推论也许是学者应该有保持“公正”的义务。

即使国家政策很不同意(如一度在德国和目前在南非),应凭合格学者个人业绩接受为学术界的成员。

根据学生的学术成绩而不论他们的公民身份招收学生。

允许学术界并为学术界提供财政资助,在各知识领域提供基本的最低限度平衡,以便学术界可以参与全世界范围内学习的进步和重要的文化领域,即使它们目前并非属于国家优先支持的领域。作为这一点的推论,也许是大学必须主动地“足够敏感,对支持它的社会保持一致”^③。

① 加州大学(该校我了解最深)曾经是,现在还是对秘密科研的政策意见分歧过去和现在非常显著的中心之一,一部分是因为对于在利弗莫尔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劳伦斯辐射线实验室的管理;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受诸如战略防御试验等任何主要国家科研影响的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该校有些科学家(在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有很多支持者)对合作说“不”,因为合作从事秘密研究是和基本的学术道德冲突的。相反地,更多的科学家由于他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的压倒之势的重要性,说“是”(有些支持者在专业学院)。但是,多数科学家在原则上说“不”,但在事实上说“是”,并且申请项目经费,常常是因为所有知识的增加可能都有一些良好的直接效果,而且长远来看,将有良好的附带效果;而且有些他们的非科学家同事接受他们的个人选择的权力——每个教授成员决定研究什么的权利。但是,在我任内,在希尔辐射线实验室,我确实停止秘密科研,理由是,它允许有些教授和学生利用这些设施,而其他人(特别是来自海外的人)不能利用这些设施,因为这些人没有得到一个外部机构——联邦政府的许可证,这是差别对待。

② 对于“绝对真理的持有者”的讨论,参见兹纳尼兹基的《有知识的人的社会作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大概,作为“绝对真理的持有者”,他们应该可以绝对享受全世界的知识。

③ 阿什比和安德森:《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的生态学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促进学习的国际化

如果高等教育机构愿意促进学习的国际化,它们可以怎样做?

第一,它们可以自己寻求坚持上面提出的纯粹的学术行为模式,此外支持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努力这样做——例如在南非。

第二,它们可以寻求帮助机构本身如同发展中国家促进它们参与国际学术社团的能力。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在现有条件下,这种方法的作用极其有限。我认识到,作为殖民主义强国,英国,也许还有法国,在印度、非洲和其他地方曾经有一些成功。但是,在我看来,美国的经验主要是失败。我曾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工作了十六年,当时它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改革和改进。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了。虽然在董事会我属于持异议的少数,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尝试,多数人认为董事会采取的行动有好的理由。这些大学的领导在政治上常常太不稳定,或者他的影响太受限制,或者他的技能太不胜任,或者具有所有这些缺陷,以致不能成为可靠的伙伴;政府干预过分频繁,打扰太多;教授们几乎总是过分满足于现有的各种做法。个别的学校经验较好,例如医学或农业,但是基本上也

不令人满意。^① 只有直接控制的项目,如在菲律宾的水稻研究或在墨西哥的谷物研究。加州大学的经验与在印度和智利的主要项目类似。我可以指明,福特基金会有过的经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加州大学的经验相似。

第三,对比之下,对个别学者和学生参与全世界教育交流的资助,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非常成功。又如在 my 的经验中,加州大学的计划也很成功,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和海外学习计划。

第四,各大学可以共同进行课程改革。最近(1988)塔卢瓦大学集团(Talloires Universities Group)^② 在一次会议上决定开始在包括武器控制,冲突的谈判和解决,以及和平与发展在内的领域进行课程的国际化,并宣告:“我们作为教育者保证防止全球死亡。”赞助人想像出了一个“全球课堂”。

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1987)^③ 是一次规模比较小的努力,旨在更多的了解和更仔细的分析。对美国来说,委员会建议在课程中更加重视:①世界史;②除美国文化外,了解一种或更多的文化;③把世界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的、自然的、生物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以及信息和评价的系统来进行系列

① 对这些计划的比较模糊的评价,参见科尔曼:《第三世界的专业训练和机构建设:两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验》,《比较教育评论》28卷2期,1984年。

② 塔卢瓦大学集团的《大学校长的塔卢瓦宣言》,塔卢瓦,法国,1988年9月12—16日。塔卢瓦大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新西伯利亚大学校长埃尔晓夫、马德里大学校长洛佩兹、德里大学副校长拉查、加纳大学副校长沙维尔、汉普郡学院院长西蒙斯、斯特拉斯堡文科大学校长特罗米、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塔夫茨大学校长迈耶。

③ 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克尔):《美国为未来作准备:教育的全球观点》,载《教育的全球观点》,1987年。

分析的观点;④分析国内外重要社会问题的能力。这个报告虽然得到当时的国务卿的批准,但是没有得到教育部长的受理,他说,“全球教育”是“中止判断和把人搞得稀里糊涂”的邀请书。①

瑞典把全球理解作为它的教育系统的目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领域以它通常但不总是有效的方式显示出一些兴趣。这些都是早期的尝试。无论如何,“全球课堂”肯定是件遥远的事。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目标“教育到处应该同样”② 永远不会(或者按我的意见,永远不该)达到。

事实上,有一些相反的趋势。增强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或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或敌对的意识形态的时期,仍旧既是现实的又是可能的。在世界的若干地区,现在甚至有不断增加的反抗现代化的迹象。

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是所有在任何时候进行的有意识计划的学习国际化(或者至少区域化)实验中最大的实验。这种发展意味着在欧共体各国,对学生,在学位和教学内容方面存在比现在更大的相似性;对教授,在薪水和晋升的标准方

① 李·米特冈:《全球教育》,1987年5月12日联合社电讯。

② 赫钦斯:《学习的社会》,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8年版,第70页。

面有更大的统一性,以便促进学生和教授更加自由地流动。例如,意大利可能如何受影响,又可能如何回应呢?意大利仍旧只有一种基本学位——学士学位(laurea):在较低的阶段开发一种文凭和在较高的阶段设置一个研究型学位的努力,以便更加接近标准的欧洲模式,这正遭到国内巨大的障碍。除此之外,多数教授和很多学生仍旧实行部分时间制。虽然意大利可能遇到最大的困难,而且由于刚才提到的很多其他的原因,所有牵涉到的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将面临改革。在学术界,改革非常艰难——不管一些教授有关别人事务的改革多么激进,高等教育机构有关他们自己的事务是最保守的。

应该注意到,虽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或区域化)有它的好处,但是它也可能要付出代价——特别是丧失多种多样的遗产。再者,可以注意到强调促进课程的“欧洲身份”和“欧洲维度”以及“教育中的欧洲形象”,听起来更像是学习的一种世界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方法。

从高等教育的长期历史来判断,可以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预言以下几点:

对于学习的共同市场的理念,在原则上可以欢迎,但是在细节上可以抵制。

改变实际的做法比改变正式的政策容易。

支持学生和学者的自愿的流动,比改革机构容易。

高等教育和比较具有竞争性的经济需要一致前进,这比挑战现有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更为有效。

赞同每个国家的遗产,比坚持欧洲的一致性更加聪明。

判断各个学生和教授成员的资格,比提供一个国际上可接受的学位的等价更加容易。而且无论如何,这种等价对他

们自己国家内部的学生和教授成员的压力,可以比较容易形成,使他们能有资格出国。

依靠教授在课程内容方面逐步改革的过程,比同意一个共同的欧洲课程更加有效。

世界范围的领域比地方范围的领域和对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的法律、医学及神学的古代专业更易接受改革。还有,诸如工商管理和计算机科学等新领域,比诸如哲学这种比较古典的领域更易接受改革。年轻的教授,他们由于机会增加,有更大授权,比年长的教授更易接受改革。

总的说来,布鲁塞尔通过好像担当一个基金会,比好像担当向旧的官僚体制挑战的一个新的政府层次,可能成就较大。特别是,基金会的方法,在财政上资助更加具有创新精神的更有活力的机构,比较为自满的机构有利——因而也是它们得到赏识和新的威信来源。这种基金会的方法的后果将是机构间更多的竞争,并作为有效的竞争的一个条件,在每个国家内部引起更多的行政权的分散。这种竞争和行政权的分散,可以促进和推动现代化和高质量的绩效,甚至比任何正式的管理规程可能完成得更加有效。

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获得成功,如果知识世界的领导确实要移动,那么现在由美国掌握的领导下一步移到哪里的问题可能就有一个答案。

结 论

高等教育机构现在已经存在了近两千五百年——头两千年在学生和学者的赞助下,有些地方在教会的赞助下,采取漫游学者的模式;近五百年越来越多的是在民族国家的赞助和控制之下。

有两千年时间,学者首先是一个学者,然后有五百年越来越成为首先是一个公民。现在在一个新的更加大的学习的国际化的时期,来自超越国家机构的不断增加的支持正在发展之中。同时,虽然学者仍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也正在更加变成全世界学术界的一个公民,因而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两个世界,具有双重公民身份。但是我们距离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现在叫做世界范围)的学习社会的知识黄金时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再一次构成像教会的独立阶层,仍旧很远。事实上,它们现在多数更加处于在民族国家内部被控制的公用事业的地位。

同时,预期在长时期内,高等教育机构生来就是国际性机构,它们多数致力于普遍性的学习,但是它们仍旧处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距离完全解决在高等教育的国家目的和学习的国际化之间仍旧存在的这种冲突还是很远。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因而,最为幸运的是现在国家的目的一般完全和学习的国际化一致,甚至确实支持学习的国际化。

我自己的信念是,纯粹的学术生活模式的至高无上这个方向和民族国家的合理指导一致,这是非常长期的趋势。但是,一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20世纪知识界的最大事件,似乎很可能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一段时间德国退出和现在重新加入其他知识界,是世界科学在学术界的崛起和美国在科学领域的兴起,是现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努力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国家障碍的欧洲知识界的共同市场。高等教育从民族国家的趋异走向几乎比较普遍的重新趋同,在那里,大学通过服务于学习世界而更好地为它们的国家服务,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转型。

附 录

教育中的全球观点

下列文件是《美国为未来作准备》^①一书的节录。这个文件原来打算用于高中学生,但是,照我的意见,用于高等教育比较好,部分原因是在内容繁多的高中课程中,没有安排余地。这个文件是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草拟的。^②这个建议不仅与学习的国际化有关,而且与界定现代世界自由教育的一个可能途径有关。

美国的教育制度预期将应付许多强化的需求和挑战,因为美国人历来转向学校为解决新的问题改进技能和提供知识。学校为了参与古德莱德(John Goodlad)所谓“人类的对话”(the human conversation)这个人类感觉、思考、行动和表达的比喻,提供人们需要的很多基础学问。^③这种“对话”既有个人的作用,又有公共的作用。个人的作用与文化读写能力

① 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克尔),《美国为未来作准备:教育中的全球观点》,(纽约:教育中的全球观点,1987),17—22页。

② 成员是:克尔,主席;克利夫兰,教育中的全球观点委员会主席;古德莱德,副主席;阿瑟斯、博耶、布拉戈、克林顿、多齐尔、爱德华兹、富特雷尔、霍乔、洛伊、纽曼、诺瓦克、皮尔斯、兰德尔、斯科特、香克和杨克洛维奇。

③ 古德莱德:《在世界中心的学习者》,载《社会教育》50卷6期,1986年6月,第424页。

有关,这是为个人的道德发展和个人交往提供基本技能和知识的核心。公共的作用是“公民职责”的组成部分,指望人们对公共政策许多问题进行考虑、分析,然后付诸行动。今天极少公共政策问题没有国际的或全球的成分。

学校并没有对越来越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公民教育任务充分地做出反应,它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它们提供的教育中对美国公民的全球需求。问题与其说是学校已经发生变化,不如说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和已经成为一个生活更加困难的地方。纽曼(Frank Newman)注意到:“如果说今天美国在教育上有一个危机,与其说是测验分数已经下降,不如说是我们在提供公民教育方面失败了。公民教育仍旧是国家学校和学院的最重要的责任。”^①

学校应该强调为在现代世界有效地尽公民职责提供基础和坚实的知识以及分析和参与的技能,但是它们不能仅仅做这些。对在学校场所的努力的支持必须发源于国家和地方的教育委员会及学校所服务的社区。同时,必须为教师和学校场所的行政人员提供灵活性,使一般的课程主题适应特定学校和学生的需要。

我们设计了在未来的公民中培养比较合适的全球观点的教育计划,确认了四个基本的主题。

1. 对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系统的世界的分析

学生应该按照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② 精辟描述的有

① 纽曼:《高等教育和美国的复活》,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85年版,第31页。

② 博尔丁:《世界作为一个总体的系统》,1985年。

关世界的自然的、生物学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通信和评估系统,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巨大的相互依赖的性质。

(1) 自然系统——大片陆地的形态及其运动,诸如火山不稳定的迹象、空气和水环绕世界的流通、气候的起源和多样性以及诸如资源在地理政治上的重要性、战略性的部署和与敌对国家的邻近等其他特征。

(2) 生物学系统——地球上一切生物的聚集体和它们的栖息地、生态系统以及特别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关系。

(3) 经济系统——巨大的世界社会系统中处理劳动、生产过程、交换和消费的那个部分。

(4) 政治系统——国家、主权、合法性、领导、权力和权威等概念,在诸如集权主义、权力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不同的政权,如何进行决策。当然,政府是政治系统的基本部分,但是,博尔丁指出,“所有人类的组织,甚至家庭,都有政治的一面”^①。

(5) 通信和评估系统——语言和其他交流形式,诸如艺术,包括环球信息和问题即时交流的新技术工具。^② 不服从稀少、秘密、所有制或垄断的经济规律的全球范围信息的流动。更确切地说,是根据分享的信息的流动。通信革命主要有助于我们世界的新的相互联系。美国现在是世界范围知识生产和信息交流的主要中心。评估伴随着信息,这就要求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民如何评估他们所收到的信息和

^① 博尔丁:《世界作为一个总体的系统》,1985年版,第119页。

^② 克利夫兰:《我们使我们的学校儿童对这个世界作好准备》,载《社会教育》50卷6期(1986年6月)第416—423页。更详细的讨论,见克利夫兰:《知识的执行者:信息社会的领导》,纽约达顿出版社,1985年版。

形成意见。

2. 关于近代文明发展的观点

学生应该具备有关世界的历史和主要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包括历史上有关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伟大实验之一的美国知识。学生还应该了解曾经鼓励或阻碍文明发展的地理因素。

历史的观点使人们能够把他们自己放在一个有将来和有过去的时间的顺序上,而且放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没有一个一般的时间和地点的观念,要了解在构成人类历史的一长列事件中,你是何许人,或者你位于何处,那是困难的。没有这种观念,一个人可能成为当前和接近场所的俘虏。

(1) 学生应该能识别和应用诸如文化、民族主义、技术、公正、和平等等一般的观念或概念,使用从历史、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引用的信息和分析。

(2) 通过其他时代和地点的学习,学生应该增加他们了解什么东西激发别人和建设性地处理多样性和模糊性的能力。正如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说,整个人类有一部历史,“历史学家也许希望像他们了解什么东西团结比较小的群体同样牢固地了解这部历史。一部明白易懂的世界史,可以指望通过培养个人和整个人类的胜利和苦难打成一片的意识减少群体冲突的致死性,而不像狭隘的编史工作所不可避免的增加冲突。”^①

(3) 学生应该考察而且能说明古往今来变革的原因。正

^① 麦克尼尔:《虚构的故事和其他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如赫拉克里特斯在两千五百年前指出的,“一切都是不断消长”。变革是生活的一个不变的事实,各种不同的理论被提出来解释历史和文化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学生应该熟悉最重要的变革,例如,麦克尼尔认为跨越文明边界的接触是多数重大变革的原因:“因为每当一个人遇到某种奇怪和新鲜的东西时,特别是当新奇的事物看来也比以前熟悉的东西优越时,惟一明智的反应是对新奇的事物做些什么。一个人可能试图占有这个新的东西,通过学习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东西,把它成为他自己的东西……一个人能够不理睬使人引起不舒服的人和事物,并且希望他们不再出现或者设法凭借暴力把他们赶走。但是要排除一个真正吸引人的新奇的东西,通常需要强有力的地方技能和机构。”^① 按照这个观点,在边界的接触,和通过迁居与旅行迫使文明或者进行内部变革以抵制外部的挑战,或者采用或适应新的事物。

3. 关于文化的理解

学生应该能够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

(1) 学生应该具备对美国社会的透彻的知识和理解: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和它的外国历史背景、它的政府结构,特别是构成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的原则和价值观。他们应该能够领会美国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了解艺术、文学和宗教所包含的文化的价值观,并且懂得人种、年龄以及种族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群体对我们变化中的人口构成的民主生活方式的含义。每个人都参与若干亚文化群:他是家庭的一个成

^① 麦克尼尔:《虚构的故事和其他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员,有一个宗教的背景,是富裕还是贫穷,讲一种主要的语言,而且是各种组织的一个成员。学校本身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并能作为学生考虑这些问题的模式。这在美国的大都市地区尤为正确。

(2) 学生应该学习全世界的文化体系,并且了解包括来到美国或者被带到美国的那些人在内的全世界不同的个人和人群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3) 所有阶段和不同年龄的学生应该能够理解,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模式,怎样会是共同需要的不同反应。学生需要发觉和任何别人并不完全相同的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个人观点,并且懂得别人的观点可能也具有正确性。他们也需要理解,他们是独特的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独特的美国文化发展了它自己对普遍的需要反应。考虑不同的人和文化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对共同的问题做出反应,应该引导学生理解和懂得多样性。

(4) 学生应该能够描述普遍的人类的价值观,诸如在全世界人权宣言中概括的那些价值观。例如,这些价值观包括“人的生活、自由和安全的权利”;不受“折磨或者残酷的、无人性的或卑劣待遇或者惩罚”的权利;“工作的权利”;“适合个人和家庭的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标准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休息和娱乐的权利”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的权利”。^①

4. 使公民准备制订公共政策

^① 《联合国大会 217A(Ⅲ)决议》,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10日通过。

学生应该在所有学校计划的各个阶段,积极地从事分析的和创造性的思维,提高他们认识概念、问题和争端的能力,解释它们的能力,确定信息需要的能力,分析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的能力,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以及做出负责的公开选择的能力。

(1) 学生应该知道与若干学科有联系的各种不同的思维和概念分析的模式——科学的方法,历史的分析,艺术和文学中的批判性的评价,以及伦理判断的标准。他们应该知道如何适当地应用这些模式,并且表明在使用如历史背景、互相依赖、多样性、多重观点和冲突处理等概念的熟练情况。这些概念,甚至非常年幼的儿童当他们环顾他们的教室时都能清楚地知道。

(2) 未来的公民,今天的学生,应该能够识别在学校、地方、省、国家和全球层次影响他们的公共政策问题,并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为了进行文明的和建设性的辩论的目的,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个多元化社会内部所有的可供选择的观点,特别是不是学生所共同的观点。了解“另外的方面”是重要的。

(3) 学生应该能够分析一个当代世界的问题,包括它的历史的和政治的背景;识别关键的行动者;预期行动者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它们可能的后果;了解激励行动者的不同的价值观、假设和感觉;并且了解问题影响其他问题或者受其他问题影响的方式。

(4) 获得面临今日世界的主要问题的大量的知识,和学习鼓励人们了解自己和他们的世界分析思考的技能同样重要。如果一个人要成为地方、国家和世界背景中的一个有效的行动者,这些技能是必需的。这些是使一个人能够解开复

杂性和发现种种联系的工具,而且学校明显地具有发展这些技能的责任。

同样,综合的思维的技能与零碎的思维形成对照,应该同时得到鼓励。学生需要积极地参与考虑许多穿过学科分界线的问题,以便获得对许多问题和解决方法的比较大的观点。真实世界的问题很难准确地属于我们指定作为学校科目的范畴,而是涉及种种科目的方方面面,需要来自很多学科的思想和方法。

考虑准备学生积极地参与公民训练的教育任务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建立在区分“舆论”和“公众判断”的基础上。贝拉(Robert Bellah)指出,“公众”意见调查实际上是“个人”意见调查:它们对与广大社区没有联系的个人的观点进行典型调查。另一方面,有关公共福利的判断,在经过听取个人意见,发现矛盾,进行修改,锻造成为虽然超越私人利益而又包括私人利益的政策以后,从“在公开讨论的场所中经过检验的意见”中产生。^① 杨克洛维奇(Daniel Yangkelovich)把舆论说成“不管公众的观点多么含糊,混乱,无情报根据和布满情感,代表着此时此刻公众观点的奇想”。公众的判断只有在人们已经被“暴露在赞成和反对各种主张的许多论据”之后,和在他们已经“足够深入地接受他们自己的信念的后果的问题”之后。^② 怀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也曾评论说,在发展公共政策时,“学习要求有关的当事人能够沟通和检验假设场所,并非

① 贝拉、马德森、沙利文、斯威德勒和蒂普顿:《内心的习惯: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承诺》,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② 杨克洛维奇:《公众如何学习公众事务》,《凯特林评论》,1985冬季,第9页。

他们第一次选择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选择的一次投票”^①。

达到公众判断的这些技能的发展正是在这里为学校建议的一个模式。在合适的地方,应该鼓励学生使用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参与在学校层次或社区层次的政策制订。他们可以组织讨论问题的论坛,或者为他们的立法者提出他们的研究、分析、判断的结果。参与发展将会影响他们的规则和课堂实践,甚至对最年轻的学生都是可能的。学校有责任帮助学生发现在政策领域建设性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方法。

这种参与公共政策的分析,必须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它的斗争以及它的缺点和优点的理解有深厚的基础。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响应它的成员作为公民,作为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愿望,进行改革。这些愿望极其重要,它们不但需要经过缜密的思考,而且需要得到精当的表达。表达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以内,而且必须是有说服力的,而不是强迫的,还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民主不应受到任性的利益集团的欺诈和威胁性的策略利用,不管这些利益集团是多数还是少数。公共政策参与的机会、义务和适当的限制,都需要进行探索。选择的自由伴随着自由的负责运用。

^① 怀尔达夫斯基:《对权力说真话:政策分析的艺术和技巧》,波士顿,布朗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3 页。

第二编 传统对平等和优秀

引言

以下三章探讨影响高等教育的古代的,也许是永恒的一批冲突。高等教育应该服务于和促进传统(常常包括根据遗传的阶级地位允许学生入学),还是平等;是优秀,还是三者的某种结合?在多数国家,目前的情况是所有这三者的结合,遗传丧失阵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平等几乎有把握地获利,但是优秀提出强烈的当前的(而且很可能是永久的)要求,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竞争提前提出它的理由的时候。

在高等教育领域仍旧占有优势的民族国家,正给高等教育机构巨大的负担。他们想要在同一时间更加强调平等,又更加强调优秀,而对高等教育内部的传统的吸引力和价值观并不十分敏感。

第三章探索这三方面的冲突,特别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冲突在多数国家已经强化,而且将延续到可预见的将来。本章试图解释传统的控制,不仅特别像以下所指出的,在英国和意大利,而且在很多其他国家,曾经那么强烈。但是现在,传统几乎普遍受到平等和优秀的要求的挑战。

我们需要在某点或另一点上承认传统的贡献,和为了国家组织的原因,回应正在发展的平等的要求,并且为了经济的原因满足增长中的高技能和更好的技术的要求,每一项本身

就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合起来困难就大大地复杂了。

第四章着眼于平等的若干定义。这方面的争论使传统和变革的对抗以及在变革内部,优秀和平等的对抗,极大地复杂起来。在任何一个国家,传统是相当容易描述的。根据优秀提拔个人,意思是选择和提拔那些具有更高的能力和动机有效地进行生产的人们。在这里,我并不分开讨论优秀的复杂性,部分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像平等的概念那样困难的一个概念,但是也因为它的很多困惑的方面在第七章被提了出来——如何界定优秀,以及优秀一旦得到界定,如何判断。无论如何,平等非常复杂,对不同的人能够意味着若干不同的东西,而且激进的观点常常持有它的最合适的定义。

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包括传统和平等的矛盾的三角形的第三角是优秀。全世界,但是也许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英国和美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的贡献的充分和不足问题,从来没有被这样强调过。但是,强调更高的能力,应该比仅仅强调经济包含的更多。比较丰富的知识和能力也有助于健康,有助于政治生活的进行,由于促进文化生活,有助于环境保护,有助于其他很多东西。

高等教育在服务经济方面,优秀的检验特别和多数在于科研的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可用的技能的充足。我曾经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忧患时期》一书中,在“高等教育和经济——一个越来越占优势的联系”的标题下讨论过这个“第三角”。

第五章着眼于平等主义的压力可能在高等教育的运行中削弱优秀。很多比较古老的精英高校教授一度担心一切都失去了——增加学生人数和添加任务将会使他们长时期来所熟悉和非常崇敬的高等教育降级。看来这并非普遍的后果。

第三章 积累的传统面对现代的需要^①

这篇演讲使我认识到我处在传统的狮子洞穴——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西方文明中,这个最古老的大学系列被拴在它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其他大学被这样拴住过。我尽可能文雅地说,旧瓶和新酒适合。我并没有觉察到,除了那些很熟悉意大利,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参加者以外,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传统和新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现在可能在意大利最大,它们在一种程度或另一种程度上普遍存在。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讲,意大利的情况最坏,它保持了旧的结构,只有一类高校,大学——和只有一种学位,学士学位(laurea)。于是它通过敞开大门,学生一下子淹没整个系统,抛弃了世袭的入学的阶级基础。就内部结构而言,传统胜利了;但是就学生入学而言,平等胜利了;而优秀乃是受害者。

应该指出,传统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有着若干固有的维度。它可以包含同一性的永久存在,或者只是相似性的永久存在。高等教育机构多数属于第二类,而且它们和宗教团体

^① 本章以我在立法研究所(Agenzia di Ricerche e Legislazione, AREL)的赞助下,于1987年1月27日在罗马所作的一次讲演为基础。较早的一个文本以《大学界的一个关键时代:积累的传统对现代的需要》为题,载《欧洲教育杂志》22卷2期(1987)。

相同,通常比多数其他机构保存更多的相似性——两者中没有一个曾经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而且两者都是社会的特权部门。但是有些相似性可能比其他相似性保存得更多。在高等教育,这种相似性包括教学方法、校舍和建筑风格、头衔和学位礼服的礼节,以及教师和学生的地位结构。在使用新的方法和对宗教教义或对古典语较少限制的科研中,在包括涉及外部行政当局的行政管理中,以及在常常越来越不相同的外部服务活动中,不同比较大。随着近代文明的兴起,高等教育的背景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过去一个多世纪来,高等教育已经从为需要学问的职业和高层次的文职人员服务,学生来自社会的比较处于有利地位的部分,位于社会边缘,与行会相像的地位,前进到比较中心的位置。这种比较中心的位置包含为更多专业、职业和行业——潜在地为全体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或者更多劳动力——服务,以及潜在地使人口的所有部分的成员可以入学。国家的财富,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依靠高等教育的工作,通过高等教育做出的贡献,开发人力资本和积累知识,以及直到最近,有助于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国家政治的兴旺发达过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依靠高等教育帮助在全体人口中创造更大的机会,和打破遗留下来的阶级界线。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理由,高等教育对社会的太多部分和太多人民来说,已经变得太重要,以致国家不能完全不管。^① 不

^① 例如,高等教育的重大结构改革现在正在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进行,意大利、西班牙正在尝试。近几十年来,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瑞典、法国和挪威,已经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

再有任何被深沟围着的象牙塔。这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令人遗憾的。这也是确实的。

我考虑今天在起作用的改革的巨大力量是：①现在各国之间比较大的竞争所表明的每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②国家组织对更大的机会的需求。后一种力量包括在觉醒的人口中对终身学习的需求。这反映着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出现的变化中的人们的爱好。他们受的教育越多，越要求受更多的教育。

这些需求在历史上并不完全是新的，但是就它们对高等教育的强化的影响和世界范围的基础来看，它们是新的。特别是，对更大的机会的需求，是对大学堡垒的一次很近的冲击——在它导致在法律面前更大的平等和在政治进程中选票的分配以后很久。巴士底狱是在 1789 年被直捣的；巴黎大学在 1968 年才受到猛攻——差不多两个世纪之后。

积累的传统和现代的社会需要之间的对抗，对大学来说，现在正导致八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危急的时代。在 1960 年左右开始并继续到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这个危急的时代，虽然强度有变化，它的第一次浪潮的主题是更大的机会，现在正扎实地进行着。而且也继续到可以预见的未来的第二次浪潮，它的主题不是机会而是能力。因此这些各自的需求十分明显并不完全一致——而是相反，因而引起巨大的紧张，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受影响。（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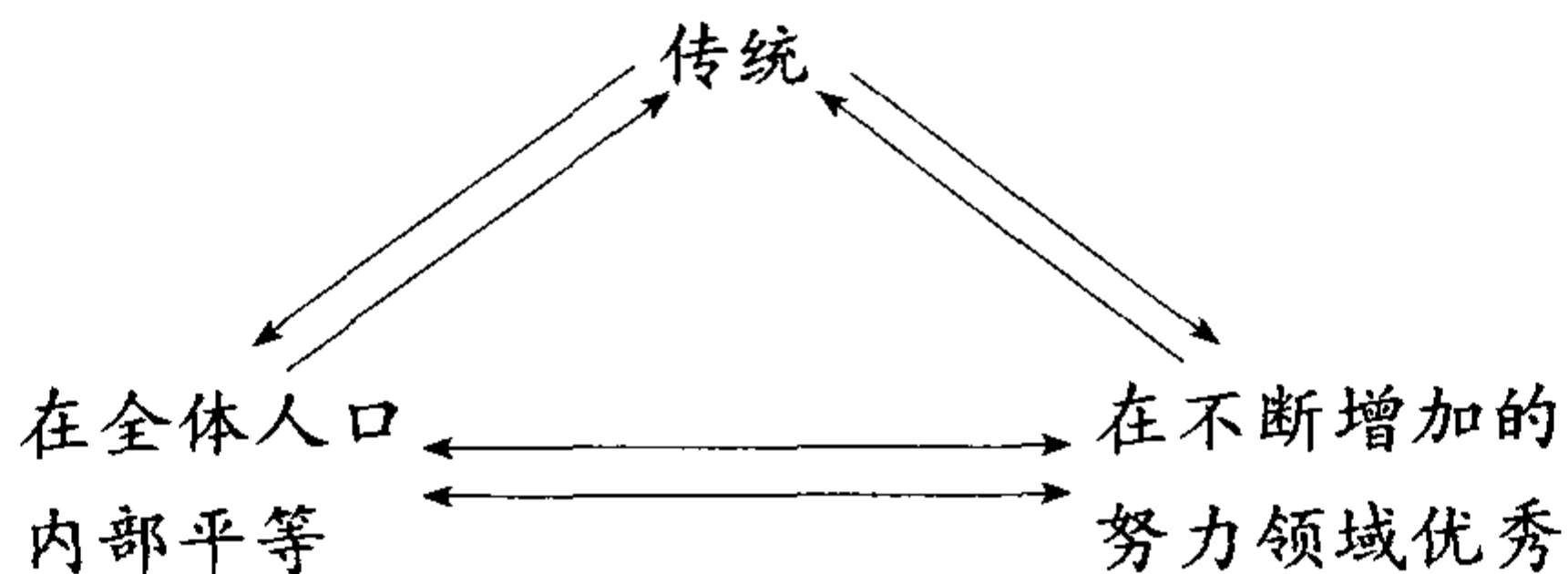


图 1 影响高等教育的对抗的三角

传统对变革

这些现代的需求正下降到最不接受变革的两批人类的机构之一——教授的行会和牧师的团体。^①

赫拉克里特斯说，“除了变革以外，没有什么什么是持久的”。关于历史上的大学，可以说，其他一切都变化，但是大学多半是持久的。西方世界在 1520 年以前建立的大约 75 个公共机构仍旧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有着类似的功能和未中断的历史，包括天主教教会；马恩岛、冰岛和英国的议会；若干瑞士的州的管理结构；锡耶纳银行，以及 61 所左右大学（见表 1）。统治百姓的君主，有着附庸的封建领主，拥有专利的行会全都消失了（现存最古老的商业单位是贝雷塔家族于 1560 年在意大利创办的）。但是这 61 所大学大部分仍在同样的地点，拥

^① 有关遗传和环境对高等教育的双重压力的极好的讨论，见阿什比的《明天世界的象牙塔》，载《高等教育杂志》38 卷 8 期（1967 年 11 月）。

有一些同样的校舍,教授和学生从事很相同的事情,学校管理按基本上相同的方法进行。确实,对于古代的主题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是,教学、学术研究和 Service 这种永恒的主题,以一种或另一种结合的形式继续存在。从内部来看,它们若干功能和它们的指导精神的重点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外部和比较地来看,它们是所有公共机构中变化最少的机构。

事情怎么能是这样呢?大学仍旧培养很多同样的产品——神学、教育、医学和法律,以及学术研究的更多精通某门学问的专业的成员。大学还没有受到像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受过的任何巨大的技术变革。教授成员大部分继续作为个体手艺人操作。大学像教会那样通常因袭地对十分异常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控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部分地因为差不多在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几乎一直来受到上层阶级的保护,不管这些阶级怎样构成。大学偶尔通过它们内部进行的改革帮助改变世界,但是,它们自己比世界其他的多数机构的变革要少得多。

表 1 西方世界历史悠久的大学

建于 1200 年以前

波洛尼亚大学(Bologna, 意)

摩德那大学(Modena, 意)

牛津大学

帕尔马大学(Parma, 意)

巴黎大学

建于 1300 年以前

剑桥大学

科英布拉大学(Coimbra, 葡)

里斯本大学

蒙彼利埃大学(Montpellier, 法)

那不勒斯大学

帕多瓦大学(Padua, 意)

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

锡耶纳大学(Siena, 意)

图卢兹大学

巴利阿多里德大学(Valladolid, 西)

建于 1400 年以前

科隆大学

克拉科夫大学(贾吉洛大学)

弗拉拉大学(Ferrara, 意)

佛罗伦萨大学

格勒诺布尔大学

海德堡大学

奥尔良大学(Orleans, 法)

帕维亚大学(Pavia, 意)

佩鲁贾大学(Perugia, 意)

比萨大学

布拉格大学(查尔斯大学)

罗马大学

图尔大学(Tours, 法)

维也纳大学

建于 1500 年以前

阿伯丁大学

马赛大学

巴塞罗那大学

巴塞尔大学

波尔多大学

卡昂大学

卡塔尼亚大学(Catania, 意)

哥本哈根大学

弗莱堡大学(路德维格大学)

热那亚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Ernst-Moritz-Arndt 大学)

莱比锡大学(卡尔马克思大学)

卢万大学

美因茨大学(Johannes Gutenberg 大学)

慕尼黑大学(Ludwig Maximilian 大学)

南特大学

普瓦蒂埃大学(Poitier, 法)

雷恩大学

罗斯托克大学

圣安德鲁斯大学

萨拉戈萨大学(Saragossa, 西)

塞维利亚大学(Seville, 西)

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 大学)

都灵大学

乌普萨拉大学

巴伦西亚大学

建于 1520 年以前

哈雷大学(哈雷 - 维滕堡马丁路德大学)

马德里大学

圣地亚哥德科姆坡斯特拉大学

乌尔比诺大学(Urbino, 意)

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

第一次变革的浪潮的经验

第一次变革的浪潮的重大主题是更大的平等——在入学机会方面、管理方面和专业的地位方面,但是这一次浪潮的主题有着很多其他方面。无论如何,尽管中心主题的力量,过去二十五年的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经验,乃是在回应这个主题时出乎意外的大学内部结构的稳重的改革。我强调大学内部结构这个短语,因为在这些结构外面和周围,在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和构成方面,确实发生了改革。第一次变革的浪潮导致很多新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现有的各大学除了规模以外,出乎意料地保持未变。试图进行的改革采取很多形式,对七个欧洲国家试图进行的四类改革的研究发现了三个方面的部分成功:①在扩大入学机会方面;②在有助于区域开发方面;③在引进短期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在探索综合大学改革

方面一次失误,而且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① 如果扩大这个单子,总的说来,部分的成功可能分量小,而失误分量大。例如,课程改革,特别在跨学科方向方面,几乎全部失败。而且,管理方面试图进行的改革,至多只是成败参半,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曾经是一个灾难。

但是有很多试图进行的改革具有潜在的价值但未完成。这又是为什么?首要的原动力是学生。他们没有持久力,而且他们的努力迅速地朝很多方向分裂。而且,他们的方法几乎到处与教授和很多群众对抗。在若干国家,次要的原动力是当权的政府,以游击的方式并在压力之下行动。但是政府有变动,即使仍旧当权的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注意广度短浅,而且常常很少了解学术生活。可是,特别是人们对于教授,尤其是资深教授,终究能走他们自己的路,必然有深刻的印象——无论何时和无论何地,那条路主要是维护知识结构和学校管理的现状。此外,那里有独立的科学院,即使面对强有力的政府,有权施加它们的影响反对结构改革,如在前苏联。

要解释的现象,并不是大约在1960年开始已经在大学发生并且对20世纪剩下的时间具有重大影响的许多改革,而是没有持续的所试图进行的改革。只有在1969年的意大利,所发生的变革对现有大学的知识生活产生了根本和永久的影响。在意大利,是保留它们历史的形式,但是注入大量学生淹没它们。另一个极端,例如英国,在这个时期,先前有的大学内部,几乎没有显示什么痕迹。

^① 塞利奇和萨巴蒂:《巨大的期待和成败交织的业绩》,巴黎欧洲教育和社会政策研究所,1986年。

然而,第一次浪潮的中心主题在全世界仍旧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这股巨大力量——机会的力量——的最终结果还不能预见。它已经在很多地方产生一种自称的权利的新的传统,这种新的传统具有它自己的巨大力量。而且还有一些人要超出机会的更大平等,走向结果的完全平等。

总的说来,人们从这一次经验,对于各个先前存在的高等学校内部的传统的持久的力量,必然有着深刻的印象。学校在学术上越是精英型,它们的内部结构越是保持完整无缺,反对挑战。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变动。新的高校建立了,主要是技术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两年制的高校,如在挪威、法国和前南斯拉夫。很多先前存在的高校扩大了规模。当多数高校控制学生入学时,如在英国和美国,它们变动最小。在瑞典,政府拓宽了入学政策,资深教授逃避到研究生训练和科学研究。在意大利,政府广开校门,有些教授建立小型的保护飞地。但是,即使到处学校被学生淹没,内部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当政府通过建立新型的,而且常常是不同类型的高校,顺便触及先前存在的精英型高校堡垒时,他们是成功的。但是什么地方有传统,什么地方传统大部分获胜。比较精英型的高校大部分仍旧是它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但是,高等教育系统并没有传统,政府几乎更加自由改变它们的构成和规模。

第二次浪潮的经验

虽然 60 年代和 70 年代尝试改革的伟大时代现在已经在 我们背后,当我们走近 20 世纪的终点时,我们仍旧面对学校传统的非凡力量和现代生活的紧迫需要之间的强化的冲突的另外一面。

尝试的改革的新的冲刺是要改变大学,常常违反它们的意愿,但是甚至要更多地改变高等教育系统的其他部分,以适应在极大地加速的国际经济的竞争和暂时的军事竞争中它们所需要的新的技术和更高的技能,目的是国家和地区的进步。注意的领域是生产过程,改革的压力的来源是政府、社会的生产手段,以及那些为新的职业寻找培训的学生。这个新的冲刺在所有先进的工业国都存在,而且力量正在增长。^① 第二次浪潮已经导致更多地强调技术大学和多技术学院、独立的工商管理学院以及工程学院,不管它们设在何处。历史性的大学比被强制更加受比较多的金钱的引诱——第一次改革浪潮的教训明显地学到了。

在上一次,尝试的改革不是指向更高的能力,而是指向更多的机会的若干方面。对这种改革做出反应,走得最远的国

^① 参见盖·尼夫《在转移的沙土上:1984 至 1986 年欧洲高等教育的变化中的重点和观点》一文中的讨论,载《欧洲教育杂志》21 卷 1 期,1986 年;也见尼夫《在往硅谷的路上? 西欧高等教育和政府之间的变化中的关系》,载《欧洲教育杂志》19 卷 2 期,1984 年。

家,包括意大利,现在在对新的冲刺做出反应时,更加不利。在上一次,改革指向政治过程中权力的转移;这一次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经济领域的绩效。在上一次,尝试的改革主要地来自内部——来自学生和来自“左翼”的他们的教授同盟者;这一次,尝试的改革主要地来自外部,而且作为经济上的必要性问题,不是政治上的偏爱。进攻者变成防御者;防御者变成进攻者——如在法国和意大利。

作为例证的目前的冲突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同事特罗(Martin Trow)^①在英国的一次报告中考虑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最神圣的传统——金本位。金本位要求寄宿制的学院;要求对所有除最富裕的学生以外的学生给予全年的财政资助;要求在所有大学层次的学校的师生比为1:8或1:10;要求不同大学所授学位具有可比的学术价值。这一切是很令人钦佩的,而且英国可能希望继续这种传统。但是,它有它的代价。英国已经为它的同龄人的15%以下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当保持金本位的时候,它没有方法在这个水平上提高很多,结果是加大阶级区分的永久存在和缩小对经济发展的资助。这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好处是一个极好的,但是有限的高等教育系统,而且是一

^① 特罗:《学术标准和大众化高等教育》,载《高等教育季刊》41卷3期,1987年夏季,第168—292页。但是自1987年起,英国高教系统已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个强有力地承认英国传统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个高教系统现在正在变革的过程之中。

但是在西方世界,一个被拴在它的传统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最好例子,不是英国的高教系统,而是意大利的高教系统。这个传统由以下三个方面合成:①完全依靠大学,而且仅仅依靠大学,为国家的高等教育需要服务,同时在大学内部,它们的专业学院占优势——这两者都来自意大利的历史;②大学内部的大权掌握在正教授之手,来自德奥传统;③强有力的中央管理权力,仿效法国拿破仑的模式。

今天的整个大学界,对意大利大学的历史贡献负了一大笔债。四个多世纪(1200—1600),时间远比西方世界任何其他大学系统都长,它们处于大学发展的中心。从波洛尼亚大学开始,它们从穆斯林世界的著名但已凋谢的文教机构接过来,把高等教育引进欧洲,然后经由西班牙,传到拉丁美洲。它们通过引进特别是在法律和数学方面的训练,支持意大利各城邦所领导的伟大的商业革命;它们从萨勒诺大学把医学接过来进一步发展,并且仿效亚里士多德,重视哲学,同时它们建立法律、医学和教学等高层次专业的培训,作为大学主要贡献。后来,它们(特别是帕多瓦、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大学)领导了第二次意义深远的革命:把经验科学引进高等教育界。科学的医学和与医学、数学、天文学及其他领域中如植物学相关的科学,都发展到那时已知的最高水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意大利的大学为后来很多世纪几乎各处的所有大学开创了学术努力的总纲。但是新的模式已经开发,意大利模式尽管它本身在变,它比任何其他模式更多地反映它的传统。

同样,英国和意大利系统以外的其他许多高教系统,将会

甚至应该避免全部或者大部分和比较新的模式趋同。但是现在世界范围的趋势是走向新的模式。目前的挑战是不仅要使许多比较新的机会和能力的力量彼此协调,而且要使这两方面的力量和传统协调。

可以指出,其他许多机构,诸如银行、军事系统和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工业,在它们使用最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已经通过趋同的过程,到以被认为优良的实践为基础的世界范围的行为的相似模式。和知识有关系的机构,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经受同样的过程,这似乎是合理的。

目前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危机的实质,是改革对传统以及改革的一种力量(走向个人之间更多平等)对另一种力量(走向个人内部更大的能力)的双重对抗。未来各高教系统的形式,主要将视这些对抗的结果如何而定。

现在重大的挑战是必须把机会和能力这两个主题尽可能结合好。这引导我以后(第六章)讨论似乎在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趋同模式的涌现。与其说趋同将发展到单独一点,毋宁说趋同将是小范围的抉择。而且这个范围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能随着经验的积累发生戏剧性的变革。这也不是暗示传统的破坏或者应该发生,或者将会以任何普遍的方式发生。但是这确实暗示某些传统的形式有它们的代价,这些代价应该被了解,而且有时进行了一些改革。

从过去八个多世纪来的西方高等教育史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在各个机构的生活中,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虽然它确实有了让步,但却是勉强让步的。因此,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改革比较容易进行。改革高等教育系统要比改革高等教育内部的个别机构容易。

第四章 “平等”：由平等的意义引发的争论^①

1974年我在东京演讲，反对海克(Friedrich A. Hayek)。海克和弗里特曼(Milton Friedman)一起，是当地最被像偶像一样崇拜的经济学家。他论证说，只有“在法律面前平等”是“和个人自由一致的”；我论证说，我们需要越过那个概念，严格地做到这一点，甚至对自由更有好处。他说，“使人民平等的尝试，必然导致不平等地对待他们”。在补偿的行动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人民已经由于以前的环境，被不平等地对待了。他也说，“一个彻底平等主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完全极权主义的社会”。我会同意。但是我要指出，一个部分比较平等主义的社会，可能更加公平和公正，而且也能对更多个人根据“生活机遇”提供比较有效的自由。^②

① 本章原系提交东京当代社会自由和平等学术讨论会的论文(1974年)。

② 参见达伦道夫《生活机遇：社会和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一书中有关生活机遇的讨论。达伦道夫说：“生活机遇是个人发展的机会，实现才能、愿望和希望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是社会条件提供的。”又见阿玛蒂·森《什么东西的平等?》一文的讨论，载马克马林编，《人的价值演讲集》第一卷，尤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220页。森提出“基本能力平等”的概念，包括“营养要求”、“衣服和居住”、“走来走去的能力”和“参与社区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包括通过教育)。

我根本不同意海克的中心观点,即“在法律面前平等”或者可以称之为“政治平等”的东西,能够而且应该和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分开。这两者必须一起看。政治平等创造机会改革在经济中发生的事情——而海克根据他更喜欢的包括“按功绩分配”的哲学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希望改革。但是这里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在政治平等的制度之下,你怎么能从政治组织保护经济呢?还有,如果个人没有合情合理的平等机会受教育,有效地参与政治过程,雇用律师代表他们,政治平等能真正起作用吗?此外,如果存在对国内安宁带有潜在消极影响——而且可能发生地方性的阶级冲突的完全无约束的和无调节的经济不平等,政治平等的制度能很好地起作用吗?我相信,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性质必须是合情合理。

提示:亚里士多德说过,“革命的情感的普遍的和主要的起因是要求平等的愿望”。

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把平等看做美国的重大主题,但是强调平等能既威胁自由,又威胁卓越。

本章对第三章图 1 增加一些内容。在“全体人口内部的平等”标题下增加以下一些可能的定义:公民平等不受一切管束;在法律面前平等;机会平等;机会补偿平等;资源的补偿再分配;分摊平等;结果的补偿平等;人人结果平等。

近代民主社会被迫同时做到:增加个人自由和增加经济平等。

对更大的个人自由的需求由以下各种情况造成:比较高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富裕程度;旧时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减少;遗传的阶级地位的下降;个人自我实现的思想的兴起;随着大众传播工具的兴起,对全世界形形色色的生活模式的较

多的认识；个人作为消费者享有大量选择的机会；在劳动力市场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流动性；在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方面越来越依靠自觉，不依靠强迫；在现代生活的很多复杂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个人进行琐碎的控制。

对较大的平等的压力，由产生对更大的自由的愿望相同的一些力量引起，特别由强调个人实现的现代心态引起。其他来源包括提高期望的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侵扰广告；对别人的幸福的新的敏感性，较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组织能力；寻求获得和属于多数的成年男子同样水平收入和权力的妇女、青年和属于少数的群体的新的期望和对他们的价值的新的意识。还有，对大多数人来说，贫穷不再是生活的一个必需的条件，而且扩大平等的新的方法，诸如所得税和福利费，已经设计出来。社会保障运动——健康、事故、失业和老年保险——乃是一个争取条件更加平等的活动。

“一人一票”的民主，创造为多数人离开富裕和有影响的少数人重新分配收入和权力的可能性。强有力的思想已经在起作用：“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思想和“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人性包括一个妒忌别人的因素，以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同样好的信念。

也许自由和平等两者都不能否认，因为各自背后的动力是那么强有力……但是两者都不能走到极端而毁灭自己：全面的自由导致混乱，从而导致个人自由得以保护的条件的终结；而且条件的全面的平等，要求一种集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使条件平等的权力的分配是最不平等的。两种思想，它们的极端形式都是自我毁灭性的。两种思想，在某种条件下，即使达不到极端，彼此也是不相容的。个人行动的自由，也许

意味着最有能力、最爱寻衅和最自私自利的人，比能力较差、不那么爱寻衅和自私自利的人达到地位的极端不平等。而且所有个人之间结果的实质性的平等可能需要对有些人的行动大加控制，限制他们的自由。

生活中的现实之一是，人们不能在同一时间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在竞争中的目标之间，必须进行调节。在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中有没有一个“中庸之道”呢？

自由和平等两者同是复杂的概念，它们需要仔细的定义。

自由可以意味着信念和表达的自由，以及一些必不可少的选择的自由——作为一个工人的工作的选择，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的选择，以及作为一个公民的政治领袖的选择。或者，更加广泛地和通俗地说，自由可以意味着个人行动不受限制的一般的自由。当把自由和平等对比时，自由通常就指这种一般的缺乏限制的自由。平等可以有以下几种意思：

在法律面前待遇的平等和法律的平等保护。这意味着在法律面前没有在阶级、财产所有权、性别、宗教、种族、年龄或一致同意的其他类目基础上的消极的或积极的不平等待遇。法律不应有区别地适用于人并因而成为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的特殊来源。

未经调节的机会的平等。这意味着在个人的发展的性向相似的地方，给他们开放的机会也应该相似——没有由于种族、性别或信念等等的不平等待遇。按她或他现有的能力和以前的特权进行分配。

补偿的机会的平等。这意味着在个人的潜在的性向相似的地方，补偿的机会应该给那些由于以前缺少特权而少受优

惠的人发展他们的性向。他们更应该给予一个几乎从相同的起点开始比赛的机会。这就要求对于那些具有相同的能力,而由于缺乏资力,以致他们的能力不能得到发展的人以积极的帮助;对于所有具有同等的潜在性向的人,应该给予平等的机会。例如,在美国,早期教育和补救教育对以需要为基础的学生的资助。以需要为基础,根据他或她的潜力进行分配。这种努力在于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机会。

补偿的重新分配。这意味着在机会的平等以外,对于那些有利条件较差的人,不管由于本性还是由于以前或目前的社会不公正,以及那些处于合理的基本需要水平以下的人,在对他们如果有的任何生产上的贡献给予的报酬以外,再予以特殊的帮助。例如,通过对残疾者的特殊设施、福利国家计划和累进的税收制度,按照她或他的特殊“基本”需要进行分配。这种努力是保证大家应该满足他们“基本能力”的需要。

群体间结果的平等。这要求不仅在投入和基本援助方面,而且在得到保证的结果方面,重新进行调整。所有结果应该在群体间按平均数计算重新分配。一种看法是对被确认的群体(妇女、少数民族)就其成员算出平均数,得到和其他群体相等的结果——例如,在医疗、法律和博士学位,以及在收入方面,按他们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

群体间结果的补偿平等。这是对上述平等的扩大的说法。这样做可以补偿过去机会的被剥夺,或者反映将来在群体间所指望的比例,或者为了政治权力调整的原因,按过去被剥夺的机会或未来的比例,或目前的影响给予群体。

在所有个人间结果的平等。每个人应该得到同样的收入(或者甚至超出相同的“纯净的满足”、权力和社会活动的其他

利益),按他或她的存在分配。

当然,在这七个总的概念内部和之间有着很多变化。

头两个概念基本比较集中在先前存在的地位;其次两个概念集中在使个人的机会平等化;而最后三个概念,集中在平等化的结果。

在历史上,运动是从第一个概念走向最后一个概念。以“公正”为基础的中间的一个最终停留点,按罗尔斯(John Rawls)^①的定义,只是在平等有助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和在公平的竞争中所得到的不平等的地方,允许有不平等,否则所有结果都必须平等。

自由(没有约束)和平等(视平等的定义而定)不一定完全冲突。自由和平等,在以下三个平等的概念(在法律面前平等,未经调整的机会的平等,补偿的机会平等)的每一个概念之下,与继承的地位和物质的、经济的权力对个人地位有决定性影响的地方的以前的历史时期比较,在它们的总体上,一般都倾向于增加。自由和这三种平等是互相支持的。但是,在最后三个定义(每个定义都包含结果的平等)之下,自由(包括按优秀竞争的自由)明显地输给平等。自由和这三种平等是互相不一致的。在很多工业国目前的阶段,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点正在增加,而且由于运动是朝着这最后三种定义的方向发展,冲突正在激化。在这种狭隘的可能性范围内,更大的平等可能减少自由程度,视经济情况而定。

我想从美国目前的争论加以说明,“群体间结果的平等”的一个方法,是为处境不利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在各学院

① 约翰·罗尔斯:《公正的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3页。

安排明确的招生定额,而拒绝多数民族群体同等能力或更高能力的成员入学,从而侵犯他们以优秀为基础进行竞争的自由。

在法国大革命时,容易设想自由和平等(和博爱)是互相一致的。但是,遗憾的是在现代世界的条件下,它们常常是明显互相对立的。一个原则和另一个原则的对抗是通常发生的事情。如果必要的自由必须维持,那么对每个人的强制的结果的平等必须抛弃。在增强的个人自由运动背后的巨大力量,事实上很可能导致它的被抛弃。如果当我们走向更加强调平等的时候,能同时得到适当程度的自由和适当程度的平等,那么我们必须进行实际的探索,找到在对自由做出最小的牺牲(而且有望增加)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平等的方法。

我想建议强调普遍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作为使更多的平等和个人自由合理相容的一个有用但并不足够的手段^①。

普及教育能减少阶级和社会地位对个人进步的障碍。

它能够通过教育人们离开历史上待遇低的职业(于是那里工资增加),进入历史上待遇比较高的职位(于是那里薪水相对下降),有助于使所得收入平等化。

它能帮助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例如保健和消费支出)成为更好的决策者,从而有助于使个人生活机会最大化地得以平等化。

它能导致人们更大地参与政治过程,从而拓宽权力的

^① 很久以前卢梭提出过这个论点,他认为实现更大的平等的最好方法是教育、普选和累进税。

分配。

它能导致人们对同辈更大的忍耐和尊敬,从而更加自动地关心他们的福利。

它能导致人们更加强调对所有个人的权利和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

自由和平等,在它们现在指向相反方向的程度上,部分地能够通过更大地依靠教育协调它们对社会行动的要求。但是,教育的影响只是部分的;而教育的过程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而它是能走出目前困境的一条路。

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的解决方法,通常比坚持一个极端——或者只坚持自由,或者只坚持平等更好。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中,我的中庸之道的解决方法是高等院校应该更加积极地寻找(不止是接受)天资高和肯努力的人,然后对那些以前较少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予以补救的、补充的学业上的帮助和财政上的帮助,使他们有平等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才能。对于他们的成就的测量,不采用入学的比率,而采用毕业的比率。我将承认种族和性别本身能够是,而且常常是一种障碍,但是不利条件,除了别的考虑,也因家庭、社区的性质,早期教育的质量,家庭所用的语言,家长教育的水平以及家长收入水平(收入级别的影响)而起。因此,对个人,应该在人种和种族地位内部以及性的地位内部来看——因为有在人种、种族和性的地位内部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也有在人种、种族和性的地位之间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补偿的考虑和帮助应该给予那些具有同等的天资和努力而他们的成绩受到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不利条件阻碍的人。机会应该与天资和努力——不是和过去的

有利条件平等。个人所经受的不利条件应该是补偿行动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基本需要(needs)(为了生活)和获得的需求(wants)(为了生活得好)区别开来。前者是每个人共同的,性质是有限的(例如食物),后者在各个人之间差别很大,性质是无限的(例如名望和文化享受)。我的中庸之道的解决方法主张基本需要是一个支持合理的生存的社会再分配的领域,即使这并不是博得的。获得的需求是一个一旦生活机会已经受到补偿的机会平等,以努力和能力为基础的竞争的领域。

在美国,目前的战线是越来越在比例代表的需求方面必须做出多少补偿或补偿的机会和如果要做出任何让步的话,必须做出什么让步。这场战役很可能要继续很长时间,而且成为社会行为的真正中心。在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系列的战斗是关于不平等的继承的地位的战斗(例如,反对农奴制和奴隶制度),在法律面前平等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其次一个伟大系列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是使机会平等化和为大家提供基本的需要。现在开始的新的一系列战斗是关于可以确定的群体中比例的平等化。在美国,这一新的系列战斗使30年代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时期的老战士成为反对公平分享(Fair Shares)的拥护者。老朋友能够而且确实变成新敌人——一桩令人悲痛的事件。

“平等的结果”的鼓吹者常常争辩说,机会的平等,而且更甚于此,补偿的机会平等,只有导致给某些个人一个更好的机会变得不平等,并鼓励在一个已经过度地竞争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个人中间进行竞争。但是,从平等主义的观点来看,要在经济中对一个人本身有利,有一个平等的机会肯定比一个不平等的机会更好。而且,机会的平等意思是在法律面前平等,政治组织中的普选权、就业、进大学和很多其他方面更加平等的机会,以及更加平等地分配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基本需要。再者,对社会和其他个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公平竞争,对社会福利有利,公平竞争有助于整个社会。

我自己的信念是比较先进的补偿帮助方式的权利,而不是不顾个人做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的有保障的结果的平等的权利。未来最剧烈的冲突可能在不同类型的平等主义者之间,我们几乎都是一类或另一类平等主义者。我自己更喜欢的值得向往的社会政策公式是全面促进生活机遇和达到“基本的能力平等”。我还认为,在政治上,倾全力于机会而不是固定的比例,对以和平的方式促进公正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平等的公正”的支持者争辩说,处境不利的人很复杂,他们并不形成一个自然的社团,为更大的权利联合进行斗争,并且说因此这些组织依据人种、种族集团和性别组织起来比较好。这肯定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通过对抗的派别的方法导致包括潜在的多数公民在内的对立派别更多的反抗。

第五章 普及高等教育的世界的精英高等教育^①

这篇论文是在这样一个时间(1977)写的,当时在大学教师中间存在极大的恐惧,高等教育在很多国家的大众化将压倒和败坏古代的大学制度。在意大利,入学人数已经从 19.2 万人增加到 96.8 万人。英国有一句到处被模仿讨人喜欢的话是“更多就是更坏”(More is worse)。乐园真的正在失去吗?

这里提出的中心主题是,如果发展一个有效的功能分化的制度,精英部门未必需要被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兴起破坏。

这篇讲话的特定背景是一次庆祝乌普萨拉大学^②建校五百周年的会议,但是更加宽阔的背景乃是瑞典的高等教育系统,当时瑞典高等教育系统正在被称做 U68 改革(1968 年大学改革)进行尝试的均质化(homogenization)过程,这次改革包括把大众化功能和精英化功能安排在同一所大学以内。在瑞典,改革的一个结果是由于正教授退到他们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退到他们的科研和研究生训练,抛弃大学的其余工作,在

① 本章原以《高等教育:失去的乐园?》为题,载《高等教育》杂志第七期,1978年,第261—278页。

② 林德洛斯:《乌普萨拉大学史 1477—1977》,乌普萨拉大学出版社,第117页。

同一所大学内部出现功能分离。言外之意,我就是说这未必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像瑞典人建议的那样,重视全体公民待遇平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地位平等。我还说,历史上精英大学的“乐园”在大量学生进入的任何地方未必需要丧失。这不仅是(而且仍旧是)很多欧洲的而且也是英国的甚至一些美国的大学教师的忧虑——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向下均质化的幽灵。我论证,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视所做出的政策选择而定。

我恐怕当时我的评论在瑞典人中间充耳不闻,不是因为他们不赞成——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赞成——而是因为瑞典,一旦已经做出决定,有一种值得称赞的趋势,就是团结在决定周围,而且使它实现。但是,自从1977年以来,已经从U68后退。瑞典人也是重实效的。

今天,在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很多教师中间,“失去的乐园”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不仅在瑞典,有人说,“大学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变革。它是(曾经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社团,而且经过很多世纪的变迁,保持下来。现在它面临着一个它的自由将被严重削减的未来”^①。新近一个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的结论说,它们作为“学习和做学问”的场所,已经严重地“削弱”了。^②

在这篇论文中,我希望首先考察目前危机的性质和程度。其次,考察对危机的可能的解决方法。我的中心主题是,出现危机的多数是精英高等教育,不是全部高等教育,而且这更多

① 林德洛斯:《乌普萨拉大学史 1477—1977》,乌普萨拉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60页。

② 国际大学未来理事会:《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纽约,国际大学未来理事会,1977年。

的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结果,不是一般历史趋势的结果。

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学术乐园,它最新的表现形式和很多流行的观点,持续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60 年代后期或 70 年代早期这段时间。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伊甸园或“永恒的青春”,时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世纪,或者更长一些。我认识到,可以说,这个黄金时代,在某些国家持续的比四分之一世纪要长得多;对英格兰来说,黄金时代从 1836 年伦敦大学的建立和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改革就开始了;对美国来说,黄金时代从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赠地运动和近代大学的兴起开始。但是,对多数国家来说,黄金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而且甚至在英国和美国,1945 年以后的复兴以前,有一个相当沉寂的时期。

对比之下,柏拉图的学园在它存在的九百年的头三百年时间里,保持了新思想的生产。中国有着每个时期大约长达三百年的三个持久的学术繁荣的时期(从孔子开始的“百家争鸣”时期,汉朝和唐朝)。伊斯兰的大学的黄金时代持续约两个世纪(10 世纪和 11 世纪),并在西班牙延续到另一个世纪(12 世纪)。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大学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它们的活力达到顶峰。英格兰的大学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前期是处于一个特别活跃的时期,而苏格兰的大学则在 18 世纪特别活跃。乌普萨拉大学也在 18 世纪很有名望(“自由的时

代”),接着衰落,进入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时期,直到它有一个时期演化为一度被归属于“厌烦的洞穴”。德国的大学,从1810年至1930年是全世界的一个模范,尽管这是在一个衰落时期结束以前。黄金时代来来往往。有时大学被外部的敌人压倒——被塞尔朱克朝代(Seljuq)的土耳其人,或者被希特勒;有时在一个理智活力高涨的时期,取得知识扩张的丰硕成果,从内部加强了自信心,从外部获得国家的支持,蜕化为通过死记硬背学习古典著作和褊狭的批判,大学从内部衰退。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乐园以前曾经失去过,但是很少超过二十五年,并且原因也各不相同。

如果新近的黄金时代真正已经终结,它不仅因为它的相对短促的时期和它的死亡的原因,而且因为它的普遍性,涵盖所有大陆的很多国家和代表若干理智的传统,不同于在它以前的其他黄金时代。(当然我并不包括没有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我也不包括完全计划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国家,在那里高等教育以跟上估计的人力要求,在科学和技术以外的多数学习领域里没有理智和自由高度接合的方式运行,也不包括少数特殊的实例。)老的大学恢复元气,新的大学开始创办,学生人数急剧增加,科研经费大大增长,高等教育深受尊重,而且掌握着国家对美好未来的很多希望。它有着很大的自主权。正如希尔斯(Shils)曾经指出,“这是一个对通过大学使社会和个人得到完善,具有伟大指望的时代”。

我选择了使用失去的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得的乐园(Paradise regained)这两个词语,并不是像有些人做的那样,要证明大学曾经屈从诱惑,现在必须拒绝诱惑,不管它是以富裕的形式,还是以影响或发展的形式出现。根据米尔顿(Milton)

的说法,最大的诱惑是偷吃知识之树的禁果,用他的话说,这“能使人成为神”,而失去天恩即来自这个弱点。大概没有一位教授能抵制这个特定的诱惑。同时,在一定情况下,富裕、影响和发展可能跟着而来,而且确实已经跟着来了。大学已经建立,大部分为了尽可能热切地和有效地响应这一特定的和最富有魅力形式的诱惑——偷吃知识之树的禁果。关于我们大家过分屈服于这种诱惑的这个论点,我指出,日本的大学曾失去天恩,即使他们的教授成员并不富裕;法国的大学,即使它们没有通过主要在它们大学以外进行的科学研究获得影响;牛津和剑桥,即使它们只是适度地发展,有些学者总是为已经失去的乐园哀痛,而且哀悼它们是某一毁灭的乐园失去的天使;而其他的人正在擦亮可能获得的乐园的肖像。更确切地说,在使用这些词语时,我希望表明,知识分子在很多时代和很多地方具有把他们自己的时代认定为严重地缺乏优秀和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与未来的乌托邦前景之间犹豫不决的趋势;把现在存在的东西看做是错误的东西,但是把过去存在的东西看做正确的东西,把可能存在的东西看做将会是正确的东西的趋势。

这个黄金时代怎么繁荣, 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

当然,一个时代怎么繁荣,视观看者的眼光而定。一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被大家接受的确切定义。我把它

界定为包括下列要素：内部和外部都接受学术自由，大量的学校自治，教授控制主要的学术决策，广泛的公众尊重，不断增长的财政资助，从事新的事业的机会，以及在若干领域学术上有重大的新发展。按照对社会的服务，可以更加有益于很多科研成果的应用，并使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需求得到满足。这样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在很多国家，明显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历史上的大学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有很多问题^①，如关于英格兰“双重制”的发展和在几乎每一个工业社会类似的大众化高等教育运动，关于经费的筹措和花费，关于扩张的速度和场所，关于未来在学生和教授中标准的下降，关于科学和人文学科各自的作用——“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关于成本和利益，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关于可供选择的计划的优点和给予市场力量的作用，等等。在美国 50 年代早期，学术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恫吓，在这样的时代，失去的乐园至少似乎更像地狱。^②

黄金时代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在哪里？十分清楚，各国情况不同。在各国内部，情况也各异。让我做一个有很多例外的概括：普及高等教育（universal-access higher education，或

① 有关美国实际情况的讨论，见戴维·亨利：《过去的挑战，目前的挑战：1930 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旧金山，乔赛巴斯出版社，1975 年版。亨利指出，在 1945 年后的时期，“退伍军人入学人数的激增和浪潮对资源的需求那么势不可挡，以致反对供应不足的持续的斗争是正常的。用保持质量、努力改进和更高的效益的话，条件并不是‘富裕的’，或‘繁荣的’，或‘安逸的’。压力和紧张引起对未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

② 关于这个时期，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大学的功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 年），指出过很多问题和紧张情况。

者称做普及后中等教育 universal-acces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空前繁荣;大众化高等教育(mass-access higher education)一般处于静态局面,视涉及的专业而定;而精英高等教育(elite higher education)总的来说,已经经历某种比较甚至绝对的衰退。

以澳大利亚的“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美国和加拿大的社区学院,挪威的地区学院为代表的普及高等教育继续扩张。普及高等教育特别响应机会平等的运动和胡森(Torsten Husen)所谓“自我实现和文化充实”的需求。^①以英国的多技术学院和师范学院与美国的综合学院和综合大学为代表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特别响应劳动力市场和一般市场,虽然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小学教师培训)下降,但在其他领域(诸如某种类型的工程师)上升。情况是不一致的。

总的来说,处于比较和有时甚至绝对衰退状态的惟一的部门,是历史上的高等教育的精英部分,在日本、美国和法国(还有俄罗斯),也许占入学人数的10%—20%,英国差不多50%—60%;在德国和瑞典,百分比甚至明显地更高;而在意大利,百分比还要高。这是集中训练比较高级的专业和科研工作的部门。衰退发生在声望、教授的士气、学生人数和筹措资金增长的速度,^②对外部控制的独立性的降低,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① 胡森:《高等教育对变化中的社会力量的适度》,载伯恩编:《高等教育和当前的危机》,纽约,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1975年。

② 大学部门继续比非大学部门发展得更加迅速的惟一国家是南斯拉夫。赫克特、弗尼厄和塞利奇:《高等教育中新近的学生流量》,纽约,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1976年。

在精英部门,黄金时代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呢?在这里,回答也是视各个国家的情况而定,但是也视这个部门被考察的方面而定。学生入学人数增长的速度已经慢下来,而且有时变为负增长(如在瑞典)。结果,精英部门是在全部高等教育中一个较小的部门,科研经费较难取得。至少在美国,几年来有时按实际价值已经下降。精英部门和早先比较,已经受到内部和外部更多的批评,甚至打击。

然而,我将提出,总的来说,在很多国家,除新近的黄金时代本身以外,精英高等教育仍旧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处于比较好的条件。如果比较点是新近这个时期以外的任何其他时期,可以说,精英部门,用绝对的措辞来说,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是处于衰退条件下的新近的黄金时代,而且在一些国家,衰退是微小的。当然,在有些国家大学事务的某些方面,衰退是巨大的,例如在德国的内部政治化领域和在瑞典新近强加的外部控制;在意大利,整个系统为大量学生所淹没,几乎所有方面出现大规模的衰退。但是,总体上可以说,精英高等教育,历史地看,现在正位于但丁的“七重天”的第五重或第六重。无论如何,运动的方向新近已经从伟大的黄金时代的第七重天堂下降。

高等教育精英部门的衰落

精英部门的黄金时代为什么衰败?首先,有些发展速度不能合理维持,不管是学生人数(在有些国家,十年内增长一

倍以上),还是科研经费(在美国,科研经费一度每年增长10%—15%)。还有,过多的期望落空。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成本事实上已证明比早先高,而可见的利益比早先小。在发达国家,以大学为基础的科学对开创新世界所做的工作,和大学的训练对减少进入精英地位的不平等所做的工作都比从前所希望的要少。在很多国家,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的过剩起了作用,学生动乱和新的社会优先考虑事项,也对衰退起了一份作用。

我认为至少另外还有三个持续的力量或历史的趋势在对精英部分起作用。这些趋势是:①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转变;②高等教育内部的政治化,这主要限于精英部门;③高等教育越来越沉浸在外部的社会控制之下。这三种力量在不同程度上互相依赖,但是我想集中在第一种力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关于第二种力量(政治化),在这一点上我只想指出,近年来,政治化来自内部的要比来自外部的多;①关于第三种力量(社会控制),高等教育正在走贸易和工业的路,受到越来越多的官僚主义的控制。②

我并不相信,为什么大众化高等教育或普及高等教育必然是精英高等教育的敌人,有任何内在的理由,虽然这曾经常

① 埃德沃德·米香曾经指出,“由于学生日益不容忍,在英国,大学已经成为言论自由和公开的政治辩论不再能保证的少数地方之一”。见所著《关于大学改革的一些持异端者的思考》,第3—15页。

② 熊彼得在所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特别在“知识分子社会学”一节里把社会控制的扩展到大学本身的部分责任放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知识分子为丧失他们自己的自治的一部分创造了条件。

常是事实。确实,精英高等教育曾经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现在成为一个不断变小的部分。但是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能够帮助鉴定新的才华转学到精英部门;能够使精英部门变得更加精英成为可能——今天,哈佛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事实上开展了更多选择性低的功能,比它们在没有大众化部门时更加精英化。而且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能够在民主国家建立社会分层的基础,减少受教育的阶级和没有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尖锐区分(和潜在的愤恨),并有助于软化阶级区分和阶级对抗。阶级态度的持续明显地与仅有的精英高等教育的永久存在有关。

当我 1959 年和 1960 年正在指导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时,我把社区学院的庞大扩张看做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一条防线,否则加利福尼亚大学将被大量学术造诣比较低的学生所淹没,或者被攻击为试图坚持对进入高级地位的垄断。那个规划,在任何国家历史上首次为每一个中学毕业生或者具有其他资格的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保证在一所社区学院有一个学额,而且让社区学院毕业生优先转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个保证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社区学院能够对个人生活的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这个总体规划,保存它全部本质,新近得到再肯定而继续执行 15 年。

但是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可能是精英高等教育的敌人。

(1) 它们可能从精英高等教育拿走资金。但是难以知道何时和是否资金被从精英高等教育拿走,因为不可能知道另外有什么资金可给。我不知道有证据证明有一种严格的“工资基金”(或高等教育基金),所有高等院校必须从此提取经

费,并且允许一所院校仅仅通过从另一所院校拿走资金而获得更多经费。无论如何,在美国,有少量证据,在少数州精英院校可能受到非精英院校的损害。^①

(2) 它们可能为精英高等教育陷入过分限制的政府框架铺平道路,师范学院和社区学院形式的非精英高等教育,比精英高等教育不断地受到较多的社会控制和较少的学院控制,而且有好的理由。这些类型的院校把它们的毕业生更多地束缚于直接的和即时的需要。自主权既不是必不可少,也不是要求过高。如果精英院校和非精英院校在外部管理上采取同样的政策,那么社会的控制能抑制精英的功能。还有,扩张的整个系统的规模和费用会招致各种控制。

(3) 它们可能有助于引进不合适或者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内部管理形式(我界定的内部包括院校的管理委员会)。学者的功能性权威对正确地完成精英功能比完成非精英功能更加重要得多。非学者对明细的管理的参与,可能对完成非精英功能的影响不偏不倚,或者甚至有益,但是这种参与对完成科研活动和高深学习的教学是具破坏性的。

(4) 如果它们的大量学生涌进这些院校,就有可能淹没精英高等教育院校的设施。大量学生进入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如在意大利,能够淹没大学的设施和教学人员。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是迅速地迫使大量学生进入它的构成院校。这导致过度使用设施,教学人员和学生不满,以及学术标准降低。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

^①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州和高等教育:辉煌的未来和充满活力的未来》,旧金山,乔赛巴斯出版社,1977年。

以前十分优秀,现在是一团糟。试图把大众化高教和普及高教的学生都容纳在精英框架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另一方面,如果精英部门的组成部分被安排在大众化的院校,精英的标准也非常可能衰败,如美国博士学位训练计划在入学标准不高的院校推行。

(5) 它们可能使传统上如德国由精英院校提供进入权的专业人员过剩,^①带来消极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传统大学的学位的持有人数的爆炸,减少历史上和它们的学位相联系的有保证的地位的不平等;能淹没一个专业,导致失业,或者更加可能,不充分的就业,以及强烈的政治上的愤恨。

上面我说“可能”,但是,事实上,这些结果中的每一种结果,已经在一个或更多的实际环境中发生。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到来,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并已经削弱高等教育。

乐园能够复得吗?

我们不能回到从前那个比较简单的世界——回到普利克里兹(Pericles)的雅典,或者回到古代的象牙塔。当被给以参与近代社会的机会时,甚至在提倡通过经典著作(Great

^① “因此,现在高等院校的 84 万学生(占目前青年总数的 20%)仍旧指望差不多自动地进入专业职位,而五年前仅仅提供少于 40 万的就业机会。”(国际大学未来理事会,《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第 33 页)

Books)学习高深学问和对研究及科学持深切怀疑态度的赫钦斯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费米(Enrico Fermi)和康普顿(Arthur Compton)领导下的冶金学实验室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子弹合同;甚至人文主义者巴曾(Jacques Barzun)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巴曾作为教务长,他赞成向内看的“智慧的殿堂”(“House of Intellect”)。^① 但是该校成为美国巨大的科学研究承包者之一。早先那些有着天真和不完美回忆的象牙塔也不那么绝缘于周围的社会,它们的观念那么纯洁无瑕,那么没有由于与诱惑、富裕接触而受到污染;它们只是一个不同性质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在很久以前首次咬了一口知识之树的那个禁果。在很多国家,为吃下那个禁果所选择的工具,已经越来越快地成为大学。并非所有对一个更加天真的世界的渴望,并非所有对使诱惑变成神而让步的遗憾,能够收回目前的现实,世界的运作越来越依靠新的知识和它的应用。大学不仅被卷入,而且希望被卷入。

我从以下假设开始:精英高等教育是社会所需要和对社会有用的;甚至在一个罗尔斯式的具有比较完美的公正的世界,情况也将是这样;^② 所有的人能够从更多的知识和正当应用的更高的技能中得益,而且一般地说,他们承认这一点;“差别原则”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在差别原则之下,凭优秀挑选的某些个人将给以比其他人更高水平的训练和使用这种训练的机会。

现在我想改变我已经使用的术语。我曾经采用精英高等

① 巴曾:《智慧的殿堂》,纽约,1959年版。

② 罗尔斯:《正义的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标准术语。这些术语反映历史发展的阶段,有一个限制条件是精英高等教育并不全是精英——有时只是人数较少。^①我想建议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术语,既然普及高等教育的阶段已经到达,又由于我们正离开着重阶级的高等教育到比较着重优秀的高等教育和较少含有消极含义的术语:

(1) 高度选择型的高等教育。

(2) 选择型的高等教育。

(3) 非选择型的高等教育。

当然,有人可能更喜欢两个,或四个,或五个,或某一其他数量的层次,而不是三个层次。

我想选择性原则是主要的。高度选择型的高等教育是这样一种高等教育,承担为那些以高层次高理智训练为基础的专业招收和培养人才,进行与这种训练有关的科研工作,并使用经过这样训练的人才。选择型的高等教育是这样一种高等教育,承担为依靠或者至少能利用美国术语所谓“本科生教育”所传授的高级知识和技能的社会为数众多的职业培养人才。非选择型的后中等教育,按定义向在以前受过教育的或就业到达一定年龄或有工作经历的所有人员开放。

我完全同意胡森^②的论点,高等教育不能有效地环绕一

^① 美国从1920年至1960年,当“大众化”高等教育取代“精英”高等教育时,大学生智力的平均水平提高了。据陶布曼和威尔斯:《20世纪智力与高等教育造诣》,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1972年,第19页。随着1960年以来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这种情况可能已经颠倒过来。

^② 胡森:《在十字路口的瑞典大学科研》,《密涅瓦》14卷。

个模式组织。^① 我赞成最低限度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模式 X)将集中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普拉特(Gerald M. Platt)^② 所谓研究生训练和科研的“核心部门”,但是我将增加如与美国选择型的文理学院有关的研究生教育以前的训练;第二种模式(模式 Y)将正规地或非正规地为本科生训练围绕社会的职业需要和围绕学生的“普通教育”的利益进行组织;第三种模式(模式 Z)将适应基于任何理由的社会需求,只服从消费者的选择。当然,三种模式有重叠之处。这三种模式的方法,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或者通过官方行动,或非正式的实践,现在正在全世界若干政治管辖区推行,包括有些把他们自己看做“单一的”或“双重的”模式。

这三种模式不仅在它们对学生的入学资格方面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能够彼此区别。如教授遴选的原则,每个学生和每个教授财政资助所需的水平,有效地完成不同的功能所要求的学校自治的程度,学术自由对教授的重要性的程度,合适的管理形式。每一个模式需要根据个别情况的特定环境,沿着这些情况和其他方面来考虑。

第一种模式在全国的和国际的层次操作最好;第二种模式在全国的或地区的层次;第三种模式在地区的和地方的层次。第一种模式限制在学科和它们的学院式管理(横向的管理);第二种模式限制在为职业进行训练的学校和它们的等级制管理(纵向的管理);最后一种模式限制在消费者的选择和

① 胡森:《平等进入高等教育的问题:平等和优秀之间的困境》,载《高等教育》,第五期(1976)。

② 帕森斯和普拉特:《美国大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

比较创业型的管理(市场选择)。第一种模式的中心主题是学问;第二种模式的中心主题是正规地或不正规地注意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学家所谓“人力资本”的预备;第三种模式的中心主题是满足个人自我发展的愿望。

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则是功能的分化,从功能的分化接着就是财政资助的分化和管理的分化。^①不可能有像英格兰在历史上所指称的普遍的学位的“金本位”;也没有像德国在历史上所指称的在教学和科研之间的永恒而普遍的联系。^②这两个受到珍爱的学说,无论如何,已经与其说是现实,倒不如说是神话。而且在德国,有些教学和有些科研总是比别的教学和别的科研更加结合在一起。科研和教学只需在高度选择型的院校结合起来。无论如何,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本身不能完全容纳新来的学生和新的功能,因为那时它将不再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入学者不能仅仅灌进它的“外壳”^③而没有激烈的后果。一个有效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必须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分化它的构成院校。假使有这种分化,一个高度选择型的部门就能在健全的条件下维持,但是这种分化本身是不够的。

① 这个观点和塞利奇所谓“走向可以称做有模糊分隔的扩散系统”相反。见赫克特、弗尼厄和塞利奇:《高等教育中新近的学生流量》,第168页。

② 胡森指出,教学和科研并没有“总是结合为和谐的联姻”。胡森:《平等受高等教育的问题》,第420页。

③ 关于使用“外壳”这个词,见科尔曼:《大学和社会对大学的新的要求》,载凯森编:《内容和背景》,纽约,1973年版。

分化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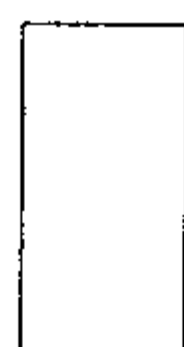
马丁·特罗曾经提出若干种分化的方法。^① 一种是有一个高度选择型的官方的部门,如法国的大学校(*grandes ecoles*);第二种是独立的个别大学,如哈佛大学或洛克菲勒大学;第三种是在一所较次的选择型大学内部设置一个高选择型的层次,如美国十所名牌大学中的有些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层次;第四种是在较宽的选择型大学内部不论哪一个层次有一个或多个高度选择型的特殊单位,诸如在一所大众化的大学中一个得到特别保护的研究中心,像设在要不然就是较次的选择型美国大学之一的著名的大气层实验室,或者如在美国亚拉巴马大学的一个选择型的本科“荣誉学院”,或者如在德国和瑞典的有特殊入学人数规定(*numerus clausus*)的不对外的学部(这些可能的方式及其变型的图解见图2)。

(1) 按官方的部门分化

高度选择型

选择型

非选择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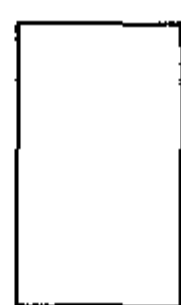
(2) 按各个院校分化

高度选择型

高度选择型

^① 马丁·特罗:《精英高等教育:一个受危害的物种?》,《密涅瓦》14(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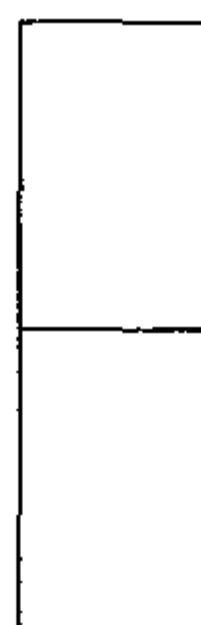
研究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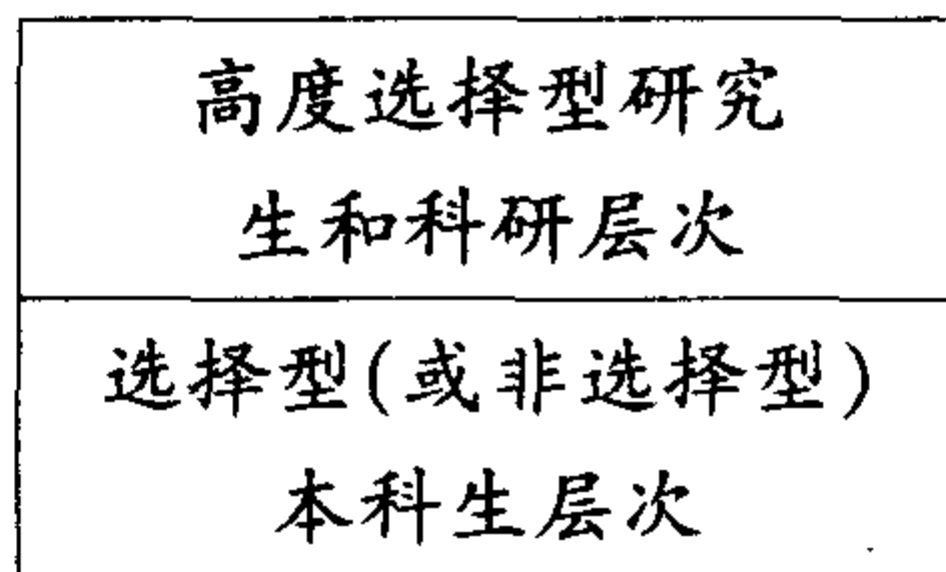
高度选择型
本科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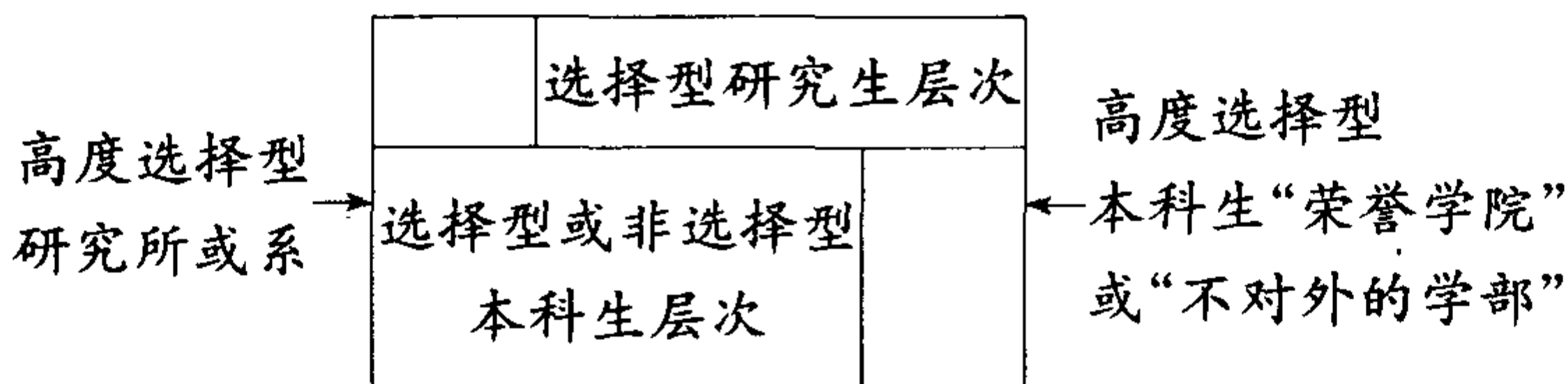
大学



(3) 按院校内层次分化



(4) 按大学内部专门单位分化



(5) 按部门和按层次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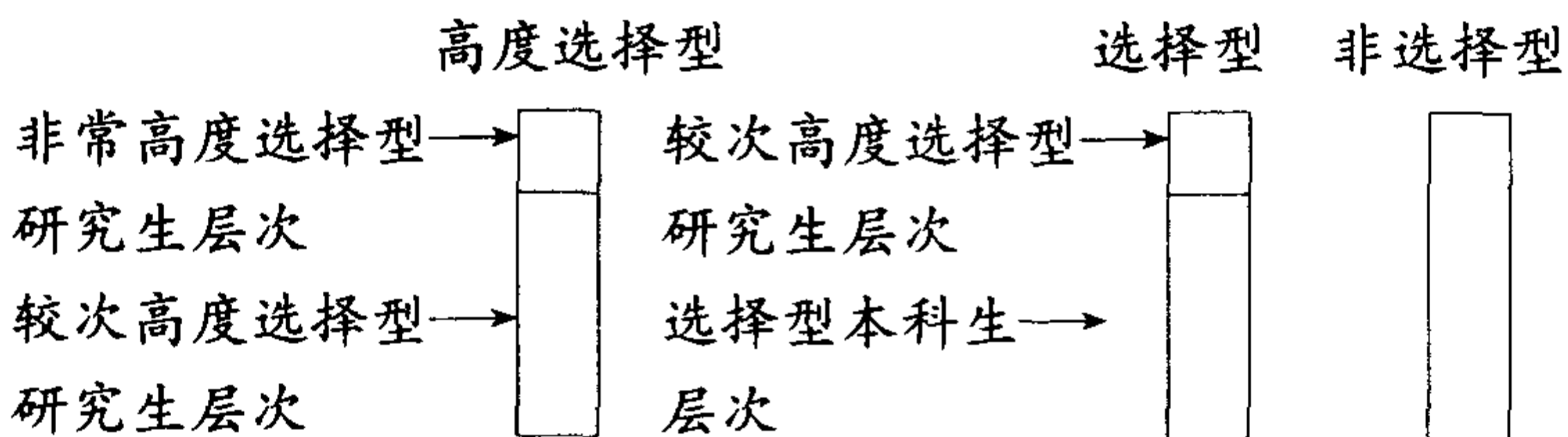


图2 可供选择的分化方法

我相信,在这些可能的方式中,一般最可取的解决方法是

第一种——独立的部门。虽然其他解决方法在适合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地运作。这第一种解决方法,在入学要求、选择教授的标准、财政资助的方式、管理的形式等方面,比较容易进行分化。第二种解决方法(独立的大学)几乎要求私人的资助来源,这在多数国家不大可能;或者公费,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把它们当做好像是私人资金处理(如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或者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个人敕令(如在伊朗)。第三种解决方法(高度选择型层次)倾向于造成教授明显地忽视选择性不高的层次的学生和责任,但是,至少在美国的环境和德国的环境,在一所以较低的学术水平接受大量学生的大学内部保持高水平的学术成就越来越成为可能。第四种解决方法有赖于别人对特殊单位的忍耐程度,面对在劳资关系领域所谓“强制比较的范围”^①——这些比较在大学内部比在大学之间更具强制性,这种忍耐并不总是会有的。当然各种方法的结合是可能的,特别是第一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的结合,这样的结合导致在高度选择型部分和选择型部分内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选择有不同水平的分离的部分(第五种解决方法)。

当然这些解决方法的每一种都有问题。例如,第一种方法(分化的几个部分)对分化的界限如何划分和坚持,如何照管选择性较小和非选择型部分教授的地位需要;还有,由于高选择型部门建立在竞争的优秀基础上,非选择型的部门建立在平等主义基础上,而选择型部门则在两者之间的某处浮动,除非它是一个劳动力市场方向,没有附加的鲜明的正当理由,

^① 罗斯:《工会工资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

如何提供中间部分坚固的合法性,引起困难。^① 不存在没有问题的解决方法。

于是,我认为,保存一个有效的高选择型的部分,作为各大学之间功能的或多或少轮廓清楚的分化,或者,如果那样做不可能,在大学内部的各层次或专门单位之间进行功能的分化——高度选择型的部分基本上围绕知识的事情组织;选择型的部分围绕就业市场或普通教育或两者组织;非选择型部分围绕不论什么消费者的爱好组织。

保存高度选择型部门

为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期保存选择型高和优秀的中心,同时认识到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是某些一般原则可能仍旧可用,我想建议以下政策:

(1) 功能的分化,如以上的讨论,拒绝在高等教育内部以遗传的阶级为基础的分化的残余。

(2) 高度选择型的部分竭尽全力支持较次选择型部分,

^① 斯梅尔塞:《1950—1970 加利福尼亚公共高等教育中的发展,结构改革和冲突》,载斯梅尔塞和阿尔蒙德合编:《加利福尼亚的公共高等教育》,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特别是非选择型部分的扩张。^① 我想大胆提出一个奇怪的反常的坚定的声明:拯救一个高等教育的高度选择型部分最好的方法是扩大较次选择型和非选择型部分并提高它们的地位;是高度选择型的部分为了保持它最高水平的知识贡献而失去它在学生总人数和财政资助总数的统治地位。当然,如果高度选择型的部分是总体的一个小的部分,不是一个大的部分,分化高度选择型的部分也就比较容易了。

(3) 凭优异成绩进入高度选择型的部分,以及凭优异成绩容易从较次选择型和非选择型部分转学到高度选择型的部分。

(4) 把高度选择型的功能集中在少数地点;把较次选择型和特别是非选择型的功能分配到很多地点。

(5) 国家权力机关认可,如果高度选择型的功能必须在高度卓越的水平上执行,它们必须有一个单独的模式——一个单独的内部和外部管理,筹措资金和招收学生的模式。三个分化功能系列的每一个功能有一个单独的模式是必需的。

^① 我注意到,历史上的精英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相对高的国家(德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比精英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相对小的国家(法国、日本和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困难比较多。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困难的强度的增加几乎和历史上的精英研究型大学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成正比:

意大利	90%或以上
德国和瑞典	60%—70%
英国	50%—60%
法国、日本、美国	10%—20%

一般规律似乎是扩张的人数被从前的精英部门吸收的比例越大,问题越多;被强制进入历史性的研究型大学的学生越多,接着而来的麻烦越多。

一个模式不能适合所有的功能。^①

(6) 由高度选择型的大学的终身教授控制所有的科研和课程的政策。特别是这些大学应该发展阿什比所谓“遵守学术专业道德守则的誓言”^②,作为不受政府琐碎控制,坚持自治的基础。^③ 自治的丧失可以作为内部行为的一个结果,又可以被从外部否定。较次选择型大学的教授还应该控制教授和课程内容的选择。非选择型高校的课程更多地有赖于消费者的选择。

(7) 管理的民主化,不是由有时被证明对学术自由和学术标准那么惨重损失的内部的教授、年轻教师和学生各占三分之一组成的内部管理形式^④,而是经过慎重挑选的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外部的形式。我想尽可能清楚地区别这两种主要的管理民主化的形式:①“内部”的,对必要的决策,由教授、学生和职员分享权力,和②“外部”的,对必要的决策和通过挑选的公众成员分享权力。德国早先选择内部的路线,瑞典新近选择外部的路线。当然,有很多国家是这两种形式的结合,而

① 例如,在瑞典,在“单一”的解决方法的框架内,有“教授委员会”负责研究生课程和科研,但是有校外代表的“行业委员会”负责本科生课程;同时有“不对外的”和“公开的”教授。

② 阿什比:《一个遵守学术专业的道德守则的誓言》,《密涅瓦》7(1968-1969)。

③ 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也见韦伯:《国家的权力和德意志帝国学术职业的尊严,韦伯有关大学问题的论著》,《密涅瓦》11(1973)。

④ “教授、年轻教师和学生各三分之一不是处理一个学术机构的方法,这要求理智判断的标准。”(希尔斯:《教学和科研的自由》,《密涅瓦》11,1973)黑格尔曾经说过,“地狱是真理被明白得太晚”。但是至少德国人现在正在通过旨在保证教授对科研和课程政策以及对学部成员的选择的控制的司法和立法的行动来克服教授、年轻教师和学生各占三分之一的最坏的实践。

且每一种形式和它的变种可以比其他形式更加合适地应用于做出某些决策。这是对学术专业的一个奇特的评论,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在维护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方面的记录通常比某些内部的参与管理的人士的记录要来得好,这些人变得那样受道德目的所支配,以致他们寻求压倒学者风度的行为。

(8) 缩小地位和收入差距意义上的职业和专业的民主化,以便为高等教育的高度选择型的部分的学位所授奖赏不是不相称地高——对它们没有垄断成分。入学的民主化含有毕业奖赏民主化的意思。

(9) 高度选择型的部门的领袖经常地努力和一般公民以及代表他们的群众组织接触。像美国赠地大学那样,向全社会和个人解释高度选择型的部门的价值。

我也将同意马丁特罗,如果既有公家资金又有私人资金资助高度选择型的部分,它就容易少受责难。总的来说,我和特罗一起相信,“在多数地方”,高度选择型高等教育并非一个“有危害的物种”,而且我要加一句话,在有危害的地方,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而是由于人的不明智的选择。

高度选择型高等教育的乐园只是部分地失去。那是轻易失去的。当乐园部分地失去时,至少能被部分地复得。那将不是容易的,但是这是必需的,因为现代世界的未来,越来越有赖于越来越高深的学问。处于卓越水平的高深学问的保存和促进,既应得到高度的优先,又应得到努力的奉献。再引米尔顿一句话“一切并未失去”以结束我的演讲。

第三编 高等教育机构职能的 分化和均质化

引 言

对于传统和平等、传统和优秀的矛盾,有没有虽然不完善但是合理的解决方法呢?传统决不能忽视,它适应了长时期生存的考验。现在存在的东西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它也并不一定错误。它应该受到尊重和精心的有选择的维护。在第三章以后,我把对传统的进一步考虑放在一边,因为传统是那么多样,必须逐个做出判断:这里是英国学位质量的“金本位”;那里是意大利“资深教授”的特权;在别的地方是拉丁美洲的大学的“自治”——意思是法律的执行到此为止;还有其他地方是法国大学校或日本东京和京都大学的受到保护的区域。还有很多人,他们将保卫传统的方方面面,像美国达特默思、普林斯顿、耶鲁和其他许多学院的校友那么有力的和忠诚的表现的那样。一种牢固的传统极大地有助于给一所大学它自身的个性,并且使它成为不只是一个在参与中吸引忠诚和骄傲的共同体。它是在大众文化中的一个宝贵的身份的来源。但是怎么样对平等和对优秀的对抗要求和解呢?如何可以使两者都能充分地做到呢?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一个赞成平等的高潮,在很多地方降低了入学标准。在80年代,对优秀的兴趣出现一个高潮,造成一些变动,但是平等和优秀如何

能够更加长远地共处呢？这里所给的回答是各高等学校之间功能的分化，而不是均质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内，国际上有两次“大爆炸”袭击高等教育。第一次是全世界大学入学人数的爆炸（从1950年的660万增长到1988年的5800万）——过去历史上空前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大规模的大众化。第二次是美国劳动力市场需要，或者至少能够充分利用中学以上教育工作的数量的爆炸——从1947年的12%增长到1990年的30%（列为专业、行政或技术的工作）。

由于这些发展的结果，高等教育将永远不再是相同的了。过去的东西和现在出现的東西和很远的将来将会出现的東西之间产生了大的分歧，一个新的高等教育世界诞生了。一些人哭泣，一些人欢笑，一些人同意，一些人这三种现象都有一些，我发现我自己属于最后一类人。

在有些国家，在通过很多世纪的精英高等教育发展起来的古典大学内部努力吸收这两次爆炸。在其他国家，建立了新型的院校，或者大大地扩充旧时的非大学型院校。在很多国家，引起了在大众化和普及入学时代有关高等教育的合适的结构的问题。

第六章转到我认为已经发展起来的受欢迎的解决方法——我所谓“21世纪高等教育的趋同模式”，这个模式探索既回应经济上很多方面对受过高度训练的劳动力的新的要求，又回应青年公民对更大的机会均等的新的需求。这个模式通过各高等院校之间职能的分化做到这一点。

这种职能分化的解决方法应做四件事：

(1) 这种解决方法在高等教育的早期阶段比后来的阶

段,更加强调入学的平等——在进入低段时比进入高段时,在高级学位的第一阶段比第二阶段,更加强调平等。学术工作的层次愈高,入学时愈重视优秀。

(2) 进入非学术性的技术训练院校比进入职业院校,进入职业院校比进入专业和科研机构,更加强调平等。在专业和科研机构,优秀几乎是最重要的。

(3) 这种解决方法在学术工作的比较高级阶段和在比较学术性的机构,更加强调优秀,但是在每一种情况,在学习结束时比开始时更加强调优秀。

(4) 这种解决方法鼓励学生根据期望、能力和过去的成绩记录,从院校的一个层次转到另一个层次,以便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机会。

第七章考虑趋同模式内部的科研和研究生训练的部分,以及这个部分的最好的实践经验。

第八章注意到职能分化解决方法比较早和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之一——1960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职能分化与其被赞成均质化的人认为是精英型的,毋宁说它是平等主义和英才主义的——入学机会是平等主义的,升级是英才主义的。加利福尼亚很早发展了就入学机会和院校之间转学机会而言的全世界最平等主义的高等教育系统,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内部,在研究生训练和科研方面的设施是最英才主义的。

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是各竞争的部分之间的一个“条约”,但是它比条约的内容多得多。它是在高等教育内部保护优秀的同时,努力鲜明地推进机会均等。

我充分认识到,下面一篇论文相当详尽地探讨了这个规

划发展的过程,但是这样详细的规划表明,高等教育系统的构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完成这件工作需要很多个人和有关各方的合作(或至少同意)。这件工作从本质上说,一个没有世袭的阶级的社会,比在一个基本上建立在世袭的阶级结构的基础上的社会里,例如英国,相对地比较容易。在这样的社会,大学的衔头表明阶级的区分甚于以优秀为基础的区分。而且随着平等主义的发展,所有院校更加坚持大学的地位——少一些都是不能接受的。

第八章的附录略述总体规划的内容。

总的说来,所建议的解决方法更加注意建立或扩大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新型院校的作用,较少指望它们改造具有自己传统的古老院校。

第六章 一个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 趋同模式^①

——既普遍入学又促进优秀

这篇论文较少关于高等教育从哪里来和现在是在哪里,较多关于它正在走向哪里去。论文提出,当前,在世界所已经知道的和仍旧熟悉的所有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系统之后,一个比较近乎普遍的全球性的模式,现在正在从发达的工业世界比较相似的经济和政治的社会里运作得最好的模式发展起来。

这个“趋同模式”,在内部按学术工作的层次进行分化,在比较高的智力活动层次,非常强调优秀,但是在不那么高级的学术层次有一个大众化和普遍入学部门——从而做到同样地既为培养高级人才又为扩大入学机会的现代需求服务。按照迫切的需要(在现代民主工业国家,既要优秀又要平等),这个模式,关于前者,它是英才主义的;关于后者,它是平等主义的——在入学和转学机会方面是平等主义的;在促进最有能力

^① 本章根据我在研究和立法组织赞助下于 1987 年 1 月 27 日在罗马所作的一次讲演改写。早先一篇文章以《大学界的重要时代:积累的传统对现代的需要》为题,登载在《欧洲教育杂志》22 卷 2 期(1987 年)。

和动机最强的人方面是英才主义的。这是一个平等主义和英才主义的尝试。虽然趋同被提出作为运动的一般方向,它并不需要而且几乎肯定不会是全面的:一个单一的标准模式。在我看来,它也不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标准模式。除了其他东西以外,一个系统,传统有许多方面值得保存。

这个趋同模式的最重要的方面是:

(1) 更多地各个校区之间,而不是单独在各个校区内部进行职能分化,合格的人有转学的权利。

(2) 政府较少地致力于对运作的官僚式的微观管理,更多地通过它们的政策和准则为支持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宏观管理——较少地作为科研项目、学额和其他有价值的服务的所有者发挥作用,更多地作为它们的购买者发挥作用。

(3) 较少地受宗教、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地注意智力的优秀。

(4) 更多地为行政领导开发机会,较少地依靠外部的政府控制或内部的教师行会。

趋同模式的设计在于调整以下两个方面的逻辑上的冲击:①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智力和文化领域几乎比较普遍的竞争;②人口中所有人或者至少多数人对受到一些高等教育的几乎比较普遍的需求。什么制度能够最好地满足这两个潜在的、不一致的需求的冲击呢?

奥尔特加曾经写道,大学“只是一个较大的实体——创办和维持大学的整个国家——的一部分”,“不同的国家的大学之间存在的差别,与其说是关于大学本身,不如说是关于各个

国家本身。”^①他指出,教育的机构不是完全“可以转移的”,而必须适应各国特殊的历史和环境,我同意。但是,奥尔特加对趋同的趋势比我采取强得多的立场。他写道,过去四十年(1890—1930)来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欧洲的所有大学倾向于使它们全部“同质”的一个趋同的运动。这里我并不同意,看来是一个涌现的共同模式,肯定会有很多继续不断的变异。很长时间——可能永远会看到传统的印记。

趋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单独的终点。

有一点我在论文中没有提到,但是我希望在这里提出,就是对学术上比较精英型院校的意识形态方向的冲击,和对比较大众化院校的意识形态方向的冲击作一些比较。比较精英型的院校将(像它们现在那样)比较远离现实,从而比较倾向理想主义和比较不满实际情况。比较大众化的院校将(而且是)比较缠绕社会生活的整体,和比较埋置在社会生活的整体之中,比较接受现状和较少向往未来可能的东西。这正和人们在收入的阶级结构中所发现的相反——在上层的人更多保守主义,在下层的人更多关心变革。

论文中被忽略的另一点是大学的名字是多么有吸引力,分享大学这个头衔比职能的同质化如何好得多。职能的分化是要害,这种分化鼓励更加有效的管理。当所有院校在选择它们的活动都向上漂移,倾向于置较少吸引力但同等重要的职能于不顾的时候,更好地保持对所有重要职能的注意而并不忽略一些职能。

这篇论文是 1987 年在研究和立法组织 (Agenzia di

^①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纽约,1946年版。

Richerche e Legislazione, AREL)的赞助下在罗马举行的一系列讲演的一部分,本书第三章也引用那篇演讲。这个演讲旨在对全球的发展,特别是作为对尝试解决需求平等和需求能力之间的永恒的冲突的一篇评论,但是也是作为对意大利高等教育令人悲哀的状况的评论——没有太直截了当地这样说。

在高等教育内部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传统的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错误,甚至是一个有代价的时代错误,这样的集中注意传统大学,从 12 世纪到 19 世纪是适合的,但是在 20 世纪就很不合适,在 21 世纪甚至更不合适了。当高等教育只是为需要学问的法律和医学专业以及为高层次的教学和为神学训练人才时,甚至当高等教育增加了较高层次的文职人员和科学研究时,集中注意传统大学才是合适的;当高等教育只是从人口的处于非常有利地位的社会阶层吸收少量学生时,集中注意传统大学也是合适的。正如以上讨论的,现在,更多的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到整个高等教育或中学后的教育,不再单独注意传统大学部门。经验表明,在高等教育和传统大学仍旧是同义词和到达同义词的程度的地方,传统大学会由于大量学生的猛攻和试图给传统大学强加不一致的任务,大大地受到削弱。

多数发达的工业国,不管是否是民主国家,都正在走向普及中等教育(甚至接近普遍中学毕业,例如日本),然后走向大众化中学后教育(甚至接近普及中学后教育,例如美国)。经济引起了有技能的人才的需求,非传统大学能满足这一点,并仍保持是一种大学,而且仅仅是一种。政治组织造成期望的供应,又不是仅仅传统大学的方法所能有效地满足。

现在必须注意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不是只注意传统的

大学。所以,我希望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被重新确认,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好的特征是什么。不再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模式可以模仿——不是一度是这样的意大利的模式,也不是法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更不是任何别的模式。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全世界寻找模式,他们为医学和法律采取德国模式,为文学采取法国模式,为农业采取美国模式。今天,甚至有更多模式可供研究。趋同模式吸收一系列历史上的模式中所经历的“最好的实践”。

系统的规模

一个发达的工业国的劳动力市场所能利用的具有中学以上训练的人至少在 25% 的水平。在美国(我引用美国,因为美国有最完备的统计),几乎所有雇员的 30% 属于专业、行政和技术人员这些类目(参见表 2)。几乎这些类目中的所有个人都能充分利用中学以上的训练,其他类目的一些人也能利用中学以上的训练。此外,既是为了满足机会均等的需要,同时有时为了通过增加合格人员的供应,对受过较好的训练和得到较高待遇的收入施加压力,作为通过劳动力市场反对政府比较严厉的行动的运作,逐步走向收入的更大的平等,可以安排更多职位。这里建议一个在任何时候接纳上大学的年龄组的 25%—30% 甚至更多的制度。实际上,在世界三个主要国家中,日本和前苏联在 20% 以上,美国在 30% 以上。在其

他国家中,加拿大和瑞典也超过 30%。意大利,对积极的学生,在 20%的水平。^① (参见表 3)英国现在正从 15%走向预期的 25%的水平。

表 2 1990 年美国主要职业类雇用的文职人员统计表

类 目	雇用的文职人员总数所占的百分比
专业人员	13.7
行政人员	12.5
技术人员	3.2
行政后备人员	15.6
售货员	12.3
服务人员	13.5
熟练的生产人员	11.5
非熟练的生产人员	15.1
农,林,渔	2.6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就业与收入》38,第一期(1991年1月)表 A-23。

^① 意大利有“积极的学生”,他们经常上课,其他学生选择“学生地位”,但并不经常上课,或者根本不上课。

表 3 高等教育近似入学率:80 年代早期(日期不同)
19—24 年龄组入学人数百分比

国 家	入学人数	注释
阿 根 廷	20	
澳大利亚	22	
加 拿 大	42a	全日制学生:31%
中 国	1.2	
法 国	23	
意 大 利	22a	名义上入学约 30%
日 本	25a	只是男生:46%
瑞 典	33	
前 苏 联	22	
英 国	14	
美 国	50a	全日制学生:37%
西 德	23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计算:《联合国统计年鉴》1983/84 表 57“第三级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6,表 3.11“第三级教育按院校类型的教师和学生统计”;《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1986,表 7,“1975—1984 按年龄、性别、人口统计”;《世界人口预测》,1985。

a 注释:由于部分时间制学生人数多,美国和加拿大的入学率人为地高。按等量全日制学生人数估计,美国占 19—24 年龄组人数的 37%,加拿大占 31%。在意大利,很多学生为了地位和

次要的利益注册,但并不上课。在日本,男生的入学率为 46%,女生为 23%。

系统的构成

在趋同模式里,一个系统是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分散的,最普通的是三级分割:①高深知识和变化中的知识级,②既成的职业能力级,③编集的技能级。第一级训练人们独立工作,指导别人(如医师、律师、科学家和行政领导人),并开发和组建新的知识;第二级训练人们在一般的指导下工作(如生产工程师、学校教师或会计师)使用比较传统的知识;第三级训练人们在比较特殊的指导下工作(如技术员、低级文职人员或高级秘书),使用公认的技能。第三级要求常常容纳在部分时间制或短期课程中。当然,这三级安排还有替换选择。(参见图 3)

国别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澳大利亚 a	大学	高级教育学院	技术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法国	大学校	大学	技术学院
意大利	→	大学	←
日本	研究型大学	大学和学院	初级学院
挪威	大学	地区学院	→
瑞典 b	→	大学	←

国别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英国 c	大学	多科学技术学院 和教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美国	大学	综合性学院	社区学院
前苏联	大学	多科学技术学院	专科学院
西德 d	1. 大学	技术学院	学徒制
	2. —→	综合大学	学徒制

a. 现在正经历一次很有争议的合并过程,把高级教育学院和大学合并起来。(见卡梅尔《关于一次革命的思考:1989年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堪培拉,澳大利亚副校长委员会,1989)

b. 事实上,“大学”已经在内部被分化为研究生和研究层次、本科生层次。在19所大学中,只有7所提供哲学博士学位。

c. 英国似乎正走向合并大学和多科学技术学院——取消“双重制”——也许首先在苏格兰。这种合并将以根据在学生、教师、专业和科研经费方面竞争的成绩在院校之间和院校内部进行分化的政策取代大学的“金本位”政策。这将更加像美国的制度,可以把院校分类,但是分类的界限常常十分模糊——在这一方面,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是一个例外。

d. “综合大学”(合并大学和专科学校的职能,但不包括学徒制训练)是少数大学,没有成为一度设想的标准模式,现在共有7所(在巴伐利亚四所撤消以前,曾有11所)。它们不再被认为是将来模仿的基础。

图3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化图解

一个大问题是在第一级应该训练多大比例。事实上,在

美国、前苏联和日本三个主要国家,大约在 10%—20% 的范围内。根据总体规划,加利福尼亚的比例,按等量全日制计算,是第一级 16%,第二级 30%,第三级 54%。意思就是在最高的智力活动层次有效地使用专业人员,他们大约需要有在其他两级受过训练的五至十人相配。加利福尼亚的数字和全国的水平相近,虽然分类不是那么鲜明,全国的数字是一级 20%,二级 43%,三级 37%。

在日本,26 所研究型大学招收全部本科生(不包括初级学院)的 11.4%。在前苏联,69 所大学招收第三级教育全部学生的 10.6%。

院校之间的分化

院校之间训练层次的分化,似乎运作得最好,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把所有训练层次都放在同一所大学,造成学校规模比所希望的要大得多。同质化也把才能和兴趣十分不同的教授和学生混合起来,造成两极或三极或多极的内部聚集。例如,从事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正教授,可以撤回和整个学生团体的接触。同质化也更加难于管理这样一个混合体,这种混合体要求为学生的入学和升级,为工资,为科研资助,为使用期,为教授的工作的自主,为班级的规模,以及为其他很多事情,分别执行一系列规则,使得执行困难。在同一所大学内部,各级之间的敌意增加,像在德国综合大学已经发生的那样,把几级安排在一起意味着最高级的智力功能退化……最

高级的智力功能更加像被拉下,而不像它们应该把其他功能拉上。

同质化的过程,除非仔细控制,由于工资、教学负担、科研津贴等等的平等化,能够造成低层次的千篇一律,同时提高每单位的开支。内部的压力可能导致高层次专业的毕业生生产过剩,因为一旦他们已经在同一所学校,就比它们在不同学校难以使它们离开这些课程(例如医学)。再者,第一类职能,按它的性质,是在全国和国际的水平上进行的;第二类职能在地区的水平上进行;而第三类职能则根据地方的劳动力市场进行。

为了在一个分部门的系统内机会的平等,必须使具有适当学术背景的非常成功的学生能够从一个部门转到更高水平的部门,就像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提供的和越来越多的在别的地方也提供的办法。

有一种可供选择的分化模式,这就是在同一所包括一切的一体化或综合性的大学内部的分化(例如1968年瑞典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办法)。^① 由于历史或政治的原因,这也许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刚才提出的原因,这种模式很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在所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国家中,只有意大利单独在同一所大学内部实行分化。

现在,无论哪里,根本不令人满意的是根本不进行分化——在只有一种类型的院校,由一批教学人员教全体学生,只授一种学位。

^① 但是,瑞典已经发现教育委员会的1968年立法在一些方面并不令人满意,已经在退却过程中。

在同一所包括一切的院校内部进行分化,需要在一个层次以上授予学位——通常至少三种学位。例如,意大利正走向在历史上的学士学位之上有一个研究型学位,在学士学位之下有一个文凭类型。但是,有些教授不愿接受学士学位水平以下的文凭类型的教学,有些教授甚至不愿承担学士学位之上的研究型学位的训练,因为这将要求他们对学术职责付出更多的注意。

在这样一个系统内部,虽然最初入学时对所有学生来说,要求可能是统一的,但是,当他们寻求升到高层次时,必须在保留学生方面找到比较有选择的方式。而且,在最高层次担任教学的教授,必须能够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方法获得另外的资源,并且能够像在意大利那样在他们研究所的一些单位或者非正式的合作活动圈子得到保护。当然,独立的场所是有益的。在意大利,有些系和研究机构,凭借它们的声誉和它们领导人的个人影响,获得了不同的待遇,而且有些已经达到最高的国际声誉——例如,物理学、数学和经济学。“单一的”意大利大学,事实上内部的变化不断增加。内部的分化事实上长期存在,随着两种新的学位的增加,现在也正在法律上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赫的职位和声誉的孤岛已经存在,在广大的大学界内部,它们将越来越多。

这种在同一所大学内部进行分化的方法,只有当得到明智和巧妙的引导时,而且只有当被所有层次的参与者接受时,才能得到所必需的优秀能力。

在美国,有些赠地大学早期曾在大学内部实行另外的职能分化方法——非选择性的本科生教育和选择性的研究生教育相结合——但是这种方法现在多数已经被放弃,或者在没

有被放弃的地方,已经经过很大的修改。

没有一个近代的高等教育系统历史上根本不进行职能的分化。在法国,这个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家乡,在1968年,大学校的精英主义的专有性完全得到保护。

至于在各部门或各大学之间分化与在一所大学内部分化之间比较,前者是普遍得多的做法。

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入学机会

进入趋同模式,在第一级或最高层次,根据个人的优秀才华;在第二级,根据广泛界定的才能;在第三级,根据个人的需求。能否在所有各个层次继续学习,以成绩为依据。

在系统的某一部分或几个部分,在所有年龄阶段,平等主义的期望能够通过夜校、短期课程、函授、广播和推广教育,有一个表现的途径,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否认这种期望,能够逐步集结对整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巨大压力。

一个很好的中学系统,例如在日本,是公平入学先决条件。最不公平的方法是有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方法,在那里直到最近,所有中学都是私立,收取学费,排除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但是公立高等教育向所有中学毕业生开放而且免收学费。

获得升级的机会,又如在日本,可以通过良好的在职训练课程。

系统的资源

在趋同模式,教育的财政资源可以达到国际竞争的水平。发达工业国教育系统各个阶段的最低标准现在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一般在 5%—8% 的范围内,见表 4)(其中约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见表 5)。另有 2% 的最低标准(一般在 2%—3% 的范围内)用于科研和开发,平均约 20% 用于高等教育内部——英国和美国处于低限,瑞典处于高限(见表 6)。大约以同样的平均百分比(20%)用于“基础”研究——又是英国和美国处于低限,瑞典和澳大利亚处于高限(见表 7)。在每一个国家,很多“基础”研究都在大学或在科学院进行。

表 4 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开发的资源

国别	教育的公共支出,所有阶段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研究和开发的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总数
法国	5.4(1988)	2.3(1987)	7.7
意大利	5.0(1986)	1.2(1987)	6.2
日本	4.9(1987)	2.8(1987)	7.7

国别	教育的公共支出,所有阶段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研究和开发的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总数
瑞典	6.7(1988)	3.0(1987)	9.7
英国	5.0(1987)	2.3(1986)	7.3
美国	6.8(1987)	2.6(1988)	9.4
前苏联	7.9(1988)	6.2(1988) ^a	14.1
西德	4.4(1987)	2.8(1987)	7.2

资料来源:教育支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0,表4.1;研究和开发支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0,表5.18。

a. 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可比。在前苏联,所有研究和开发支出都是“公共”支出。本表所列其他国家,都另有“私人”支出。

表5 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

国家和年份	高等教育支出占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
澳大利亚(1987)	30.7
加拿大(1988)	28.6
东德(1988)	24.3
法国(1988)	12.5

国家和年份	高等教育支出占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 (%)
意大利(1986)	10.3
日本(1987)	22.2
荷兰(1987)	29.5
瑞典(1988)	12.5
英国(1987)	19.6
前苏联(1988)	13.0
美国(1986)	40.0
西德(1987)	21.1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0,表 4.3。

表 6 高等教育部门研究和开发支出

国家和年份	高等教育研究和开发支出占国家研究和开发总支出的百分比 (%)
澳大利亚(1987)	27.7
加拿大(1987)	23.3
法国(1987)	15.0
意大利(1987)	20.2
日本(1987)	20.5
挪威(1987)	21.4

国家和年份	高等教育研究和开发支出占国家研究和开发总支出的百分比(%)
波兰(1988)	21.0
瑞典(1987)	28.9
英国(1986)	11.6
美国(1988)	13.8
西德(1987)	14.5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0,表5.11。

表 7 部分国家基础研究支出占国家研究和开发总支出的比例

国家和年份	“基础研究”支出占研究和开发总支出的比例(%)
澳大利亚(1986)	28.6
法国(1979)	20.9
意大利(1986)	16.7
日本(1986)	13.8
挪威(1987)	13.7
瑞典(1981)	24.6
英国(1978)	7.1
美国(1983)	12.5
西德(1987)	19.3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7,表 5.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0,表 5.10。

以上统计表明,在所有教育的各个阶段,教育和研究的支出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以改进技能和增加知识,作为对人力资本及其绩效的全部正式投入(表 4),有些国家具有较高水平,前苏联的总数在 11% 以上。

为提供最高技能的训练和科学研究的资源集中在趋同模式。在日本,这些资源大量地集中在 1000 所以上高等教育机构中的 26 所大学和 2300 所其他中学后教育机构。在《化学摘要》杂志中列举的全世界前 5 所大学中有 4 所大学来自日本;在前 22 所大学中,日本有 8 所,美国占 13 所,加拿大占 1 所,但是美国和加拿大都执行不那么严格的集中力量的政策。^① 总的来说,近来日本在国内把大量资源用于生物化学、电子学和能源利用,现在还用于为海外任务的管理训练。当然,日本仔细地选择在出口贸易集中资源,由于机会变化,已经改变资源的集中。尽管日本的高等教育系统有很多缺陷(高等教育的某些部分学术质量低),他们的教育系统在总体上有这样一些优势:出色的中学训练,在少数大学集中庞大力量进行科研和研究生训练,以及很好的厂内训练计划。

英国现在正走向根据竞争的业绩更大地集中科研力量的正式政策。

但是,集中科研的政策常常受到力量较差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抨击。

^① 富永庆伊:《研究活动——化学的例子》,载所编《大学评价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

系统内部的灵活性

最好的高等教育系统,现在更多地发展一个层次和稍后更多地发展另一个层次,更多地集中一种技能和稍后集中另一种技能,以及现在资助一个科研领域和稍后资助另一个领域方面具有灵活性。例如,英国新近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把重点从大学转移到多科技术学院——多科技术学院成为许多总理们的新的宠儿,不仅仅是在英国。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集中力量在社区学院,在 80 年代集中力量在研究型大学,这需要响应变化中的经济需要的意愿和能力,响应变化中的政治组织的期望的意愿和能力,响应变化中的从一个智力活动的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响应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所发展的竞争优势的意愿和能力。

关于英国的一个补充说明

英国,曾经被它在高等教育的巨大的传统力量和内部行会控制,被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残余阻止前进。近年来,已经迅速走向高等教育的趋同模式,通过多科技术学院强调科学技术,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从 15% 上升到 25%,而且走向政府引导的竞争。这样做是对过去一个世纪来它的经济成就相对

衰退所做出的反应。经济情况的恶化,近年来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越来越严重。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的期待。英国也许有机会把高等教育作为它最成功的出口服务——正如在罗马帝国内部高等教育对雅典一样。它有一系列出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准,有很多机构可用,其中很多属于诸如工程和工商管理领域,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它教学的用语是多数外国留学生喜欢专攻的。英国正在减少每个学生的公共开支,包括通过提高生师比例和把教学开支通过贷款制度,从政府分散到学生。它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供更多的普遍入学机会,如何鼓励成功的学生转学上进,以及如何协调整个高等教育系统。

关于职能分化的附言

本章讲演稿完成后,一位很受尊重的学者泰克勒(Ulrich Teichler)^①对分化和同质化提出了与我不同的观点。泰克勒在发生的“结构变革”中没有看到“趋同趋势”,他讨论近年来三个关于“整合”的实验:①在德国,泰克勒是卡塞尔综合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认为,虽然改革在这些合并的院校内部,是为了以前学生中未被充分代表的学生,的确导致比在还没有合并、比较分割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之间具有更大的“渗透性”,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它原来的目标”。他说,内部的整合

^① 泰克勒:《变化中的高等教育模式》,伦敦,1988年版。

只是部分的,而且继续有学生分开入学,分别聘请教学人员和分别授予学位。同时他指出,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内部决策“更有争议”。②在瑞典,1968年教育委员会进行的实验,上面已经提到过了。③在纽约市立大学进行的实验。但是,纽约市立大学被严格地划分成分离的两年制和四年制的学院和一个研究生中心,虽然它们都包含在一个总的管理系统之内。

在这些实验中,没有一个表明是“纯粹的整合模式”——有单独的学生群体,单独的教学人员,单独的普通课程和单独的学位年限。其中两个(德国和瑞典)在一种或另一种重要程度上具有内部分化,纽约市立大学在分离的学院之间实行外部分化。一个单独的同质型的大学还没有出现。

泰克勒也提到,在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有关机构的讨论正在进行:①在英国,正如上面指出,虽然“双重制可能被废止,趋势是走向各个院校之间较大的分化。②在法国,大学学校在扩充中,在大学技术学院(IUT)和大学之间更大的调动机会正得到鼓励。这两件事已经提供更大的机会均等。但是并没有走向单一的同质的院校形式的运动。③在澳大利亚,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正在合并,但是并不包括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运动是从三方分割到两方分割。

我的结论是:现有的证据一般支持一个分化的,不是同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反映分化的学生,分化的教学人员,分化的课程和劳动力市场中分化的职业——每一方面都太分化,以致不能有效地安排在一种同质的院校之内。而这是我自己的爱好。但是泰克勒关于情况的分析的确强调在若干国家,还没有正式解决的结构。

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和单一的“大学”的发展是一致的。

为多数职业而不是为少数专业服务的普遍入学的阶段,需要在院校之间或院校内部有更大的多样性。在这个新的阶段,纯粹的同质化模式,与其说是在任何地方一个实际的成就,不如说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理想。事实上,普遍入学到多元型的大学,在它们中间易于转学,甚至鼓励转学,这样的大学最有利于机会均等。

第七章 趋同模式中的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①

这篇论文像第三章和第六章一样,也引自在罗马所作的同一个演讲。它是关于我所谓高等教育的“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这是从事于为最好的知识和最高的技能进行国际竞争的部分。因此它是为集中“最优秀的实践”最受压力的部分:在德国,“讲座”变成系;在意大利,引进了哲学博士;在前苏联,越来越从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我想明确地考虑以下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在工业国家的作用和实施问题。^② 不管是在独立的研究型大学内部,还是作为一个包含一切的综合性大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我将简称为“研究部分”)有这样几个特殊问题:

① 本章以在研究和立法组织赞助下于1987年1月27日在罗马所作的一次讲演为基础。早先一篇文章曾以《大学界的重要时代:积累的传统和现代的需要》为题,载《欧洲教育杂志》22卷2期,1987年。

② 发展中国家通常既有一个比较小的这种部分,也有一个不那么发达的普遍入学的部分。他们倾向于更多地集中在学术事业的中间部分。但是,他们的确需要在诸如医学、农业和技术方面与国际发展有些接触,以便很好地为他们的人民服务。这可以通过聘请外部专家,派他们自己的学生出国留学,或者通过在国内训练他们自己的学生来完成。而且他们倾向于通过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依次进行。当他们这样实施的时候,他们开始创办他们自己的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并面临经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相同的政策问题(包括待遇的分化)。

(1) 现代社会很多文化上的矛盾,包括经济范围内能力的压力,政治组织范围内的机会的压力,以及如反主流文化中个人行为范围内享乐主义的压力,对研究型大学的影响比对多数其他机构的影响大得多。

(2) 向上流动到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正在敲门要求入学。

(3) 作为政治活动中心的高知识部分的吸引力,似乎已经处于一条不受约束的上升中的曲线。

(4) 全世界的国家,过去很少像现在这样号召它们的研究部分在强化的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帮助它们;而且甚至各国的各地区,诸如美国的各州,正在提出更加繁重的要求。

(5) 工业的需要,在研究和新知识的层面上,正在比过去任何时候变化得更加迅速,给课程和人员配备带来直接的影响。

(6) 但是,新知识和高知识部分,比高等教育的其他部门更加陷入各种社会压力,需要从社会得到更大的自治以履行它们的职能。它们需要自治,以便通过优秀成绩接受和提升成员。它们现在是高等教育中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最中心的部分,但是也是需要从社会得到最高程度的自治的部分。

首先,趋同模式中的研究部分,是以优秀为基础的活动中心,与创造性的艺术、表演艺术、竞技运动和从事出口贸易的工业处于同样的地位。这意味着它们需要支持高等教育其他层次的发展。不是勉强的,而是作为它们反对平等主义压力和低层次智力活动的第一道防线,否则它们将面临大型化和爬行的平庸的趋向。它们还需要支持其他层次作为人口中所需要的技能和一般启蒙的来源。而且研究部分必须肯定,把

最有潜力的学生从招收的所有学生中识别和找出来。

此外,研究部分必须严格根据学术人员工作的质量寻找学术人员和予以提升。这种提升,要做到公平,必须根据若干合格同事的判断,而不只是根据一位同事的判断,正像德国和意大利经常做的那样。为了社会的原因,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就可以从在机会平等背景中吸收受过训练的人才中得到好处。这种方法与罗尔斯所著《公正的理论》一书的原理一致。^① 当训练是根据在补偿性机会平等背景中的特殊才能和努力时,当所增加的服务对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有最大的好处时,利用那种训练的程度和机会的不平等是“公正的”。这是比训练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的定义更加宽阔、更加现实和更加有效的公正的定义。这也是托马斯·杰弗逊的一个主张:在平等主义社会中的“天才的贵族”。

在拨款机构精选的重点中的激烈的竞争氛围里,优秀是最先进的,特别对寻求提升的年轻教学人员来说,这要求高度的学校自治和教授自治。对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之间和内部有创新精神的行政领导,以及通过不经资历保护的结果检验这种领导,也要求一定的灵活性。此外,国际的竞争只能由专任教授、专职领导和全日制学生来对付;反过来,要求适当的财政资助使这种全部时间的注意成为可能。

在以优秀为标志的任何领域,竞争内在地比集中起来的详细计划能获得更好的结果,但这是在一般规则和总的指导下的竞争。这种指导的进行,最好通过共同的管理机制,特别包含联合评议会的教授成员,以及联合某种独立和有影响的

^① 罗尔斯:《公正的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理事会或委员会的社会代表(非政府官员)。单纯教授会的控制,例如在早期的英国,可以导致忽视公众的需要,而单纯的外部控制可以忽视学术上的考虑。

在研究部分的趋同模式,最好的方法是根据优秀由拨款机构筹措资金,像银行提供贷款那样,随后对照所做保证仔细检查结果,不通过刻板的公式或详细的官方规定。

当然,发言和出版的学术自由是必需的。

在一个民主国家,参与外界的政治进程,最好根据竞相提出事实和意见,而不是利用大学以其机构的身份,作为党派政治的政治工具。可以指出,沿着敌对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路线进行激烈的内部分裂活动,并非争取一些,也许多数,最有能力的学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学校特征。

趋同模式的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具有根据智力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单纯以经济或国家的需要权衡它们努力的自主权。它们能够追赶包括在它们的使命范围内的所有学科的所有智力活动领域的知识发展。金钱的报酬不应该是它们成功的惟一检验标准。

总的来说,能力的层次愈高,在运行中依靠优秀和自治的需要愈大。因此,在实行最好的趋同模式的最高层次的院校和专业,几乎普遍不受规则的约束,具有更多的竞争自由。

经验也表明,研究部分既是研究生训练的最好场所,又是研究的最好场所,而且当研究生训练和研究在一起进行时,两者可以搞得最好。有些系统在以大学为一方和科学院内部的研究所为另一方之间分开进行,搞研究的科学家需要和年轻人接触;年轻人需要和搞研究的科学家接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各专业领域之间也比集中比较狭窄的研究所单独进行

也能够提供更多的接触。而且很多发展是在各专业领域彼此接触时出现的。不使用最好的科学家当教师和不使用最好的学生当学徒,也是人才的浪费。近年来,前苏联寻求把这两种努力结合起来,但是迄今成效有限。已经发现的大多是给大学增加更多科研,和给研究所增加更多训练,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德国已经采取主动把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和大学的活动结合起来。(有关实行最好的一般的趋同模式和比较特殊的研究部分的主要特征大纲,参见表7。^①表7中研究部分的最后一些特征可以看做进入保存和吸收最优秀的年轻学者和科学家国际竞争活动范围的要求。)

具有以上一些特征的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的涌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但是,涌现的过程并非总是容易的,而且包含把额外的资源供奉少数被宠爱的人,结束在一个领域由一位正教授垄断权力,从官僚控制取得自治,单凭优秀提升,承认有创新能力的学术领袖,以及其他转变中,转变到专任教授和全日制学生。

有关对管理的影响——微观管理模式的衰微

从中世纪后期大学的游学学者模式到新涌现的高等教育

^① 但是,在80年代,“课程的组织”,特别是课程方案,在若干欧洲国家还没有“趋同”。参见泰克勒:《趋同还是趋异:变化中的课程组织》,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1988年。但是1992年以后,在欧洲共同体的影响下,模式可能改变。

趋同模式的历史流动,对高等教育系统总的管理已经产生根本的影响。

随着拿破仑的控制的大学微观管理,最剧烈的历史影响发生在法国;随着共产主义,最剧烈的历史影响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包括对内容的全面控制。但是,有很多其他比较宏观控制的形式的发展,包括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皇家委员会,以及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联邦政府的赠地学院试点。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随着国际(和地区)竞争对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通过技能训练和科研对经济的贡献所产生的兴趣的影响,全世界出现各种形式的控制浪潮。从 1900 年到现在,长期的趋势是政府更多地控制方向,新近有一些后退。

表 7 包括“研究部分”的趋同模式纲要

- (1) 在扩张到大众化中等教育系统和接着普遍进入高等教育以后,发展了一个超出传统大学的高等教育系统。
- (2) 这个系统达到包括同年龄组 25%—30% 或更多。
- (3) 在系统内部,学生分布在各学校和各学校的各个部分,按职能的分化分布,通常分成三个或更多组成部分。
- (4) 进入高层次学术机构根据优秀,进入最低层次根据需要。
- (5) 专用于教育的财政资源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 5% 或更多。以这个总数的近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 1% 至 2% 用于高等教育。
- (6) 科研经费,包括大学在内,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 2% 或更多;在高度选择的基础上分配给各高等教育机构。
- (7) 整个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的扩张(和收缩)是灵活的。

(8) 系统内的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以下列特征为标志:

- * 学生和教授的选择和晋升严格根据优秀
- * 给予很大的学校自治
- * 以创业型领导为标志
- * 配备全日制学生, 专任教授, 和专职行政人员
- * 通过竞争的冲力而不是通过标准化的规则进行控制
- * 通过独立和有影响的理事会或委员会而不是通过中央的计划或单纯教授会进行指导
- * 根据工作的质量分配资源
- * 授予宽阔幅度的学术自由
- * 保护不受外部政治目的的利用
- * 允许根据学术的理由在整个知识领域分配经费的合理的内部权力
- * 组织上把研究和高级训练合并

(9) 管理是通过宏观指导与竞争的市场结合

一般地说, 已经涌现四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全面管理模式:

(1) 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游学学者和主要的自治的大学的自由市场模式。

(2) 英国皇家委员会时期及大学拨款委员会早期和中期影响大学使命和财政的一般流动的宏观控制市场模式。

(3) 拿破仑法国的微观管理模式, 详细控制课程内容和财政。这个模式传播到各国, 如意大利和西班牙。

(4) 包括控制意识形态思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集权主义模式。

现在, 重新强调这些模式的新时期可能正在到来。集权主义的模式现在在衰退, 也许行将消亡。集中的微观管理模

式遭到抨击,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进行着分权的微观管理的巨大努力。和美国少数州一起,澳大利亚目前是一个大的例外。

如果趋势是远离集中的微观管理,那么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国际化是在起作用的一个因素。在国际竞争中,一般可以说宏观控制模式运转较好,特别是对研究型大学。^①在目前比较竞争的知识世界,大学自治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因此,在国际竞争最激烈的地方,研究和高级训练部分是发展最快的。自治比较为等级性的决策模式对事件允许较多易起反应的调整(对国家经济也是如此)。集权的系统比较为分权的,比较以市场为导向的系统更加难于变革。控制的方法愈是官僚主义的,国际间学者、学生、研究试点的流动,和别处成功的经验的模仿愈受阻碍。例如,在英国,好像有一个根本的变化在进行着,从一个一度指令性越来越强的方法,转到一个市场导向的方法,在其他迹象中,以下政策改变的官方声明可以证明:

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趋势之一,将是我们越来越和西欧整合,以及我们高等教育机构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但是我意识到我们可能面临在迄今为止西欧所遵循的路线扩张和沿着我们美国兄弟所遵循的模式扩张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我将说,在大西洋对岸那么明显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代表着我

^① 本大维的结论是,“分权制度更加有效”。最成功的大学在管理上实行分权,并彼此进行竞争。见本大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1971年版,第171—173页。

们在英国——和我希望在整个欧洲——将要走向的未来。^①

英国的大学正展开更大的竞争以吸引学生,获得政府科研经费,设置新的和扩充的学术专业,吸引公司团体的支持,吸引基金会资金,包括从欧洲经济共同体获得资助;教授成员彼此更激烈地竞争以达到最高的工资水平。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正朝相同的方向运作,在各国微观控制的界线以外建立比较自由的学者和学术流动。

当前走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的工作,在于避免各民族国家历史上不断增长的微观控制。过去走向更大的统治主义的控制的趋势,在很多地方受到越来越大的抨击。再以英国为例,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校长在他的 1986—1987 年度报告中写道,他的大学想要“全部地打破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直接联系”。^②

在总的管理机制中,一个根本的历史性变化似乎正在进行之中,更加强调为学生的竞争,为教授成员的竞争,为科研经费的竞争,为新的项目的竞争等等,较少集中的等级性的决策。一个副作用是解放教育领导,以便他能在这些新的竞争中进行领导——在“创新型大学”内部给竞争的领导授权。另一个副作用是外部官僚的控制凋谢,但并不消失,因为更多详细的决定是由内部的大学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做出的,很少是外部的非教学人员做出的。指导繁荣了,琐细的控制放松了。但是,由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响,游学学者的完全的

① 有关从不断增长的指令性控制转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影响,见教育和科学国务大臣肯尼斯贝克于 1989 年 1 月 5 日在兰开斯特大学一个会议上提出的讲演《高等教育:今后二十年》。

② 希尔斯(校长)为《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1986—1987 年报》写的前言。

“自由市场”从来没有完全再涌现。

宏观指导模式要求政府当局的某些自我克制。这种克制包括预先和学术团体磋商,利用大学教学人员帮助管理高教系统,把微观决策让给学术当局。允许学者在所资助的科研的宽阔领域内选择他们特定的项目,提供经费用于学术团体可能选择的民族国家的非重点领域,尊重学生对学习地点和领域的选择,以及依靠一次总付的财政拨款,不采用条目预算。

但是,学术机构也必须用阿什比(Eric Ashby)的术语来说,通过对资助他们的社会“足够敏感”和“適切”获得他们的自治。他们必须做到即使和他们周围的社会不完全一致,至少要和他们周围的社会和谐共存。^①

无论如何,高等教育的趋同模式,特别是它的研究部分,包含更多引导性的方法,把大学放在国内和国际彼此竞争的环境中,而不采取琐细的官僚主义控制的比较统治主义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凯恩斯的方法,不是计划经济。

宏观指导包括:①在大学之间划分使命,确保对社会服务的平衡;②全面决定入学政策;③教学和科研的财政资助政策;④提供管理模式,平衡教授会和公众利益和学生市场的影响;⑤控制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在经济和政治上利用的规则。这种宏观指导要求高层次的政治家风度。

在指导机构中,有很多关于理解和能力的问题,有关于这种机构内部的政治上的相互捧场的问题,以及在这种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给它们一个沉重的负担。

^① 阿什比和安德森合著:《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5页。

第八章 1960年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一个预期的观点^①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进行了若干国家高等教育规划的研究。该组织指定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国家”进行专题研究，这既是由于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比较成功，又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具有世界上杰出的高等教育系统。研究结果是于1990年发表的以加利福尼亚的高等教育为题的报告。^②

1990年5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报告竭力主张把这个总体规划和这个领域广泛的文献普遍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我被邀请结合当时加利福尼亚的具体情况就规划的早期历史发表评论。正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所说，我们确实抓住了历史和引导历史，而没有被历史压倒，但是我们实际上很少想历史而更多地想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是说我们创造历史，我们这样做，是一个并非存心的副作用。

^① 本章原载罗思布拉特主编：《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总体规划和加利福尼亚梦：一次加利福尼亚谈话》，伯克莱，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1992年。

^②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加利福尼亚的高等教育》，“各国教育政策回顾丛书”，巴黎，1990年。

总体规划确实帮助加利福尼亚的高等教育向前发展,而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是制订这个规划并不容易。在我一生中,写任何一个报告所进行的磋商和说服工作,从来没有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和我一起写这个报告的一些人也会这么讲。近年来,很少类似的高等教育规划做了这么大的努力,也许只包括英国的罗宾斯报告、瑞典的1968年教育委员会报告、阿什比的尼日利亚报告、法国的富尔报告。^①但是,这些报告中没有一个报告完整地幸存下来。

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职能分化制度。

由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收入下降,这个规划现在受到预算的压力。有些人说,这个规划的幸存受到威胁,我并不同意。除别的因素以外,现在人均实际收入比通过总体规划时高60%。1960年时在经济上担负得起的事情,在1990年应该更加担负得起。

三十年前,总体规划诞生。1959年2月1日,加州公共教育督察长兼加利福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行政首长辛普森(Roy Simpson)代表各州立学院,我代表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同到州立法机关,要求准备一个总体规划的机会。

当时,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规划在三十年以后,而且经过了州政府三次官方检查之后,会保持得这么完整。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这个规划会受到关心加州以外的

^① 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罗宾斯):《高等教育报告》,伦敦,皇家文书局,1963年;瑞典1968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英文摘要,斯德哥尔摩,1973年;中学后证书委员会(主席阿什比爵士):《教育投资,尼日利亚中学后证书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拉各斯,联邦教育部,1960年;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富尔):《学会生存》,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

影响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杰出的专家检查组的好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和菲思(Dorotea Furth)^①代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会认为这个规划值得研究,或者哈尔西(A. H. Halsey)、永井道雄(Michio Nagai)和塔巴托尼(Pierre Tabatoni)会参加对这个规划的检查。^②

当时我们主要关心 60 年代,在较少程度上关心 70 年代和 80 年代,而且完全关心加利福尼亚。虽然它被叫做“总体规划”,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我们确实是在制订一个规划。我们真正在做的,是议定一个能同时为州长和州立法机构所接受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条约。我们需要一个计划的结构,不是一个规划。我们需要木工的术语所谓的“粗制的结构”,一个详细制作的框架——即德国人所谓一个“框架法”。而且我们肯定并不要——事实上我们正设法避免——尤其是一个严密的、刚性的和本身足够的文件意义上的规划。

但是这些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检查人员是以追溯既往的观点而来评估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解决方法的质量——以及对其他州或国家有什么可能的含义。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的成功可能具有任何长远的价值,我们关注解决当前的问题。当时对我们的要求是达成一项地方的和当时的解决办法。我们并没有想我们是在制订一个模式。我们

① 帕帕多普洛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社会事务人力和教育处副处长;菲思,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社会事务人力和教育处高等教育主任。

② 哈尔西教授,牛津大学社会和管理研究系主任;永井道雄,日本国际会社主席;塔巴托尼教授,巴黎桑戈大学教授。塔巴托尼教授未能出席原拟在会上提出论文的会议。他们的报告以《加利福尼亚的教育》为书名出版。

根本没有正在制订一个模式的思想,意思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为其他地方模仿。我们甚至并非试图在这里最大限度地从解决问题的意义上来制订一个模式。用经济学的术语:我们并非试图把最终的实际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更确切地说,我们正在从事“满足”当前所感到的需要——寻找一个在较短时间内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在创造历史。

这个总体规划曾经被称为“加利福尼亚之梦”,我们并没有做加利福尼亚之梦。事实上,对于我们参加制订总体规划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在试图避免正面临的一场噩梦。我们不是在高层次的尖端的权衡理论上提供选择的办法,而是非常低层次地实际地考察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不是好像站在古希腊城市的卫城(Acropolis)上回顾过去的事件,而是在广场集市(Agora)在最后期限的纪律的情况下做买卖。但是,三十年以后,那里的哲学家现在的结论是,我们做的买卖有些成分具有永久的,而且也许具有普遍的价值。他们对于那时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看法,比我们自己在当时所理解的要深得多。

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报告刚发表时,我读了这个报告,这使我想起很多年前在伯克莱的一次大学会议,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是我们的主讲人。他讲得非常好,朗诵了他的诗,但是对作为一位诗人也做了评述。他说,除了许多别的事情以外,当他写一首诗时,他常常知道他所说的东西的第一个含义。有时他对可能被塞进诗中的第二个含义有一个朦胧的看法,但是,只有评论者——批评家——绝对肯定知道诗人的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和第七个意图是什么。同时我必须指出,我们的检查者对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加进了比

我们当时所想的稍微多一点的内容。

以下是这个总体规划的制订过程中有关我们参与者的看法和感觉的一个报道。这是当时在现场的人亲身叙述所感觉到的情况。

规划的起源

具体地说,总体规划是1958年8月在卡特(Ed Carter)董事位于洛杉矶的会客室开始的,这是我在7月1日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以后第二次和校董事会开会。卡特是董事会教育政策委员会主席。我在委员会说,大学处于无法忍受的局面,我们正面临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职责将是什么——为本科生训练?为哲学博士学位?为专业学位?为科学研究?

有些州立学院想要成为羽毛丰满的大学,有些社区学院想要成为四年制学院,私立学院感觉受到他们所谓公共部门的不灵敏的扩张的威胁。大学将继续成为公共部门哲学博士学位和高层次专业训练(医学、法律、工程、建筑和其他专业)以及基础研究的惟一提供者吗?大学将继续负责本科生,特别是本科生低段的教学吗?将会有多少新的校区,位置在哪里?在每一个公共部门,入学的要求将是什么?公共部门将如何协调——通过加利福尼亚州还是通过他们自己?董事会希望我规划大学的未来,但是一切都没有定——对规划来说,环境非常困难,其他部门的领导也面临类似的无法估量的东

西。我们每一方面能够分别做出什么计划,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都承受着时间的压力,我们在思想上都感到时间非常严峻。学生的“浪潮”几乎袭击我们的堤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美国近代史上最高的出生率。所有那些在婴儿激增时期出生的年轻人,正向我们大学走来;此外,每年有50万新移民进入加利福尼亚;除此以外,我们正在进行从大众化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变。把这三方面合起来,很清楚,我们正在被淹没,需要有所准备。

另外,不久以前,在1957年秋天,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特别被号召提出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和更好的研究成果,面对当时对我们来说被认为是极大的世界危机,也是在这个时候,经济学家们开始谈论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一书中曾经谈过的事情:物质资本重要,人力资本也重要,人力资本可能比物质资本本身更加重要。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被召唤比过去任何时候为更多的职业培养更高的技能。

还有另外一种压力,那就是州立法机关正在接管决定高等教育政策的过程中,把决策权从高等教育本身接过来。立法机关面前就有十多个有关改革高等教育的不同方面和在全州建立几个新的校区的法案。我们特别感到忧虑,因为恰好通过立法机关的行动——不是经过州教育委员会的请求——建立了一所新的州立学院。这所州立学院位于小城特洛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城,一个值得尊敬的小城,在那里建立州立学院以前,仅仅以一件事情出了名:每年在那里饲养和屠宰的火鸡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但是特洛克也出了州议

会上院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下院的议长就来自附近的莫德斯托),他已经在议会通过一个法案。法案说,在特洛克,和所有火鸡一道,将有一所新的州立学院。立法机关还批准索诺马建立一所新的州立学院,这所学院列在州教育委员会优先考虑的名单的最后。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变得紧张不安。立法机关是不是要接管?我们特别对特洛克比较敏感,因为在1944年,州立法机关曾经给加州大学——没有经过大学请求——圣巴巴拉州立学院,后来(1958年以后)对大学成为一笔巨大的财产,但是在1944年,是强加给大学的。我们并不担心看到立法机关这种侵入我们看做高等教育内部事务的事情再次发生。当时我们都很在意我们所要求的自治。我们对接管的政治过程的任何迹象深为关切。

在卡特董事寓所的会议之后十八个月,在辛普森和我去立法机关请求一年的宽限准备总体规划以后十二个月,我们有了一个总体规划,得到大学董事、学术评议会和州教育委员会的一致赞同——还得到州立学院的一些院长和他们的教授们的一致但是勉强的同意;得到社区学院联合会的一致同意;以及独立学院和大学的一致同意。而且在立法机关表决时,得到热烈的赞同:在下院,70人投票,70人赞同。在上院,37人投票,36人赞同。1960年4月26日,州长签字,规划成为法律。那是在非常大的压力下,非常艰苦的一年。

三十年以后,人们回顾过去的某件事情,从目前的观点,这也许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不可避免。我们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把规划搞出来,而且我们公开地搞了。

测不准的事情

有很多大的困难。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为止,并没有总体规划。好像我们不会成功了。在州立学院和大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冲突。州立学院正在从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成为综合学院的过程中,而且正在增加工程和其他领域。他们想要增加的每一个专业,都必须经过由大学和州立学院的代表组成的联络委员会同意。十分常见的是大学的代表对请求的无论什么事都说“不”,而当我们的代表说“不”的时候,被猜想他们不能这样做。这在两个系统之间引起很大的紧张关系,由于以下的事实,这种紧张关系增加了。从我们在大学的观点看,有些州立学院,经大学否决,只是继续进行,以某种迂回隐蔽的方式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我们想那是令人不快的,双方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坏。当时全国的州立学院都想成为羽毛丰满的研究型大学,而且有一个成功地转变的好模范:密执安州立大学。这所大学曾经是一所赠地农学院和一所师范学院,但是被叫做密执安州立“学院”。作为伯克莱的校长,在联络委员会的很多会议上,我在场外旁观,目睹这两部分之间的极大的紧张关系和对抗。有时我两手捧着头,坐在那里担心我所听到的东西。

有些社区学院也有很大的期望。几乎不可避免的,有些社区学院喜欢成为四年制学院,他们也想扩大到包括全州。而且他们反对有些州立学院授予竞争性的两年制学位——在

总体规划发展过程中,在这两点上他们胜利了。私立学院害怕公立部门将压倒他们,并且在他们近旁建立校区。

州教育委员将会怎么做?州教育委员会负责州立学院,因为这些学院为教育委员会控制下的中学和小学提供大部分教师。州教育委员会愿意放出他们控制下的学院吗?如果是这样,这些学院可能变成什么样呢?随着立法机关对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行使它固有的权力,它是否可能决定什么是这些学院的未来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确实知道立法机关已经给我们一年时间准备一个总体规划,假如我们不能同意,那么政治代表将有机会最后做出决定。

也还不清楚在1958年秋天,新的州长布朗(Pat Brown)将扮演什么角色。州立学院的代表广泛地引用(或错误地引用)布朗竞选期间在奇科州所发表的讲话。据说他已经对州立学院成为大学校区做出承诺。有些州立学院代表对这种“诺言”抱很大希望,而且这个承诺大大地鼓励他们。州长工作班子中的一个成员达顿(Fred Dutton),他后来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董事,十分勇敢地说,加利福尼亚大学是过去的浪潮,而州立学院乃是未来的浪潮;加州大学是一个保守的、精英型的、共和主义的机构(它的董事主要是共和党人);而州立学院是进步的、面向大众的、民主主义的机构(它的还待任命的第一批董事主要是民主党人)——州立学院是为“下一个千年”的大学。从州长办公室将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并不知道。

协商规划

这些测不准的事情,有些最终仍未解决。在伯克莱大学会堂董事会办公室最后一次会议上,一切都中止了。有几位州立学院院长造反,这是在1959年12月。我们极度担心一切都完了。在大学会堂我的办公室里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试图再挽回局势。我们有七人或八人与会。代表大学的有麦克劳格林(Donald McLaughlin)董事、麦克亨利教务长(Dean McHenry)和我自己。麦克劳格林董事是州教育委员会主席,麦克亨利是学术规划院长。代表州立学院的有辛普森、布莱尔(William L. Blair)、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杜姆克(Glenn Dumke)、旧金山州立学院院长和院长组组长。我相信,州教育委员会的海尔布伦(Louis Heilbron)也在场。私立部门的代表是西方学院院长和总体规划研究委员会主席孔斯(Arthur Coons)。

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我们孤注一掷地试图把若干最有影响的州立学院院长反对的协议再一次提出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所有我们在场的人都知道后果是什么:我们将不得不去立法机关而且说:“我们失败了,现在轮到你们了。”加州大学做出它最后的让步——最后的“变温和者”——结果足够这

样做。我建议加州大学和州立学院联合授予哲学博士学位。^①这个建议被接受。所以当天晚上大约6点产生了一个总体规划；但是，在午餐时，并不像会有任何总体规划，或者好像是这样。

很少有重大争议的问题的解决比这个过程和所涉及的人要好些。总体规划就是这样，我想回顾一下在1958年8月我和董事们举行有关总体规划的第一次会议，同意我应该发动搞一个总体规划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好处于联合委员会在州立学院和加州大学之间绝对僵持的局面，所以我去看辛普森，并且说：“罗伊，联合委员会运转不灵。”他同意：“我们不要立法机关接管。我们也不要某个外部的咨询团体来加利福尼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难道我们不能找到某种方法处理这个问题？”于是我建议把一直属于学校的一部分而不属于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的社区学院请进来参加这个进程。我说：“如果我们把他们请进来，就有三个方面，而且他们应该成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不把私立学院也请进来呢，因为他们也有兴趣，而且那样就有四个方面。也许我们在处于僵持局面的两个方面不能达成协议的地方，在四个方面我们能够达成协议。”于是我建议，为保证进程的公正无私，请私立部门任主席，罗伊同意。这些协议的每一部分都极端重要。特别大胆的是建议给予私立部分这么大的影响。

这是一系列具有高尚思想的建议，所有各方都受影响。他们在这些解决方法中都利益攸关。也有一个思想比较低的

^① 我从印第安纳大学校长威尔斯那里得到这个观点。威尔斯和鲍尔州立学院做了类似的安排。

方面,那就是我刚才提过的方面:在不能在只有彼此那么对立的两个方面得到解决的地方,你能够在三个或四个方面之间得到解决。甚至还有一个思想较低的理由,就是我认为当时加州大学和私立院校和社区学校的关系,比他们和州立学院的关系要好些。在我的一生中,我倾向热爱思想高尚的理由和思想较低的理由相互支持的情境,而这次是那种情境之一。

问 题

什么是重大的争论点和核心的项目?在各部分之间,职能的分化是关键。每个部分学生招生层次也需要决定,以反映职能的分化。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想法,社区学院将适合本州所有中学毕业生,而且社区学院将遍布全州各地,以便每个中学毕业生将在一所社区学院的使用长期车票的距离以内。目前社区学院有150万学生,那时他们有30万。

当时州立学院大约招收中学毕业生的50%。他们同意下降到33%,这意味着州立学院把一些学生让给社区学院。但是,结果更多平均能力稍微高的学生进州立学院。我们同意大学从招收15%的中学毕业生下降到12.5%,这样具有相同的影响:比较多的学生给社区学院,稍微多一点的学生给州立学院,大学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学术证书。然后我们增加了转学权利,这一点很重要,使得任何在一所社区学院学习适当好的人能够或者转学到一所州立学院,或者转学到加州大学。这也意味着在社区学院、州立学院和大学的课程之间更加需

要连接。使得学分能够转移,要求能够满足——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必须同意某种协调的制度,因为我们不仅要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也要保证这个计划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以内。我们设置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由来自所有四个部分的代表组成,后来又改变,增加了政府的代表。直到卡兰(Pat Callan)于1978年担任加利福尼亚中学后教育委员会主任为止,协调工作的运作并不太好。在那时以前,我们有过困难,但是卡兰来了以后,以他的宁静的方式,他的良好的判断力,他的非常大的能力,以及所有高等教育的四个部分的积累的信任,协调工作开始良好运行。

为州立学院做了很多工作。不是在微观的基础上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处理他们的建议,我们在宏观的基础上进行——在他们全面的使命范围以内他们需要的任何事物。我们同意他们应该有全面的硕士学位专业,决不再要请求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的许可,这安排在他们单独的管辖权范围以内。我们还同意他们将可以对与他们的教学层次——在比较应用性的领域——有关的研究进行科研资助。我们同意帮助他们成立他们自己的董事会,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我们还同意设法为他们获得——但是这一点我们没有成功——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本身享有同样的宪法上的独立,这对我们的发展非常重要。还有,我们同意帮助州立学院不采用州财政厅的项目预算方法。最后我们在全世界有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州立学院之间建立了联合哲学博士学位的可能性,这给予他们学术上的认可,他们欢迎这种认可。

私立学院得到一个参与决策的机会。在过去,决策完全

通过协调机构的成员进行,私立学院并不参加,这还包括有关公立新校区地址的讨论。此外,规划资助州学费奖学金计划,这对私立院校比对公立院校给予的帮助更大。

社区学院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不再是中等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还被给予提供得到保证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首次。

加州大学保持了所谓它的“御宝”——哲学博士和硕士以上的其他高级学位和基础研究。

州立学院分配到五个新校区,大学分配到三个;社区学院,前景(后来事实上)看好。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没有经过任何学术研究,没有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检查人员所明确赠送的所有文献的有利条件,当时那种文献几乎没有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在没有这种文献的情况下工作。要是这种文献已经存在,我们搞规划的人也许不会知道这种文献确实存在。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文献确实存在,我不能肯定我们会阅读它;如果我们已经阅读过,我不能肯定我们能理解它;如果我们已经理解它,我不能肯定无论如何我们将会使用它,关于那个高质量文献就说这么多。

哲学的方向

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先见之明。关于这一点,我在哲学方面,想到把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作为一个向导。当时罗尔斯还没有发表《公平的理论》,否则我肯定也会想到他。杰弗

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人生而平等。”但是他也相信，正如在弗吉尼亚大学实践过的，应该给予该大学经过精心选择的学生不平等的待遇。杰弗逊的主张是，要使民主行得通。除其他事情以外，需要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全体大众，因为人民自己被赋予管理他们自己的权力。但是，他也相信，需要有最优秀的人才即“天才的贵族”(aristocracy of talent)为社会提供领导的技能，以及医师和律师等等的技能。罗尔斯的观点有点相同。罗尔斯说，在教育上不平等是“公正的”。假如，第一，所有年轻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显示他们的优秀才智。第二，一旦他们获得他们的特殊技能，这些技能对全体人口的处境最不利的成员是有利的。所以，我想我们要普遍入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为优秀留有余地。

我意识到的第二个哲学方向是和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关于“有用的知识”的重要性一致的——一切有用的知识，不仅仅最理论性的知识；一切有用的知识是值得尊重的；检验的不是知识的类型，而是知识的质量，不关心它的类型。^①我是在一个农民和手工艺工人的农业社区长大的，而且非常羡慕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在我看来，社区学院的价值不是他们所教的知识的水平，而是用他们教学的质量来衡量。对州立学院也是这样，对大学也是这样。大家都有重要的作用要发挥，重要的是他们要把作用发挥得好。这个方向也许使

^① 参见约翰·加德纳在所著《优秀：我们能平等也能优秀吗？》中的讨论。加德纳说，“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关于优秀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应用于每一种程度的能力和每一种在社会上可以接受的能力。”“优秀比能力含有更多意思。它含有在生活的每一方面争取最高标准的意思。我们需要一切形式的个人优秀——在每一种创造努力，在政治生活，在教育，在工业——总之，普遍地。”

我在一切层次的知识都有用而且绝对必需时,对要集中同样较高知识水平的每一所院校的期望有点感觉迟钝。

我想到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来自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我参考他的观点,无论全部是个人主义的经济,还是全部是控制的经济,都不是有效的。更好是在宏观层次实行有引导的经济,在微观层次由个人决定。在高等教育,我害怕个人主义的竞争将导致所有院校都寻求把它们自己均质化,具有作为研究型大学的相似的学术使命,尽管这样符合它们的学术抱负。其他职能对社会也很重要,包括普遍入学和中层高级技能的训练,这些职能将被忽视。因而我们实行在有引导的使命框架以内进行分权和竞争的思想;实行在一个“协议”内的“指导”,对在一个“计划”内的明细的方向和对在另一个极端的不加约束的自我利益。

第四个方向是高等教育机构自治的重要性——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董事会和教授,以及高等教育的所有其他部分强烈地共同主张的一个方向。但是自治并不是一种权利,自治必须不断地获得,而且通过负责的行为和对社会有效的服务去获得。我们宪法的作者之一麦迪逊(James Madison)特别支持在若干比较自治的院校之间分享权力的社会价值。我们将通过发展很适合州的需要的总体规划促进我们的自治。

以上四个哲学方向是标准的美国人的信念,虽然我们并没有直接地讨论这些信念,从结果来判断,它们是所有我们制订总体规划的人的共同信念。

此外,当我们回想我们的讨论时,在我们思想背后,是四大实际的需要:①我们必须为社会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不只是四个部分之间的一个协议。我们也必须关心以能够成功地

获得立法机关和人民的支持的方式满足整个州的社会需要的方法。②转过来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尽我们最大努力,满足在一个越来越平等主义的州的平等主义的人民的平等主义的愿望是极其重要的。那时就人口的来源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州。那意味着人人受高等教育。③下一个需要是我们必须帮助为社会培养受过高度训练的科学家、医师和律师,给予他们特殊的机会——在一个越来越以高知识和高技能为基础的社会的英才主义的需要。④第四是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我们必须满足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加州和全国的职业结构正在迅速地变化,在要求四年期和五年期学位的职业结构的许多上层,出现很多“介于两个层次之间”的职业。

我们的任务是以可能成功的方式,集合各种解决方法,同时开始对这四大需要做出反应。第一个需要联合影响所有的部分;第二个需要特别影响社区学院;第三个需要特别影响大学;第四个需要特别影响州立学院。这个协议旨在通过联合的努力满足所有四个需要。

小舞台上的扮演者

最后,对参与的人所扮角色的一点评论。我们是那么幸运,没有公共教育督察长罗伊·辛普森的同意,我们不能采取任何重大的步骤。罗伊并没有采取什么主动,但是他是一位政治家。除其他事情以外,他乐于看到他的教育委员会放弃

它历史上对州立学院的监督。

海尔布伦(Louis Heilbron),州教育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新成立的州立学院董事会主席。他一直觉得为了全州的人民,加州大学应该保持科研和最高层专业训练的“御宝”。所以他支持这种职能的分化。

杜姆克,州立学院院长们的首席代表。在他一些同事的巨大压力下,他们要他不搞协议,等着看他们是否能够通过政治手续取得正式的大学地位。他抵制了巨大的压力,包括他几位院长同事在一次漫长的汽车旅途中给他施加压力。那些院长想要把讨论只局限于取得大学地位,而且他们得到他们很多教授的支持。还有几位院长已经答应他们教授,他们将搞到大学地位。很多教授从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获得他们的哲学博士学位,而且指望在高等教育的这一部分任职。对他们来说,州立学院是受到挫折的个人期望的墓地。此外,杜姆克一直支持他所做的任何协议。

然后,麦克亨利教务长。他是大学在详细的协商中的主要代表,贡献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大学不可能有一位更加有技能和热心的代表。他的贡献是崇高的。

孔斯,西方学院院长和总体规划研究委员会主席。无论如何他从未建议这个过程特别应该致力于为私立院校服务,而且他在三个公立部分之间是完全公正的。斯坦福大学的副教务长沃特(Robert Wert)持相同的主张。他们两位在人际关系方面是非常擅长的。

还有布朗州长。他给我们鼓励并尊重我们试图做的事情。他知道,他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为高等教育的庞大扩张提供经费,特别是规划对普及高等教育做出了承诺。他以很

高的荣誉感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必须为新成立的州立学院董事会任命董事,而且任命了一些人才。正如他为大学董事会任命董事一样,他把总体规划看做他任内重大成就之一。

大量立法机关的领导成员,特别是下院的多纳霍(Dorothy Donahoe)和她的助理塞克斯顿(Keith Sexton),致力于支持这个规划。在参议员中,斯蒂恩(Walter Stiern)发挥了领导作用,正如米勒(George Miller)那样。

在协商过程中,坎皮恩(Howard A. Campion)和泰勒(Henry T. Tyler)出色地代表了社区学院;霍利(Thomas C. Holi)和布朗(Arthur D. Brown)分别任大学和州立学院的联合办事处成员。

所有这些人必须具有政治家风度,他们都具备这种风度。我的领域是劳资关系,我曾经被卷入劳资之间的很多争执。有些局外人有一种铁板一块的资方对铁板一块的劳方的观点,事情总是比这复杂得多。很多年以前我发现这种情况,所有各方都有分歧。在外表上看来好像是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是三个方面的讨价还价,因为在每个单位内部,在工会内部,以及在资方内部都在进行讨价还价。当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失败时,通常是由于劳方内部或资方内部的讨价还价失败造成的。在总体规划,我们不仅有两方卷入,而是有六方卷入。^① 在每一方内部我们都有分歧,但是特别是在州立学院内部分歧较大。它们的领导人必须面对最大的内部分歧,因而有最大的责任把他们争论的观点统一起来。在我们最高领导层中,代表州立学院,在他们所代表的人的强大的压

^① 州长办公室、立法机关、私立院校、州立学院、社区学院和大学。

力下,站得住脚并做出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事情的人,是辛普森、布莱尔、海布伦和杜姆克。他们最值得尊敬。

总的来说,总体规划到最后一刻统一起来,是人际关系中令人惊奇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个奇迹。它并非自然力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和来自自然力的自动的后果,只是因为有一批人在特定的情况下走到一起,起来应付紧急的局面,才制订出来。

无论如何,我们在市场的尘埃、泥土和混乱中用很多汗,一点儿血和偶尔流点泪所做的事情,有幸在三十年后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得到好的结论,而且现在还有幸得到三位智者以他们作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检查团的角色,以这样热烈的方式提出主要支持的分析。

加利福尼亚在全国有把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放在一起的较好的系统之一,为什么这应该是正确的,过去一个半世纪来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在那个短时期内,所有这种压力都出现,使我们有可能构成总体规划。这个规划旨在解决那个时候和那个地点的问题,但是它现在已经持续了三十年,它甚至可以对其他地方含有某些教训。因为在工业化世界,五个中心问题面对高等教育:①如何满足平等主义的需要;②如何满足英才主义的需要;③哪些院校应该用来满足那些需要;④是依靠一个规划,还是依靠“引导”,或者依靠个人主义的竞争;⑤多少应该由高等教育本身控制,多少由国家控制。1960年的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面临所有这些问题,并做出应付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的考验的决定。

正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这个总体规划是“调解人民党主义和英才主义的一个具有特色的尝试,”一次

联合“平等和优秀”的努力；通过“整合”人民党主义和英才主义的力量成为一个系统，“把逻辑加到历史上”。在那个时刻，我们的确抓住历史并且塑造历史，而不是被历史占领。在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是保罗的危险。回想起来，看来更像是集体良好判断的胜利。

附 录

《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摘要^①

总体规划的若干主要组成部分今天仍在塑造加利福尼亚的高等教育,其中共有九点:

(1) 规划规定在加利福尼亚普及高等教育,作为政府政策,为所有合格和有动机的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的某处指定一个地方。这项建议的核心是社区学院的开放入学任务,凡是能从教学受益的学生可以上社区学院,在显示令人满意的成绩以后,转学到一所四年制院校。

(2) 规划指定各部分不同的职能或宽阔的任务,每个部分必须力求优秀:

①加利福尼亚大学必须特别强调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公立高等教育中对法律的教学和对医学、牙科和兽医的研究生教学有惟一的管辖权。它在高等教育中对授予博士学位被给予惟一的权力,但能同意与州立学院联合授予博士学位。②州立学院以本科生教学和通过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教学作为它们的首要职能。尽管加利福尼亚大学是主要由州支持

^① 这个附录是应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请求提出的一个加利福尼亚的高等教育报告。见康德伦(Clive P. Condren):《为 21 世纪作准备》一书的摘录。

的学术研究机构,总体规划授权州立学院教授进行与学院的首要教学职能一致的科学研究。③初级学院——今天的“社区学院”——被允许提供到第十四年级水平为止但不超出十四年级水平的教学。它们必须提供为转学四年制院校的课程的教学,职业和技术教学,以及普通或自由艺术课程的教学。

(3) 规划建议并由立法机关建立一个法定的协调机构——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这个决定标志着不再进行以前通过联络委员会由各部分进行的自发的协调。

(4) 规划建议一个与州教育委员会分离的州立学院管理委员会——一个现在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董事会的委员会。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任期八年。

(5) 规划为大学和州立学院建立区别招生库(differential admission pools)。大学必须在加利福尼亚公立中学毕业生中最高的12.5%中挑选学生,而州立学院则必须从分数最高的约33.3%中招生。此外,规划为转学的学生规定了标准,要求中学毕业时还不合格进大学或州立学院的学生,必须在转学前主要完成学院前两年的课程。所有这些行动的设计在于改进系统的质量,因为系统的每一部分都代表一个严格的入学标准。

(6) 规划重申大学和州立学院必须对加州居民免收学费的原则。

(7) 规划由若干建议专用于加强初级学院和在全州扩大它们的覆盖面。

(8) 规划第一次把初级学院界定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虽然规划声称它们也必须是公共学校系统的一部分,以便继续得到联邦职业教育经费。

(9) 规划保证独立院校在新的协调机构有代表。此外,规划要求扩大刚开始的为合格的申请者所设的州奖学金计划(1959 - 1960 年接近 120 万美元)、生活费补助计划和研究生奖学金计划——所有建议都允许学生选择学校。最后,规划拒绝一个“超级委员会”或单独的委员会管理大学和州立学院,因为独立院校将留在协调系统之外。

第四编 知识的道德规范与 新的学术文化

引 言

抨击教授的不道德行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就写过,牛津的教授们经他们教授会的特准,如何“联合起来,大家互相纵容,每个人同意,假如他自己被允许玩忽职守,他的邻居就可以玩忽职守”。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年来,大部分教授甚至全然抛弃教学的假装”。一般说来,“学院和大学的纪律乃是为了院长们的安逸”。在官僚国家控制下并“由此失去尊严”的法国大学的教授,乃是“社会上最卑贱和最可轻视的人之一”。亚当·斯密赞成把教授安置在竞争的市场纪律之下,和家庭教师或私立赢利学校的教师一样。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前校长吕格(Walter Rugg)曾经写道:“教授享受有闲阶级的自由。他们所能支配的时间有多少实际上是独特的,至于他们应该如何使用时间,则不受具体规定的限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内部的道德标准”对负责任的工作尤其重要。吕格还说,适当的竞争压力也特别重要。

这种“内部的道德标准”已经受腐蚀了吗?要是这样,按

^① 怀特·吕格:《学术的精神气质》,第393—412页。

照亚当·斯密的方式,回答是否更多竞争的压力,或者像亚当·斯密所想的他在法国大学所看到的更多官僚的控制,或者恢复学术的道德标准呢?还是别的什么呢?

教授职务并非目前和在历史上受到批评的惟一职业。贝尔(Daniel Bell)曾经描写过遭到“私下的恶习”打击和特别受到“流行的享乐主义”冲击的“公德”的全面崩溃。^①

有时赞同“我的工作”而忽视“应负的”责任的“唯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的成员,已经进入大学教授行列,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自身利益和道德行为总是冲突的。特别是在各种关系反复出现,而且是持续一个时期发生的地方,像通常在学术生活的情境,行动合乎道德标准,常常确实“合算”^②。但是这种引诱可能并不总是足够了。在美国,学术职业的某些分子确实似乎被怂恿为了忠于职守和行为的诚实正直而丧失这个职业来之不易的一些荣誉,但是就得出结论说这个职业已不可挽回地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未免过早。自身利益还没有压倒知识的道德标准,诱惑是巨大的。知识不仅是权力,它也是金钱——而且从来不是这样既是权力又是金钱,而且大学教授超出所有其他群体拥有更多的知识。

大学教授中“60年代的一代”的某些成员,对他们来说,政治上的承诺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加入70年代的“唯我的一代”,影响教授的思想和行为。现在40%的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进入他们的思想能够成为达到政治变革的一个主要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纽约,1976年版。

② 参阅罗伯特·弗兰克在《理性中的激情》一书中的讨论。他争辩说,特别在这种情况下,“诚实”合算。

手段——或者有人这样认为。60年代的一代在教授中是少数,在很多学校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少数,但是在处于消极状态的海洋中,60年代的一代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少数——有时这个一代通过缺席处于支配地位。所以,从另外一个来源,传统的学术生活外部的思想正在影响着教授的行为。

当前高等教育正经受由于有来自这两个时代的成员而带来的影响。有“逃离教学”的和“不负公民责任”的,也有“追逐政治惩罚”的。旧时的学术道德标准,在指导不论哪一批人的行为方面都不起什么主要作用。一个后果就是那些忽视自己公民责任的人,把这些责任的较多部分留给那些把他们自己和“政治惩罚”联系起来的人:“地方志愿部队”撤退。

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至少我们在学术生活中正在部分地从传统的范式走向后现代的范式。在传统的范式,多数教授成员是作为他们生活中心的特定的学术团体的一部分,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在校园的公民责任。有一种普遍理解的学术道德标准,这是“内部指导的”(按照里斯曼的定义)全体教授的方向的一部分,这种道德标准在没有被自愿地遵守时,通过指导和个人压力得到强化。

目前在发展中的“新的学术文化”范式是不同的。这种范式对地方的学术团体以及在团体内的公民职责有较少的承诺。教授成员对校园外的经济机会或者对校园内的校园外的政治关系具有较多依恋。校园更多是对非学术目的的一个手段。在这种新的情境,控制行为的含蓄的合约和非正规的强制手段不那么有效了。他们可能越来越需要通过更加正规的行为准则,特别是通过独立的法庭加以强化——正如在社会的很多其他部门已经发生的那样,结果是较少地依靠规范,更

多地依靠法律和法庭。

这对于我是一个令人悲痛的发展,而且我认为,以实际上自动扭转的方式纠正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我终于相信,如果学术团体到了不会惩戒自己的程度,社会的其他机构将越来越多地参与一度是大学内部生活的事情,而且这在越来越多的程度上正在发生。

至少可以确信,一个新的行为范式正在和比较传统的范式竞争以得到教授的拥护。这种新的学术文化更加强调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以及感兴趣的事情,而较少强调学院和大学作为一个倾全力于促进知识增长的自治的共同的全面的福利。有更多的流浪者开发学术环境,学术共同体更加比过去的习惯那样分成竞争的领地,而且更少“地方志愿部队”教授成员。我认识到太容易留恋比较完美的过去,过去也不是尽善尽美。当时教授常常有他们自己个人的“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常常包括让他们独自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完全承认他们的晋升、增加工资、可用的设备,以及毋庸置疑的他们渴望的学校类型。

但是很清楚,即使在教授被授予永久职位以后,新的学术文化也并不那么集中在特定的校园。有更多的人效忠于校外的机构和人士,效忠于为科研提供资金的机构,效忠于校外提供咨询机会的雇用者,效忠于全国通过计算机和传真机进行直接接触的朋友。对有些教授来说,母校是一个多元的人格。在地方,配偶有他或她自己的职业,各种兴趣和朋友圈子。在校园里,有更多以种族、人种地位和性别定界限的部落。有些领域,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更多地根据意识形态和所喜欢的方法论分崩离析——按照我的思想方法,更少地根

据了解复杂的和变化中的现实的共同愿望团结合作。

在全国很多校园,有些教授不那么愿意在各种委员会供职,或者接受其他职责,因为它们花费时间并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外,还要卷入不愉快的“激烈的争论”。共同管理遭受损失。有些教授——在我的印象中只是少数,但是人数在增加——只是根据他们直接的自身利益或者对他们的政治承诺的帮助来想像正当的行为。原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来是伯尔尼大学校长的吕格曾把他的“同事”作为写作题材,他们相信“在大学事情中,并没有行为准则这种东西,一切只是特定团体的利益的事情”^①。

对于这些运动的方向,学术机构至少自己已经增加了以下两件事:它们的报酬结构对出版的科研成果和外界的赏识比对教学和对内部管理的贡献给予更多的荣誉;还有,越来越多的内部管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接过去,从而降低了大学是一个自治的共同体意识。

学术团体也许是所有专业团体中最容忍和最“开放”的,因而它也潜在地最易受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所说“开放社会的自我毒害”,不愿“有效地防御内部的敌人”,在“彻底革命”的名义下可被瓦解。^② 开放社会面临如何“不使用否认它自己的本质的手段”保护自己的进退两难困境。这种优柔寡断的结果可能是“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他建议开放社会必须能够“保卫自己”,否则开放只能成为“疾病和虚弱”。

^① 怀特·吕格:《学术的精神气质》,第405页。

^② 科拉科夫斯基:《现代性受到无休止的考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我并不认为,在美国高等教育,我们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是至少有重要的迹象,我们也许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我们应该当心。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制拥护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写道,“要是人是天使,将不会需要政府”。同样,要是教授是天使,将不会需要道德规则。

我要强调贝拉(Robert Bellah)和同事们的警告,“没有市民的友谊,一个城市将分崩离析,陷入无法通过公众团结一致进行调解的敌对利益集团的斗争”^①——大学校园也是这样。

大学校园是一个独特类型的场所。它在不平常的程度上依靠个人对行为的特别喜爱。它一般具有有效的立法过程,较少有效的行政过程,实际上没有有效的司法过程。所有行会式的组织都是如此。当规范众所周知,而且几乎普遍得到尊重时,这种协议就很起作用。当规范较少得到同意和遵守时,协议起的作用就不那么好。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因此,有一些可以界定,精炼和应用这种规范的司法过程,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件事能够由校园在内部做,或者正如已经明显的,将由外部机构——法庭和立法机关来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做得那么好。我的偏爱很清楚是更多的内部“团结”,虽然我认识到有诉诸外部权力的论据,理由是通过摆脱制造分裂的问题,对校园更有好处。但是我注意到,在美国,由于采用一种内部的“劳资法律制度”,通过由有关各方选

^① 罗伯特·贝拉、威廉·沙利文、安·斯威德勒、斯蒂文·蒂普顿:《心情的习惯: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承诺》,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出的独立的人士进行公正的仲裁,劳资关系领域极大地得到推进。

以下的讨论将从道德的观点集中在智力生活的处理。但是,还有另一个处理的角度:在经济上什么处理方法使人得益?有教益的是注意到,两个具有确立时间最长的行为准则和最积极的执行机制的专业是医学专业和法律专业。这两个专业在历史上很清楚地从对它们的成员的行为的正直的高度信任在经济上得到好处,而当这种信任受腐蚀时受到损失;而且近来这种信任正被迅速地腐蚀。学术专业,包括它的科学家们,现在也面临怀疑正直的经济后果的幽灵。^① 出纳员正和传道士并肩行进。

在历史上,高等教育多半受到来自校外的威胁,特别是它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同时,高等教育已经被引导到抵御外部的人侵。现在更大的威胁也许来自内部,而高等教育并未被那么多引导到内部的反省。同时,外部社会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给予更多财力上的支持。为了使这些财力可以得到,社会正在响应经济上对更多的技能和更好的技术知识的需要,以及国家组织为大量个人提供更多教育机会的愿望。确实,另一方面,有时社会已经把高等教育逼得太猛和太紧,以致不能应答这些需要,但是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在优先考虑的事项的名单上位置那么高。

为什么现在威胁更多是内部的呢?这不止是由于两个新的世代进入教授行列——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结果。

^① 一次令人感兴趣的讨论。参阅马修斯:《职业道德经济学:职业应该更像企业吗?》,《经济学杂志》101卷第407期(1991年7月)。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更大和更满怀自信的部分——更少地依赖教会和富豪统治集团个人的馈赠。它已经更多地生活在一个温室环境,得到永久职位和自治的保护,抵御风雨。它已经变得更加向内看,并致力于它的很多专业,这些专业组成各自分离的世界,较少和周围社会接触。它已经变得更加国际化,而且有时轻视地方的问题和事物,与支持它的真正公众失去联系。在美国,为人民服务的赠地理想——“校园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已经凋谢,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嘲笑的来源。但是,长远的现实是,具有对高等教育的资源、自由和自治的裁判权的是公众。现实也是,在历史上,大学生存下来甚至兴旺发达,它并没有自我毁灭,它已经适应现实。

我想表明,按照内部的学术争辩,在历史上我认为我们站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大的争辩是关于真理是来自《圣经》还是来自科学——现在科学已经赢得多数席位。第二次是关于所喜欢的社会形态,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式对资本主义的模式,在左、右和中之间。这次争辩仍在进行,中和左占上风。第三次,又是最当前的争议是关于学术团体本身的组成和行为,关于招生,关于教授的状况,关于普通教育课程,关于行为准则和行为的实际。第一次争辩是关于宇宙的观点;第二次过去是,现在也是关于好社会的概念;第三次是更加向内看,关于我们想永久保持或创造的校园种类。这第三次历史性争辩的结果还很说不准。

第九章 学术道德和教授职位—— 一个“瓦解中的职业”？^①

这篇论文曾发表在爱德华·希尔斯主编的《密涅瓦》杂志上。长时期来希尔斯对学术道德很感兴趣。我的副标题——一个“瓦解中的职业”——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最有名的大学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②的一篇著名论文。但是，问号不是他的而是我的。

道德行为，按照一个好的准则或者一套“规范”，应该被看做任何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形式，对于它的行动的质量也是必不可少的。^③

除准则以外，需要一个适当独立的司法制度——除保护教授以外，还有一个保护准则的目的。

我们如何可以最好地维持一个最有助于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的环境呢？^④

① 本章原来以《学术道德和大学教师：一个瓦解中的职业？》为题，载《密涅瓦》27卷1—2期。

② 阿什比：《学术职业的希波克拉底宣誓》，《密涅瓦》7卷1—2期。

③ 参见约翰·柯尔曼在所著《规范作为社会资本》一文中的讨论，载拉德威茨基和宾霍尔兹主编：《经济帝国主义——应用于经济领域以外的经济研究方法》，纽约，1986年版。

④ 有关同样这些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讨论，特别注意哈佛大学，参见德里克·博克：《1988—1989年度校长报告》，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虽然这里我为赞成为教授制订一个行为准则而辩论,我同样愿意为赞成为学术行政人员制订一个准则而辩论,虽然他们通常比教授个人受到教授和受托管理人以及新闻界更加直接的监督。

我探讨学术道德这个话题,不像一个学者凭公认的学说,更多的作为一个参加者和观察员,他必须凭个人对优良实践的洞察力,在论战中主要根据特定的情况获得成功。

我曾经为大学教师对处理道德问题似乎那么勉强感到惊异。当我是伯克莱的一个年轻教师时,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对道德的学术研究有着一种如同贵格会教徒一样的关切,要我约请伯克莱教师中有影响的成员特别是科学家和他一起交谈这个问题。他们对他很有礼貌,但是后来对我没有礼貌。他们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对任何种类的科学家或学者能感任何兴趣的题目,而且我应该懂得这一点,有关道德的讨论最好留给教会。道德只是一个个人情趣和任何放得进情趣事情的问题——有一个极端重要的例外——对学术界科学真理的承诺。

若干年以后,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我要求教授委员会制订一个学术行为准则,当时在学术人员中有若干有关不道德行为的实际问题。委员会非常认真地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份草稿在教授大会上在一次激烈的演说以后被否决了,大意是教授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根据事实

本身就是道德的,并不需要准则,制订准则的尝试是一种侮辱。^①我想起詹姆斯的评论,“教士永远不改造自新”。但是,把专业学者有关一般道德和有关医学、法律和企业的特殊道德的大量文献,和有关学术道德的少量的文献相比,我仍旧感到惊异。为什么专业学者也不研究他们自己的学术道德?实际上,我也发现仅仅假定“那些在高等教育的人们从事上帝的工作,总是具有献身精神,心地纯洁”,这是不够的。^②

回顾自己作为学术生活的一个长期参加者和观察者,我如何评价学术界的道德体系呢?什么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些道德问题?我遵循了什么原则呢?我遵循我的原则产生了什么问题?我遵循我自己的原则是否正确呢?

道德规范的领域

我至少过过两种生活,一种是在劳资关系领域,一种是在大学校园。当我为了担任伯克莱的校长职务而主要地留下劳资关系的学习和实践时,朋友和同事们总是对我说,我走出劳

① 我的后任校长卡尔斯·希契,在董事们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很多件有争议的事件之后,的确得到教授的支持后,制定了一个“维护大学及其学术专业完整性”的政策(参见《大学公报》第19期和第23期)。这个政策对大学董事会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新近(1989)伯克莱的学术评论会有关为解雇终身教授的目的而规定的“严重的无能”定义的决议草案,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拒绝,理由是这是不必要的。但是,这个问题目前(1991)在重新研究。

② 哈罗德·埃纳森:《校长职位的道德责任》,载《教育记录》第65期,第24—26页。

资关系的“丛林”，一定感到宽慰。我回答说我现在只是走进真正的丛林。

我的意思是，应用于学术生活的道德标准，在我看来，至少在三个方面和劳资关系中的道德标准不同——而且有好的理由。^① 在劳资关系中，冲突的各方严格认真地遵守他们的协议。刘易斯(John L. Lewis)会派一些他的工会成员进矿井，而驱逐用静坐来破坏协议的其他工会成员。在大学，并没有长期有约束力的协议——只有易受变化的当前的职位。有那么多校长，包括我自己，曾经被遗弃作为这种变化的牺牲者。很可能是背叛信任，这伤痛最厉害。而且，在劳资关系中，一个人决不(几乎决不)试图消灭他的对手，更确切地说，他体谅对手处境的困难。在大学，有些冲突被看做个人的事情，没有手段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而且有时冲突被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甚至人死了冲突还继续。一个理由也许就是前加利福尼亚议会议长昂儒(Jesse Unruh)所提出的，他说：“学术的政治是那么邪恶，因为利害关系是那么小。”最后，在劳资关系中，在作出决策时更加可能把非常宽阔的背景牢记在心，然而在大学，有些想法例如注意公众反应，被看做是“非学术性的”，因此不予考虑。

稍后我将回到为什么劳资关系中的“道德领域”也许不同于学术界的道德领域的问题(参见第十一章)，正如人类行为

^① 马克斯·韦伯分清“最终目的道德”和“责任道德”。用他的术语，我所关切的道德归入责任道德。参见格思和米尔斯译、编并作序：《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和《政治作为一个职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

的其他领域可能响应不同的主要原则^① 而具有一套不同的具体规则。

社会的任何部门为了有效地运行,内部必须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标准,尽管这些标准有所不同,包括知识的标准。一个深受接受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得到信任的共同体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个得到信任的共同体本质上就比一个没有得到信任的共同体更加有效。比较少和不那么具体的正式法律或规则或契约是必需的。较少诉讼是可能的。不断地检验行为较少必要。一个得到信任的共同体对别人的行为依赖一系列满怀信心的期待。人类必须相互合作,人类的关系,如果比较多地听任含蓄的理解,较少地听任明细清楚的契约,一般相处的更好。

这种行为的规则可以称做“衍生的道德”——从效益的要求衍生出来。这种规则试图提出每个人对别人的行为应该指望什么,每个人作为报答,为了使比较长期的关系更加有效,在对待别人的行为中还欠着什么。这里我们所关切的是最切合社会的学术部门的一套规则。

^① 丹尼尔·贝尔在所著《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纽约:Basic Books, 1976)一书中,把经济所根据的中心原则“效率”和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政治组织的中心原则,以及建立在“自我满足”基础上的文化的中心原则进行对比。从效率,引出如阻碍生产率的工作规则的“不道德的行为”和限制产出的垄断的“不道德的行为”的微观道德;从平等,引出法律面前平等和一人一票的“正确性”;从自我满足,引出在满足自己的过程中伤害别人的“谬误性”。也参见米切尔·沃尔泽在《正义的领域》一书中的讨论。

知识的道德规范

学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科研发现知识和通过教学传播知识。^① 一些道德规则是在知识的创造和分布中所固有的。这些道德原则是在知识领域指导有关行为的判断的规则,这些原则在法律所要求的范围之外对行动设定道德的界限。^②

知识的伦理学有若干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是适合于有效的知识进步,和适合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中,以及学者在他们和其他学者的关系中的真诚的行为规则。据我所理解,

① 知识当然必须是以社会需要为基础的一切“真正的善”之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有道德的事。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性期望求和”。对凯恩斯来说,“道德的善”特别包括“知识”和“良好的个人品德表现”。参见哈莫达和史密斯主编《五十年后的凯恩斯和公共政策》一书中斯基德尔斯斯基著《凯恩斯的政治遗产》一文。凯恩斯同意康德,一个理性的道德理论是可能的,道德的考虑并不在理性的讨论之外。他相信,“真理”为政策的形成和行动创造了一个理性的基础,而且是理智的沟通和努力的先决条件;令人喜欢的真理具有理性的基础;而且真理是一个绝对。但是,他看到一个世界,或然性比必然性更加显著——真理本身是或然的。参见菲茨吉本斯《凯恩斯的远见》一书,特别是第三章和第九章中的讨论。

② 道德准则已经更加正式地界定为“道德、实践或行为的准则,是由或者为一个具有共同目的个人或组织的群体,为改进这个群体及其所服务的社会内部的发展成长状况所提供的行为和公共服务功能而制订的一套成文的原则、方针或规则”。见林德和乌尔伯格:《职业的道德准则正获得法律的力量吗?》。

它们宣告下列行动必须履行：^①

(1) 仔细地收集和使用证据,包括在进行“弄虚作假”^②的过程中寻找“不方便的事实”。

(2) 仔细地使用他人的思想和著作。

(3) 对于未经充分证明的事情应持怀疑态度。

(4) 虚心对待可供选择的解释。这种态度要求充分的自由表达;这种“学术自由”转过来要求容忍除自己的观点以外的其他观点。

^① 其他确切的表达,特别参阅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学院课程的使命》第13章;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和道德发展》;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声明:《原则宣言》(1915),《学生的权利和自由》(1967),和《职业道德》(1984);威廉·鲍恩:《永远是教师》;阿什比:《学术职业的希波克拉底宣誓》,《密涅瓦》7卷1—2期。并参阅《心理学家的道德标准》,载《美国心理学家》第18期;《应用人类学学会的道德声明》,载《人事组织》;塞得尔·布朗:《统计学家和他的良心》,载《美国统计学家》第6期;威廉·弗里曼《讨论》,载《美国统计学家》第6期。并参阅约翰·库尔特吉《道德和职业作风》第10章。主要和学生的道德实践有关的一系列建议,见莱文为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起草的报告《高等教育中丰富的实践》和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异议和破坏》一书中的《大学成员的权利和责任法案》一文。但是,我发现最有用的一篇讨论文章是希尔斯首次在《密涅瓦》20(1982年春夏季):105—208发表的《学术道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在科学领域,新近的一个声明,见科学行为委员会《当一个科学家》(华盛顿:国家学术出版社,1989)。关于职业道德的回顾和评价,见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科学和工程学会中的职业道德活动》(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980);报告的结论说,“对于职业道德事宜很少注意,而且仅有很少资源”。并见众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的报告《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和冲突》,(1990年9月10日),除了别的以外,报告结论说,①“大学不愿发现它们自己的教授犯故意的行为不端罪”;②“需要法规和规则。”沃尔特·吕格在《密涅瓦》24卷4期发表的《学术的精神气质》一文中对如何从他所谓既控制自己的投入又控制自己的产出,而且得到永久职位保障的“闲暇阶级”,获得最佳成绩,进行了令人感兴趣的讨论。

^② 参阅马克斯·韦伯在《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一书《科学作为一个职业》一文中的讨论。并参阅马丁·特罗:《来自内部的威胁:学术自由和否定的证据》,和卡尔·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纽约,1939年版。

- (5) 谈话有礼貌,依靠说服而不是依靠压制。
- (6) 公开在大学内进行科研的成果。
- (7) 在评价别人的学术绩效时仅凭学术价值。
- (8) 在处理人和动物时小心体谅,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过分伤害他们。
- (9) 除非决策中的全部考虑已经成为研究的问题;除非已经不仅考虑行动,而且还考虑可能的反应,要避免逗引和提出政策的运用。学者们不应超出他们的知识。
- (10) 把建立在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人评价和与提出证据和分析分开。而且,作为必然的结果,任何个人评价要直截了当。
- (11) 遵循罗尔斯(John Rawls)所界定的,而且应用于除学术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的“公正分担”的一般原则,“每当一个人已经自愿接受一个假如是公平和公正的机构所提供的计划的好处,或者已经利用它所提供的机会以促进他的利益时,他有义务按照这个机构的规则所指定的职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做我们所公平分担的事情,我们不应从别人的合作努力中获得东西”。^①
- (12) 拒绝利用可以得到的创造和传布知识的地位和方便,来促进无关的个人金钱或政治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念。
- (13) 完全接受对学生的义务,忠诚地教育他们,仔细地指导他们,公正地评价他们,并且无论如何不剥削他们。
- (14) 完全接受对学术同事的义务,帮助他们,指导他们的学术研究,特别要帮助年轻同事。

^① 约翰·罗尔斯:《公正的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43页。

(15) 在系科,完全接受义务,在同事中就年龄、学科专业和分析方法寻求合理的平衡。

学术上的道德规范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教学。学术上的道德规范,如果不应用于组成学术生活的全部活动,属于轻视意义上的“学术性”。

组成学术上的道德规范的义务的正确性和贴切性,甚至具有更加宽阔的应用性。例如,“在我们抵制狂热者、空谈理论的人、抱偏见的人和蛊惑民心的政客可怕的必然性和冷酷无情的简单化的时候,尊重证据和相反的意见,乃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的心理品质。”^①

在实践中的知识的道德规范

在我的经验里,在科研中,学术道德虽然有个别人违反,一般是得到很好地遵守的,甚至是特别好地遵守的。偶然证据有被捏造的、歪曲的或误传的,分析有时是有错误的,利用他人的思想偶然发生。但是,一般地说,制衡制度处理了这些错误。有很多不讲道德的野心勃勃的学者热衷于伪造证据,并在很多出版物中提出这些证据以达到获取荣誉的目的。但是他们通常都被抓住并丧失名誉。尽管有些偏差的事例,照我看来,在科研中,诚实地探求真理是被极大多数从事科研的学者非常认真地遵守的。而且无论如何,伪造证据是受到警

^① 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和道德发展》,第23页。

惕和批评的。

然而,科研的有些方面有理由令人忧虑。太多科研的进行,主要由于有充裕可用的科研经费,而不是为了科研在理智上的挑战性。特定问题选择,因为可以从各基金会得到经费,而联邦政府——通常和这些资助机构的判断一样好——可能把科研的方向转到例如国防或私人保健上来。实际上,有些科学家在把他们的科研成果在科学刊物发表,向希望学习它们的人公开以前,首先把它们“卖”给他们担任顾问或在委员会供职的商行。有些学者,像在我自己的经济学领域,仅仅使用容易的统计方法,而不去寻找翔实的证据,部分原因是科研成果能够发表得更多些和更快些。太多的社会科学家太快地从现实中提取的模型跳到真实世界的政策陈述。

在教学中,甚至比在科研中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教学较少受到科学和学术团体的仔细检查。一位教室里的教师,比已经在杂志上发表科研成果的科学家,较少地受到他的同事的挑战。但是,学生一般对证据的滥用和努力灌输一种观点比较警觉。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够阅读提出其他观点的著作,而且他们常常修习同一学科中一门以上课程。基本上,即使教学并不受到很多外部的检查,而且甚至虽然具有最高的质量,通常并未得到适当的酬劳,我对教学的质量和公平性有着极深的印象。教学是一样的好,多半因为大学教师对他们的学科感兴趣,不喜欢他们付出的任何努力失败,而且具有一种充分发展的“精雕细刻的本能”。

但是,近来学术职业比过去多了很多政治化,而且在课堂里显出来。有些教师传播他们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爱好而不承认这种事情本身。至少,大学教师应该公正地提出事实,并提

出彼此竞争的可供选择的分析体系,而且他们应该把他们的
评价观点和他们从分析经验性的证据引出的结论区分开
来。^① 大学校园的政治化也已经导致很多否定来自校外的很
多演说家的自由演说的事件和一些在大学以内强迫教师
的事件。^②

现在一种比较寂静的强迫方式发生在很多班级里,教师
避免敏感的题目;这种题目在学者之间的讨论中也常常被避
免,那里引起争论的题目可以引发政治谩骂,因而倾向于避
免。谨慎和缄默已经变得平常,因为害怕引起刻毒的反应
——校园里一个“沉默的春天”。

修习知识的道德规范,在它们变得这么受到校外金钱的
诱使和校内受到政治的侵入以前,情况比较好。现在腐败与
其说是像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和辛克莱(Upton Sinclair)曾
经指控的外部的受托管理人的权力,不如说是为一个人的科
研和为他自己获得金钱,或者提出一个人自己的政治观点的
内部欲望。

① 参见朗西曼在所著《一篇有关社会理论的论文》第一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第340页的讨论。

② 爱得华得·米香在《一些关于大学改革的持异端者的思想》(载32卷3期,1969年3月,第3—15页)一文中说:“今天,大学作为一个脱离世界事务的避难所,或者作为一个有理性的辩论和带偏见的探究的论坛的理念,具有一种显然留恋过去的情味。确实,由于不断增加的学生偏执的倾向,在英国,大学已经成为言论自由和公开辩论不再能保证的很少地方之一!”并参阅马丁·特罗:《论一个委员会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姿态:董事会和开放校园》(为1988年3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得到大学和学院管理委员会协会赞助的“委员会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中的作用”全国会议写的论文)。伦敦大学经济和政治学院院长帕特尔博士在1986—1987年度学院工作报告中说,“应该毫无疑问,如果必要,学院打算在那些被授权帮助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士的协助下,积极地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成绩的问题

在科研和教学中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在教师和学生的选拔和晋升中应用成绩,而且只应用成绩。对妇女和不同种族群体的成员来说,成功地进入大学教学人员行列,一直来比他们应该做到的更加困难。(关于这一点,现在正在被部分地纠正的过程中——多半通过联邦政府和法院的外部要求)

种族和性别偏见,过去和现在都不单独是惟一的问题。成绩的测量也有毛病。在学生选拔方面,标准测验是入学考试以前的等第和分数,但是这两种成绩合起来,只有 60% 能够对后来的成就提供有效的预测。在教师的任命和晋升中,年轻教师的评价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或很少有著作和教学经验。

即使意图最好,成绩难以界定,也不易估价。这是为什么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教师的晋升中至少有半数(也许多至四分之三)的教师以资历取代成绩的一个理由。鉴于极少合适的绩效,又缺乏明显的高绩效的证据,至少全体教师的一半(多半在研究型大学和优秀的文理学院以外)只根据资历晋升。在工业中,有些情况,像在一个装配线,或者绩效很难测量的地方,工人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力量影响他或她的绩效的质量,使用资历决定谁能晋升也许被认为并非“不公平”。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偏见和个人偏爱,在高等教育也是这样。

尝试在例如招生工作中预先估价学生成绩的一个可供选

择的方法,是先接受所有的申请,然后录取多数申请者,并开除那些已经录取而成绩差的学生。一个比较积极的方法是发现和鼓励那些具有特殊成绩,特别是那些迄今被忽视的群体申请入学,甚至在这以前给他们准备满足高的人学要求,并向他们保证适当的财政资助。这个比较积极的方法,在一个对机会均等作出承诺的社会是更合乎道德的,但是也是较少这样做的。

目前我们还远离每个学生和教师“由于他自己的才能而成功”的境界。

学术生活的学术成绩应该永远被非学术性的考虑推到一边吗?当我担任伯克莱加州大学校长时,一家地方报纸报道说一个学生在校外喝醉已被拘留,于是他被停学了。这种惩罚在伯克莱已实行好久。我推翻了这种惩罚,理由是这超出我们正当的加强学术行为的义务。而且,惩罚那些学生,仅仅因为他们的被拘留消息碰巧被一位学监在一张地方报纸看到,这不是公平的。这位学生的学监大发雷霆,他指责我宽恕不道德行为。

另一个事例,有一个参加当时义务后备军官训练课程的学生,由于穿着军装在哨兵线上抗议强迫军事训练,他只得到F等,本来他可以得到A等。我请军事科学系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该系把我的请求上诉学术评议会,评议会支持系的决定,理由是分数评定是教学人员的责任,校长无权干预。

作为第三个实例,学术人员中有一个成员凭一件非常清楚的成就获得一次不平常的晋升。他还曾经在越南战争中参与拦住一列部队火车。这在董事会成为一个非常引起争议的问题。我极力主张晋升,而且得到差不多一半的票数的支持。

这件事引起州长的注意,他也是董事会的成员。这件事结果成为最后一次机会(虽然由于这次争论,只是很小的一份),我不得不支持我所认为是一个学术道德规范的原则:除了诸如使用暴力或关于两性的不正当行为等学术外的工作与所涉及的人或其他人的学术行为有抵触以外,只有学术工作在学术进步中应予考虑。

学术职业的希波克拉底宣誓?

阿什比曾经提倡“学术职业的希波克拉底宣誓”^①,采用和宣誓相似的办法,很多大学毕业的医生,仍旧像自从公元前400年以来两千多年间他们那么多前人那样举行宣誓。他要求在他担心是一个“分裂中的职业”制定一个“公开宣称的职业实践准则”。这个阿什比准则将建立在“学问具有一种内在的正直”的信念基础上。他的准则将“不允许”学者“隐藏一些事实”;将不允许在“评价”学问时“考虑”种族或宗教或政党的照顾;对其他观点将强调“容忍”,并且将鼓励“传统的”和“不同意的观点”的教学。对阿什比坚持这样一个“准则”的必要性和他有关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真空”的观点,我和他联合在一起。

但是对于有一个准则和执行这个准则,存在一些问题。

^① 埃里克·阿什比:《希波克拉底宣誓》。阿什比首次在196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十次英联邦大学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建议这种宣誓。

首先,现在并没有这样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准则。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声明“职业道德”最接近。^① 希尔斯(Edward Shils)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尝试制订一个准则,^② 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接受这个准则,而且有一个准则可以很有争议。有一些人他们完全拒绝把学问作为学术事业的中心。例如,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曾经写道,“大学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职责”是“参加事实上的阶级斗争”。因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必须是破坏生产”^③。对他和其他相同思想的人来说,并没有建立在博学正直基础上的准则。因此,不但阶级斗争,而且两性之间(或内部)或者少数民族和种族内部的斗争都可能被一些人认为优先于学问。另外,要得到关于权利的声明比关于责任的声明已经容易得多,因为,正如威尔逊(James Q. Wilson)曾经说过,“权利是解放,义务是压迫”^④。

学术道德的进步,不仅遭受缺乏大家商定的准则的损失,而且遭受缺乏讨论这个题目的文献,尽管有些很有帮助的条款——我已经提到过几个。

如果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寻求成为“民族的良心”,正如它

①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政策文献。有关行政人员的道德准则,参阅美国社区和初级学院协会:《社区,技术和初级学院主要行政官员道德准则建议》,华盛顿,1991年版。

② 希尔斯:《学术道德》。

③ 理查德·莱温丁:《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学》,《新政治学》1卷第2—3期(1979—1980年秋冬季)。上文是希尔斯全部抛弃的他所谓“政治的首位”的明确陈述(希尔斯,《学术道德》)。并参阅里斯曼在所著《学术上的同事身份和教学》(Antioch Review 3卷第4期,1985年秋季)的评论,“近年来,特别是‘左’派已经倾向于坚决主张会议的破坏和对个人的非杀伤性袭击或对他们的威胁,是合法的表达性形式,因此是一种言语的形式”。

④ 威尔逊:《党派偏见,判断和学术道德》,《密涅瓦》21(1983年)。

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这样做了,那么,它们需要更加意识到如何表现出在促进这样一种作用。一种“任何事情都可以”的态度不够成为向导。

第十章 教师公民道德的衰退^①

关于学术道德规范,我最担心的是美国全国高等教育教师“公民道德”(citizenship)的衰退,而对遭受沉重打击的教学和科研中的契约性的义务的履行,较少担心。我说的良好的公民道德,意指①遵守学术道德准则;②愿意有效地参与共同的管理;③承诺保护学术机构不受政治破坏和暴力冲击;④注意不为经济上的利益利用学校或者学校设备的名誉。

我害怕。我们也许处在一个使人滑跤的斜坡上。起先,学术道德规范乃是一个理所当然地得到遵守的被普遍理解的准则的事情,是一个偶尔通过同辈的评论受到温和执行的含蓄的契约。稍后,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领导下,努力采用明确的行为准则,但是很少注意公正应用的方法。现在,趋势是对学术行为进行更多外部的调查,加大对更加明确的准则和更加有效执行方法的压力。刚冒出地平线的,可能是更多受到公众执行程度和由法庭决定的法律。对学术界来说,这可能是入夜前一次漫长的白天旅程。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旅程的哪里呢?我一般赞成较好的准则和较好的内部执行的方法。

^① 本章也摘自我的《学术道德和大学教师:一个“瓦解中的职业”》一文,载《密涅瓦》27卷1—2期(1989年夏秋季)。

我的方法的核心是,给予终身职位不仅在于保护学术自由,而且在于指望有效地履行公民的责任。

美国大学在所有其他美国公共机构中有非常特殊的学院管理模式。多数学院和大学的管理,全部学术活动都由教学人员分担,或者甚至委托给教学人员。这些活动包括全部课程和特定课程教学大纲的决定,科研项目的选择和进行,个别学生的接受,考试的记分,学位的授予,个别教师的任命和晋升,以及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术行政人员的任命和业绩的评价。只有学校物质设备(即场地和校舍),财政,法律事务和类似事宜多半属于分担的和授权的大学管理之外。这给予教学人员在教学、科研和服务以外巨大的责任。每一个学术人员都有义务对学校的福利贡献他或她的“公平份额”。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说过,每一个教学人员应该“接受为管理他的学校所分担的责任”。^①

在学术事务的处理中,重点是在咨询和尽极大的努力通过考虑所有的观点取得一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甚至很长的时间和耐心。结果在历史上我认为是非常好的。美国大学上升到世界上很高的地位,与分担的和授权的学术管理的兴起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大部分可归因于分担的和授权的学术管理。这是一个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在命令的基础上的制度。

但是,有关学术自治至少有三个问题。首先是和劳资关系的对比。在劳资关系中,道德行为包括履行你的协议,体谅你的对手和记住你的行动的广泛的结果。劳资关系中协商的

^① 美国大学教师协会:《职业道德》,载《美国大学教师协会政策文献和报告》,华盛顿,美国大学教师协会,1984年版,第134页。

目的是取得一系列决定,按照这些决定所有参加者能够有效地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共同生活和工作。可供选择的方法是不断的冲突——甚至混乱。协议必须达到而且履行。

在劳资关系中遵守的道德原则,有助于在公认的政策之下的稳定,这些道德原则相当于一个工业法学体系。如果这些原则没有被遵守,签订协议既是困难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在解决冲突的困难问题之外,又增加任何不必需的个人对抗的紧张关系,这是自拆台脚。而且必须在更大的全国和国际秩序的背景内是行得通的。

我曾经试图了解为什么学术生活并不同样地包含这些相同的原则,而且决定这和追求知识而不是和追求效率有关。追求知识意味着无论何时,每一件事都可以重新考虑,意见和意见的冲突具有很高的价值,甚至能够以强烈的个人承诺可接受地进行,事业的中心是个人,而不是以一个声音说话并能捆绑它的成员的集体。“团结一致”并非控制校园很大程度忠诚的价值观。高等教育有着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①运作的长久传统。

根据长期的经验,我深信劳资关系中的行为的道德规则对组织人的行为具有普遍的优势,但是这些道德规则对高等学校也并不是常见的。这是一个具有不同的内部逻辑的背景。学术行政工作者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的第二个困难是我们新一代大学教师的产物。(这也是新一代大学行政工作者的产物,有些行政工作者倾向于更多地支持他们自己的福利,较少地支持学校的福利。)在全

^① 科恩和马奇《领导与模糊性:美国大学校长》,纽约,1974年版,第3页。

美国,现在比过去更难使大学教师严肃认真地承担他们在系科和学院的任务。他们更加不愿在委员会供职,当他们承担委员会的工作时,更加不愿乐意地安排时间,而且更加不愿接受撰写良好的报告的任务。他们希望倾全力于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不是学校的事务。(这既是高等教育中“管理革命”的一个原因,又是管理革命的一个结果——更多具有更大影响的管理人。)然而,分担的和授权的学术自治的代价却是愿意承担学术自治所要求的相应的任务。现在,教授们普遍地对他们校园以外的世界和他们学科的发展更感兴趣,因而他们常常忽视他们的校园任务。这个问题超出大学的许多委员会,延伸到愿意指导和帮助年轻同事和帮助所有同事评论他们的手稿和教学大纲。

第三个困难是,反对为了个人的目的利用大学设备的规则,现在不再像从前那样被严格遵守,而且很少那样全部执行了。对于教学人员不应为了“任何与履行教学、科研、学术行政和公民品德的教师义务没有联系的目的”,特别不“为政治的目的”使用大学房屋的规定更少关心。^① 这个困难由政治问题侵入大学生活引起。教学人员几乎比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部分——公司、工会、教会,同其他部分一样,更加在内部按政治分裂。比较地说来,更多的大学学术人员会在政治上坐落在自由派和左派这一头,较少学术人员坐落在稳健派或保守派这一头。这个中间派比较地说是弱的(见表8)。

^① 希尔斯:《学术道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

表 8 大学教师和广大公众的政治方向

	中左(%)	中(%)	中右(%)	总计(%)
大学教师	41	28	31	100
广大公众	20	47	33	100

来源:《卡内基委员会全国调查,1975—1976》第二卷:《Faculty Marginals》(伯克莱: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1978,268);盖洛普民意测验:《民意 1972—1977》,第二卷,1976—1977(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978) 762—763。比较新近的民意研究表明普遍的向左转变。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教授的状况》(普林斯顿: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89)不是 41%报告他们自己是“中左”,而是 57%报告他们自己是“中间道路”偏左——大约 15 年一个大转变。不幸的是在两个研究中没有采用同一个术语。

大学教师按才能也比他们在别处相对应的人更加畅言无忌。另外,他们每天集中在一起,有辩论的机会,而且他们比较可能被他们的董事会煽动。大学的董事会在危机中倾向于变得比较保守,而学术人员则向左倾。在历史上教师一般习惯于反对大学以外的保守派,甚于反对校内的激进派,保护校内的左派甚于右派。他们反对外部的右派甚于反对他们自己内部的左派。还有,教授的群众大会更加可能吸引左派的教授,不是右派的教授,而且这种人的信念更加可能为激情所支配。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问题中的行为和学术问题的行为形

成对比。在学术事务中,在群众的压力下,教授能够很快地从协商和同意转变到接受政治舞台的提出“无商议余地的”要求和坚持即时反应的方法。他们能够,而且偶尔已经做到,从依靠说服转变到接受强迫,从清醒的良好的判断转变到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我引用两个实例。一个是有关发生在纽约大学的事件的叙述:

华盛顿广场的教授的一次特别大会在教育学院的礼堂召开。当大学的消息传出时,一群学生在礼堂门外集合,通过温德(Bayley Winder)院长,通知在开会的教授,说学生“要求让他们参加大会”。一个邀请他们参加大会的动议被否决。这个消息通知学生后,学生吵闹。行政助手们急急匆匆去看院长,院长以急迫的语气告诉教授,学生威胁,如果他们被拒绝参加大会,他们要砸烂会场。

经过短时间激昂的辩论以后,采用呼声表决法通过一个可以不管怎么解释的决定。院长宣布,将邀请一个学生会陈述他们的要求。因此三个学生走进来,一个黑人学生、两个白人学生,其中一个学生狂饮一罐啤酒。这个黑人学生戴着帽子,当他到达讲台时首先讲话。他转向教授们,指着他的帽子说:“我母亲告诉我,在室内戴着帽子是对在座的人们失礼。”然后,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发生了——三分之二在座的教授站起来,起立欢呼,向学生热烈鼓掌。^①

^① 胡克:《暂被搁置的学术道德:沃尔普吉斯纳赫特在纽约大学的回忆》,《密涅瓦》22卷;稍作修改后载胡克:《步调不一致:20世纪一个不平静的生活》,纽约,1987年版。

另一个实例来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次会议,在会上大约有六十位教授“用循环论证来辩论直到深夜”,到“一大群学生推进房间,排成一个半圆形面对教授”:

芒克(Walter Munk)说,这是发生在卡夫卡(Kafka)外的一个场面:愤怒的学生在房子的前面发出威胁,很多教授被恫吓。他们开始做手势,并发表充满革命热情的演讲,芒克想他们正在试图以虔诚的表情胜过学生。当学生鱼贯而出离开房间时,有一个学生要求在星期一投票时暂时停课。投票通过,只有芒克和舒尔茨(Sheldon Schulz)反对。^①

布洛姆(Alan Bloom)教授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少数学生发现,盘问颂扬学术自由的浮夸的教师们,轻轻推一下,他们成为跳舞的熊”^②。在60年代,这是确实的,但是相反,我的经验是他们更加像很聪明的骡子。

建议的行动

由于这些事件和观察,我对大学行政工作者和教授领袖有几点建议:①如果可能,避免有关政治问题的群众性讨论;

① 麦吉尔:《猴年:1968—1969年校园里造反》,纽约,McGraw-Hill,1982年版,第16页。

② 布洛姆:《美国思想的终结》,纽约,1987年版,第315页。

②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像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一个由教学人员选举产生的公认的委员会,定期开会,在紧急情况下,有权代表学术人员办事;③有一个易于利用的全体教授进行秘密投票的规定,作为群众性大会的替代或补充。这几条建议与严肃和耐心地考虑问题,避免被一下子卷入考虑不周的行动的一般学术行为是一致的。

无论何时,特别是在危机关头,既要有道德行为的准则,又要有良好工作方法的协议可以遵循,这一点很重要。预先有一些可以接受的解释“道德”行为的规定和在紧急情况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有关于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法的定义要容易些。如果道德准则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已经存在,合乎道德的解决方法就更可能出现。

据我看来,大体上,磋商和尝试取得同意,比追求政治目的时在压力之下的仓促决定,更加符合追求知识时的学术道德。做出有关政治事宜的决定的合乎道德的可以接受的方法是美国宪法的核心,但还不是多数大学章程的核心。

这种建议说来容易生效难。先前我曾提到要大学教授接受行为准则多么困难。艰难的司法决定更难做到。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动荡不安的年代,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没有一个教学人员委员会对学生和同事在政治抗议中的行为做出过多于最低限度惩罚的估价,而且不止在美国,尽管违反校规很普遍,很多学生“举止粗暴,没有因此受到指责或惩罚”^①。

有两个缺点:一是获得规定的困难;二是履行规定几乎不

^① 希尔斯:《处于紧张状态的学术道德》,《密涅瓦》13卷,第21页。

可能。有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有许多附带的影响,那就是工会的契约。这些契约提供一个获得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和通过第三者的仲裁履行规定的机制。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像有关保健的相当于法庭上玩忽职守的诉讼,这种办法将导致建立法律上的行为标准。还有,有些专业学院,特别是医学院,有常设的道德委员会。

有一些关于学生对教授工作的反应和教授对大学自治的贡献的评价的好的反馈的方法,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学术生活中同事之间的一般倾向是:第一,从相反的方向看明显的不良行为;第二,如果这种行为来到大学准司法机构前面,就寻找借口。^① 学术职业是一个自我宽容的职业(像所有其他职业一样),然而,幸而多数时间,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以高度合乎道德的方式运作。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原则宣言”说,“如果本职业本身证明不愿清洗无能和卑劣的队伍……这个任务肯定将由别人来完成”。以上的评论旨在对于所见到的道德上的失误(多数是在公民责任方面)说得具体一些,并建议补救行动,不同意那些从事全面谴责教授行为的人们。

现在,良好的公民道德比以前更需要了,因为,从1990年至2005年的15年间将有75%的教授被取代,代替者的质量和他们的融入学校生活,极大地视现有教授的公民品德的质量而定。

^① 戴维·加德纳,当时任犹他大学校长,后来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1971年他写道,“当职业标准已被公然违背时,学术职业一般表明它愿意惩戒它自己的成员”。见《教授对职业道德的责任》一文,《教育记录》52卷,4期。

一个“瓦解中的职业”？

学术职业真的像阿什比曾经提出的,在它的道德行为方面正在瓦解吗?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认为学术道德体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高等教育那么迅速地由宗教机构控制到由工商界控制。相反,我认为高等教育的确有一个机会,从1860年至1960年这一个时期,在高等教育的改进和实际应用方面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我曾经把学院和大学看做世界上最纯粹的合乎道德的机构。我遗憾地说,我已经观察到从大约1960年以来我所认为的部分的瓦解,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大学比另外一些领域和另外一些大学更加厉害一些。我特别关切的是在良好的公民道德领域,不是在科研和教学领域。

对高等教育瓦解分裂的更为全面的评价,要求对以上所讨论的某些发展,还有根本没有讨论过的一些发展,例如学院间的体育比赛,学生受到教师的性骚扰,秘密科研,系科被一种意识形态或方法论所主宰,学生无法归还贷款,学生偷窃图书馆书籍和考试作弊,教师记分太宽,研究生受到作为入门课程的低报酬教师的剥削等领域进行更加深刻的考察。^①

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大学和学院享受了它们历时很长的自治,部分地因为它们得到了人们的信赖,以合乎道德的方

^① 关于最后一点的讨论,见戴维·布鲁纳曼:《哲学博士的生产过程:系科行为研究》,伯克莱加州大学经济系哲学博士论文,1970年。

式管理它们自己,像在它们以前的教会一样(尽管它们有时抛弃真正的信念)。大学在历史上由于它们合乎道德的行为而享受它们的自治,而现在,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说,它们可能由于同样的理由正在丧失一些自治。除此之外,就内部来说,我们看到大学校园作为一个互相信任的共同体的一些腐蚀。例如,对个别教师在考试中所给的分数不再具有同样的信任,而且现在对正式的推荐信几乎没有信任。这些只是目前情况的两个迹象。

我遗憾地推断,事实上,学术职业也许在它的道德行为的某些方面正在缓慢地瓦解。同时我推断,正如医学和法学职业不应实行评价上的中立地位,学术界对它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也不应实行评价上的中立地位。

第五编 使命和目的： 众多的选择

引言

关于教育使命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们都支持集中主义的观点，即教育是从事于高知识的，而且仅仅是高知识。智者派论证说，教育也从事于有用的技能的教学——他们是最初的扩张主义者。

高等教育的评论家，追溯到过去长远的历史，可以大体上分成四种类型：

- (1) 现状维持主义者；
- (2) 进化扩张主义者，他们欢迎新的服务形式；
- (3) 集中主义者，他们要选择一个真正的使命，而且只追求一个使命(常常是过去历史上的使命)；
- (4) 改造主义者，他们要有意识地利用高等教育按照某一主要新的方向改革社会。

第一种类型——现状维持主义者——设想并坚持，现状将被继续而且应该被继续；现在存在的东西已经遇到时间的检验；现在是的东西，是正确的。这些评论家多数关心在短期内正在进行的事情，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继续做已经在做的事情。因此强调目前的结构和使命的延续。有时这些评论家为维持论证，他们更多是经常仅仅把维持作为他们的基本方向

——甚至不加审查。耶鲁大学的教授于 1828 年提出一个有关现状的论证周密的辩护。

但是,比较长远的观点,或者甚至不止正常改革时期的制高点来看,现状维持主义者很少变化或者没有变化的假设已经是错误的了,他们有关 20 世纪多数十年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假设肯定是错误的。

第二个类型——进化扩张主义者——设想,社会是变化的,而且随着新知识的产生,随着技能的增加,随着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应付前进中的文明的复杂情况,随着更多的人希望受到高等教育,教育在社会内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不断地有新的服务领域打开,高等教育应该对它们做出反应。在美国这曾经是赠地法案(Land Grant Act)的观点,佐克报告(Zook Report)的观点,鲍恩(Howard R. Bowen)的观点以及卡内基委员会的观点(见本书第十二章)。

我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进化扩张主义者的观点——就是高等教育通过科研、教学和服务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活以各种永远新颖的方式进化和民主改进的力量(见本书第十三章)。

第三个类型——集中主义者——寻求确定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理想主义的高等教育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高知识的增长,如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或者是一个宗教方向的发展,如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提出“伟大的演说”和“伟大的著作”,如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和布洛姆(Allan Bloom)和巴曾(Jacques Barzun);或者科研,如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或者发展高层次文职人员,如在儒家的中国——除了别的单独一个确实和排他的目标。这些

集中的提议者是一些伟大的英雄,他们相信高等教育应该保存它的精力,应该集中于它的本质核心的东西,应该避免成为一家廉价商店或者一个车辆不得入内,只限行人活动的商业区。

如果高等教育内部各部分之间职能分化的政策得到支持,进化扩张主义者和集中主义者的观点的对比就变得不很明显。于是可以证明应该有一种结合——而且这就是我自己的主张——把对学术上比较精英的部分持温和的集中主义立场(集中在新知识的发现和传播,有关人员的引进和晋升以及经费的分配的决定,以高业绩为根据),和对其他部分采取自由的扩张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这是一个重要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但是在美国,目前争论越来越成为全力以赴的扩张主义者和全力以赴的集中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后者大都争执什么事情不应该发生,前者或者争执事实上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或者争执什么事情应该发生。

第四种类型——改造主义者——深思熟虑地寻求利用教育(和高等教育)创造一个特殊的新社会,不管是卢梭的民族国家,还是杰弗逊和杜威的民主政体,还是马克思主义通过革命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扩张主义者)不同,因为它胸中有一个主要的,甚至革命的社会改造计划,而不是将以多元不同的方法改革社会的一系列根据实效进行选择的服务方式。这一种类型也和第三种类型(集中主义者)不同,因为它较少导向某一过去和现在的想像,更多导向创造一个事先指定的新的社会模式。

这些类型并不是很鲜明的,争论的结论在很远的将来——如果有的话。这四种方法的图解见图4。

		时间的观点	
		着眼于过去和现在	着眼于未来
哲学的 观点	一元理想主义的	集中主义者	改造主义者
	多元实用主义的	维持主义者	扩张主义者 ^(注1)

注1 包括对全部高等教育的扩张主义者但对部分的集中主义者。

图4 可供选择的高等教育目的的方向图解

高等教育可供选择的方法

现状维持主义者

1928年耶鲁报告:如果它(学院)要寻求一种非常不同于目前的文献所要求的方针;如果它要按照精通文学的人所不认可的规定授予荣誉,教授们没有什么可以期待赞成这种革新,但是他们将被看做教育中的空想家,不了解它的真正计划和目的,不适合他们的职位。最终的结果,不难预测。学院将不被公众信任,而且它的声誉将无可挽回地丧失。^①

^① 《1928年耶鲁报告》,载理查德·霍夫施塔姆和威尔逊·史密斯合编:《美国高等教育史文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进化的扩张主义者

1862年赠地法案:莫里尔法规定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归于至少(在每个州)一所学院的捐赠、资助和维持,最主要的目的将是,不排除其他科学和古典课程,而且包括军事战术、教学诸如与农业和机械技巧有关的学科分支……以便工业阶级在生活中的若干事务和职业促进普通教育和注重实践的教育。^①

佐克委员会:只要我们保持目前高等教育面向言语技能和智力兴趣的方向,我们将否定给很多年轻人的教育机会。很多年轻人具有不同种类的能力,而且他们在只承认一种可以教育的智力的学院和大学,不能受到“和他们的天赋能力相称的教育”。

如果必须教育大量美国青年,它们必须提供发展包括在学术倾向的能力以外的其他能力的教学计划,而且它们不能继续集中注意具有一类智力的学生,而忽视具有其他才能的青年。^②

洛克菲勒委员会: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由四个连锁的设计组成: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研究生学习和科研,以及公共服务。每一个设计对个人和广大社会都有它自己的必不可少的贡献。

我们相信,高等教育必须接受在智力方面约占最高25%的年轻人的教育作为头等大事……在我们将确定为大学潜在的优良生源的所有年轻人中占最高25%的年轻人中,现在只

^① 《美国法规大全》。

^② 《制定目标》,总统民主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第一卷,1947年。

有 40% 升学……高等教育必须把招收和教育我们年轻人中智力最高的 25% 年轻人的大部分作为首要的目标。^①

鲍恩：“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国家”意味着几件事：

(1) “所有得到学士学位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很好地受过教育的人。”

(2) “有一套为培养很好地受过教育的人所特意设计的课程。”

(3) “可以被称为很好地受过教育的人的特征。”

(4) “一个特定比例的人口可以被指望掌握的教育的深度。”^②

富尔报告：因此委员会所采取的态度含有一个辩证的方法，一方面，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善；另一方面，提出另外可供选择的方法。所以，委员会从两个方面标志着与两种方法不同：一是不同于仍被现有结构束缚的那些人的有局限性的方法，二是不同于那些梦想有某种激进的结构上的激变，使他们没有考虑现实性和可能性突然栽进未知的事物的人们。

由于这些理由，委员会首先强调两个基本思想：终身教育和学习的社会。^③

集中主义者

弗莱克斯纳：在最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细致地研究现

① 高等教育财政委员会：《高等教育的性质和需要》，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2 年版，第 15、48、49、51 页。

② 鲍恩：《国家的状况和高等教育的议事日程》，旧金山，1982 年版。

③ 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得加·富尔）：《学会生存：今天和明天的教育世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 年版。

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交界的现象,审美世界的现象以及考察关联中的事物的不停的斗争——我设想这些就是近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

……追踪科学和学问属于大学。另外还有什么属于大学呢?毫无疑问既不是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也不是群众教育。^①

布洛姆:大学的活动有一条简单的规律:它无需担心提供学生在民主社会可以得到的经验。他们无论如何将会有这些经验。它必须提供他们不能在社会上得到的经验。知识是目的;要求那些追求知识的人有能力和理性。^②

纽曼:大学是一个教授普遍知识的场所。这意指它的目的是,一方面,理智的,不是道德的;另一方面,这是知识的传播和推广,不是知识的进展。^③

赫钦斯:这篇论文把教育界定为有组织的,深思熟虑的试图帮助人们成为明智的人。论文坚持教育的目的不是人力(manpower)而是人的气质(manhood)。^④

巴曾:让我们回忆新大学已经放弃的领域:知识的统一性;教学的愿望和力量;对声称是知识,是一所大学,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基础科学家提出评价的权威和技能;最后,正当的学术意识——含有同样地拒绝商业的机会,工业的服务任务,社会福利的管理,以及贿赂、奉承,或任何追求私利的集团的

① 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第23、27、28页。

② 布洛姆:《美国思想的终结》,纽约,1987年版,第256、261页。

③ 纽曼:《大学的理想》,伦敦,1927年版。

④ 罗伯特·赫钦斯:《学习的社会》,纽约,1968年版,第51页。

命令的权力的意识。^①

改造主义者

杰弗逊:如果人的状况可能逐渐得到改善,正如我们天真地希望和相信的那样,教育必须是实现这一点的主要工具。^②

杜威: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教育的专门定义: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有一种教育,使每个人都有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的个人兴趣,都有能促进社会的变化而不致引起社会混乱的心理习惯。^③

马克思主义者:大学中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作用就是参加实际上的阶级斗争。^④

① 巴曾:《美国的大学》,纽约,1968年版,第238页。

② 杰弗逊致朱利安的信,1818年7月23日。见霍尼韦尔:《杰弗逊教育论著》,哈佛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第148页。

③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105页。

④ 理查德·莱温丁:《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学》。

第十一章 大学使命的重新审视

奥尔特加(Jose Ortega Gasset)除了很多其他书籍以外,写了一部《大学的使命》。这部书,一度曾和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以及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一起被看做“经典著作”。但是,奥尔特加的《大学的使命》越来越变成一部被遗忘的经典著作。然而,这部书近来正被重印而且要我为该书写一篇导言,正如早先我曾经为弗莱克斯纳那部书写导言一样。^①

大约四十年前,我突然被从我的劳动经济学的领域抓走,推进高等教育管理。我首次读了奥尔特加的著作,我想还是读当时这样确定的这部“经典著作”为好。奥尔特加给我的印象极不深刻。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有时他的东拉西扯的文风使我读不下去。现在,当我重读这部书时,比我初读时发现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也许,这部分地由于本科的课程问题再一次正在经历深入的争论。奥尔特加有关“使命”的远见,把这次争论放在比目前多数论证宽阔得多的背景之中。我现在发现《大学的使命》比四十年前和它成套的几部“经典著作”更

^① 克拉克·克尔:《短文——回忆弗莱克斯纳》,载《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型:1960—1980》,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加针对 21 世纪的课程讲话,而且这是为 2000 年和以后写的一部经典著作——后面我为这部书写的导言将说明为什么。

除了别的以外,这篇评论还把奥尔特加的大学的使命单放在更为宽广的一系列昨天和今天的竞争中的见解以内,指明它在这个更长的“购物单”中的地位。从而通过提出竞争中的答案和关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真正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永恒的问题联系起来。

这里我可以指出,对本科生除了高级的技能和一门“主科”(可能再加一门“副科”)以外,还有什么具有一般价值的东西应该教的问题,奥尔特加的解决方法,和我担任主席的两个委员会所采取的方法十分相容。^①在这两次讨论中,我们拒绝了对选科的惟一信赖,理由是教授应该根据他们比较多的经验给予学生一些指导,而且不经指导的学生选课通常导致课程杂拌,一无所得。我们也拒绝了“分类”要求(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的标准的解决方法,即每个学生必须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之中读一门概论课。学生在中学时会已经有过这种分类课程,和这些知识的巨流有一些接触。多数这种概论课,为打算在有关领域读主课的学生设计,对非主课学生并不适合。在规模大的学校,这些课程常常由助教任教。还有,各系倾向于互相提要求,以便为各系普通工作人员配备增加“相当于专任”的信誉。

在两次讨论中,我们赞同“西方文明”教学计划,但是不作

^①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大学课程的使命》,旧金山,1977年版。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克尔):《美国为其未来作准备:教育的全球观点》,纽约,1987年版。

为学生选择的惟一可供选择的课程,而且只有采用多学科的观点进行教学才行——记住对于中心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我们对芝加哥大学在他们吸引全美国能力最强的本科生的光荣的日子里高度发展的“概论课程”(survey courses)非常赞同。这些概论课程以宽阔的观点提出知识的巨流,而且不只是传统的分类要求的概论课;我们近年来所羡慕的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推行的具有高度结构的教学计划也是这样。

我们选择强调“宽阔的学习经验”。“教育中的全面观点”旨在提供一种这样的经验(其他例子将在下文举出);赫钦斯的“经典著作”(Great Books)计划可以看做另一可能性,阿默斯特(Amherst)和威斯康星(Wisconsin)的米克尔姜课程(Meiklejohn curriculum)也是这样。奥尔特加的“宏伟的思想”(great ideas)和哈佛的“核心课程”(core courses)是另外一些方法。意思是,除了基本技能和专门化以外,每个学生应该有一种“宽阔的学习经验”,这种经验鼓励在某一宽阔的领域的整体思考,和在一个狭窄的领域的深层的专门化知识一起进行,同时为作为决策者或者公民个人进行横向思维以及作为专家进行纵向思维提供一个机会。学生应该在这种可供选择的计划中给予选择的机会。教授们将能在同一组课程内的其他教师取得某种协调在他们专门化的领域进行教学——这和赫钦斯和米克尔姜的计划对参加的教授的全面的教学要求刚好相反。重点不仅放在内容本身,而且放在对学习的一种整体的方法。

以下是为奥尔特加的《大学的使命》一书写的导言的全文。

没有只有一种大学的只有一个使命这样的事情。过去从

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相反,有几个,甚至很多竞争中的使命,和几种,甚至很多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奥尔特加为西班牙式的大学提出四个使命。

我这么说,让我很快加一句话,奥尔特加有一个使命(四个使命中的一个)有理由要求很多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予以认真考虑,而且这个使命在未来美国应该比自从奥尔特加首次提出这个使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具有更大的兴趣。这个使命是对最值得所有学生知道的是什么知识这个问题,或者用比较通俗的术语,对什么应该是“自由教育”的内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所给的回答不是“伟大的著作”,不是“西方文明”,不是“世界文明”,不是“分类要求”,也不是“种族、两性和阶级本身”。照我看来,它是比这些回答的任何一个都要好的回答,而且我将在下面提出我对它的理解,并将试图把它应用到 21 世纪。

历史的背景

1930 年,奥尔特加在马德里大学所作的一系列讲演中提出了他的《大学的使命》。时间、地点和奥尔特加本人,对理解他的使命是重要的。

时间是在利维拉将军在西班牙的独裁统治的终结,以及新出现的民主的前景比当时包括作为新的国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奥尔特加在内的支持者所盼望和期待的生命令人悲痛地过短的时刻。

奥尔特加的六次演说是在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和赞助下进行的。他告诉他们为了使他们能够最充分地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且对国家的领导做出最大的贡献,他认为他们应该在课程中学习些什么。

奥尔特加把当时的西班牙大学看做“令人悲痛,没有活力,没有精神的东西”,但是强调“这个时刻充满机遇”。^① 然后他想,西班牙和她的公民以及她的组织机构正处于“一个辉煌的时代的黎明”,“展现的地平线……是壮丽的”,而且有着一个“彻底改革西班牙国家和大学的宏大的机会”。

这个时刻,正如英国大诗人亚历山大·波普(1688—1744)在英格兰“光荣革命”之后的时期所写的一篇哲学诗歌《论人》(1733—1734)中所表达的历史上的那些时刻,在这种时刻,可以有信心地说,“希望在人心中涌出永恒”。但是,在西班牙,1930年以后六年,佛朗哥从北非进军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成为长期和血腥战斗的中心。1930年时的一些学生惨遭伤亡。但是1930成为一个梦想的时代,而奥尔特加和在马德里的学生分享了他的梦想。

虽然奥尔特加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未被监禁,也没有被卷入,在佛朗哥死后,民主的梦想的确实现了。我真不理解为什么,除了也许他可能把它看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

^① 除非另外指出,全部引文取自奥尔特加的《大学的使命》。

争夺,而他对两者都憎恶。^① 但是一所更好的大学的梦想根本没有实现,而且今天西班牙的大学可以用回忆奥尔特加在1930年时用的那些词语来描述。

奥尔特加

奥尔特加(1883—1955)先在耶稣会学校和马德里大学求学,然后在莱比锡、柏林和马尔堡学习。从1910年至1936年,在马德里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

他在政治上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反对利维拉独裁统治,支持建立第二共和国。但是,他是一位非常精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社会是由群众(masses)和阶级(classes)组成的(见所著《群众的反抗》一书)^②,群众就是那些没有资格领导的人,阶级就是那些有资格领导的人。大学的学生属于后一类人,这给予他们非常特殊的责任。当时西班牙特别需要有才能的精英:“因为群众不会让自己被领导,而剩下的当领导

^① 多布森(Andrew Dobson)结论说,虽然奥尔特加的当众沉默“旨在作为表示对双方的不满的意味深长的尝试”,他的同情逐步地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者的胜利”一边,(多布森,《奥尔特加的政治学和哲学导论》)。麦克林托克(Robert McClintock)在《人和他的环境:奥尔特加作为教育家》中的解释是,奥尔特加早在1932年充满失望之情开始脱离政治(见第八章《失败》中的讨论)。

^② 在《群众的反抗》中,奥尔特加写道“群众的来到”,他们不能“统治社会”,但是热切地要这样做。这就引进“残忍的群众帝国”,他们的“介入完全通过暴力”。“群众”没有“道德准则”。一个后果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始主义”的兴起。

的少数人并不懂得如何领导。”^① 西班牙和欧洲大陆正在他们“回归野蛮状态”的道路上。^②

我觉得,作为一位哲学家,奥尔特加好像一位原始的存在主义者:“生活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他又说,“我就是我自己加上我的环境,而如果我不拯救我的环境,我就不能拯救我自己”。(见所著《对堂吉诃德式的人的沉思》一书)^③

以上的境遇和倾向性的每一点都影响奥尔特加对大学的看法。

(1) 马德里是一所传统的西班牙大学。这意味着马德里大学像萨拉曼卡大学曾经跟随波洛尼亚大学那样跟随萨拉曼卡大学,多半成为一系列专业学院——特别是法律、医学和工程——增加一些亚里士多德。当奥尔特加写《大学的使命》时,他接受专业人才的训练作为一个使命。所以他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历史上的马德里使命:“学术性专业的教学”。

(2) 奥尔特加求学的几所德国大学跟随强调科研的洪堡模式。西班牙的大学并不强调科研。奥尔特加认为它们应该。因此他也赞同德国大学的使命:“科学研究和未来科研工作者的培养。”

(3) 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奥尔特加赞成民主

① 克里斯汀·塞普雷加:《奥尔特加的历史思想》,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② 克里斯汀·塞普雷加:《奥尔特加的历史思想》,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③ 奥尔特加“致读者”,《对堂吉诃德式的人的沉思》,马雷写导言和注,拉格和马林译(纽约,Norton,1961年),第45页。

政体,但是民主政体需要领袖。这些领袖最可能来自他称之为“社会的起指导作用的阶级”的社会专业阶层。因此,这个起指导作用的阶级的成员不止于需要他们的专业技能的教育;他们也需要一种教育以便他们能够“管理”。学术性专业的成员,他们有管理的责任,需要受有关这些责任的教育。因此奥尔特加的第三个使命是政治领导的训练。奥尔特加承认在一个民主政体,“工人”也能够受到一些普通教育的好处,但是他从未提出如何使他们受到这种教育,而且暗示这将是通过大学,这是为“学术性专业”的。

(4) 我曾经称奥尔特加为一位“原始的存在主义者”:每个人都有一个指导他或她自己生活的机会,甚至义务。每一个人必然地通过生活择路而行。他引用达·芬奇的话说:“谁不能得到他所要的东西,让他要他能得到的东西。”大学应该教学生“需要懂得过他的生活”,应该帮助塑造“一个有文化的人:把他放在时代的顶点。”在那里,每个人必须“对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已经获得一些看法”,必须“对世界做出理智的解释”,必须了解“时代的文化”。否则一个人将被定罪“过更低级的生活,更加困难、劳累、不高尚”——“过一个低于人类的人的生活”。因此,奥尔特加的第四个使命:塑造“一个有文化的人,在明媚的阳光下看到生活的道路”。在《对堂吉诃德式的人的沉思》一书中,他写道,“当一个人对他的情况得到完全认识的时候,他达到才能的充分发展”。^①

^① 奥尔特加“致读者”,《对堂吉诃德式的人的沉思》,马雷写导言和注,拉格和马林译(纽约,Norton,1961年),第41页。

“普通文化”

奥尔特加说,他并不试图在训练学术性专业、科研、培养领导人才和教导对周围环境的了解四项任务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普遍的大学模式。他也不要仿效其他国家的模式:“模仿将是毁灭性的”。尤其是他并不接受英国的模式,这种模式“保存了大学的非专业的方面”,也不接受过分强调科研的德国模式,他说:“不要有人来告诉我德国大学……是一个模型。”相反,他要一个特殊的西班牙解决方法,而且说,大学“只有创造和维持大学的整个国家的比较大的实体”。然而,他对“普通文化”的重视,确实没有国界也没有时间限制。它可以在一种程度上或另一种程度上切合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而且在任何时候。普通文化既对他的第三个使命,又对他的第四个使命——培养领导才能和选择一个人的“生活道路”——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说的“普通文化”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引他的话:

- (1) “那个时代的人所占有的有关世界和人类的思想体系”;
- (2) “有关属于我们的时代的必要的思想体系”;
- (3) “这个时代已经达到的重大思想体系”;
- (4) “一个时代用以处理它的生活的思想体系”;
- (5) “我们关于我们世界和同胞的性质的现在的信念”;
- (6) “代表这个时代高层的真实思想体系”;

(7) “领会今天这个庞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生活必须说明清楚”;

(8) “论述当代的主题”。

这些都可以用今天的语言识别出来,例如我们时代的“重大思想”、“重大问题”或“重大主题”。这不是“重大著作”。奥尔特加轻蔑地说起“陈旧的思想”,可能也会轻蔑地说道“陈旧的问题”。

他的普通文化实际上就是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教导的普通文化。当有“公民”的城邦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时候,他们也关心他们时代的“重大思想”和“重大问题”:关心公正,关心好的社会,关心谁应该统治,关心公民的责任,关心应该如何养护和教育公民——所有这一切,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都是“在道德上有启发性的”。亚里士多德也关心科学研究,而且几乎一手单独把生物学有一个好的开始。留给智者派去教技能——包括逻辑学和修辞学——再一次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是“实际有用的”。

在今天美国的学术争论中,最接近普通文化的看来可能就是强调两性、种族和阶级,但是我肯定奥尔特加会拒绝这种对今日重大思想和重大问题的定义过分狭窄。我将假定,奥尔特加的方法会包含比较全面的单子,但是他将有所选择:“必须获得的知识,和学习的能力不相称。”他称之为“教育中的经济原则”。

奥尔特加特别列出来作为最重要的教材的包括以下一些

普通知识：^①

- (1) “物质世界的图解”；
- (2) “有机的生命”；
- (3) “历史的过程”——“历史上伟大的运动的一个还不错的首尾一致的图景”；
- (4) “社会生活”；
- (5) “宇宙的轮廓图”(不管那可能是什么样子? ——但是记住奥尔特加曾经上过耶稣会学校)。

他包括不是研究方法意义上的“科学”，只是作为提出研究的结果及其“对人生的影响”——“科学家……是一个对一件事懂得很多的野蛮人”。

从奥尔特加对普通文化的远见可以做出以下一些推论：

- (1) 课程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以教授为中心。
- (2) 教授成员需要一种“整合的才华”，不是“科研的研碎能力”，而且“教授的选择将依靠他们的综合的才能”。
- (3) 要有一种“硬性要求的”课程(主要是必修的课程)。
- (4) 一个“文化学部”(faculty of culture)将处于大学的中心。
- (5) 大学必须表明自己作为一个反对“狂乱”“轻浮”“愚蠢”的主要精神力量；必须是一个“在西方世界历史上的振奋

^① 比较这个单子和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的单子，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新近为教育计划确定四个基本主题，包括(1) 把世界分析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系统，如布尔丁在所著《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确定的系统，包括自然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以及通讯和评价系统；(2) 近代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观点；(3) 跨文化的理解；(4) 培养公民制定公共政策。(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美国为其未来作准备》，第17—22页)这是我自己对当代“重大主题”的一个特别喜爱的选择：走向一个几乎全球社会的运动。

精神的力量”和一个“今天破碎的知识得以整合”的根源。

奥尔特加的确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最好采取“不同的院校”——在各院校之间进行某种职能的分化——而不是采取包括他的四个使命的单一型院校(大学),但是只是说,“科学研究本身应该从大学的核心中排除”,而安排在“实验室”。大学本身将教育“普通学生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和一种职业的一个优秀成员”。

21 世纪的重大思想和重大问题

在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中,一个人可以怎样应用奥尔特加的远见呢? 这样一种努力可以从查看一下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Lyceum)的课程开始——他们选择了什么重大思想和重大问题,为什么? 或者查看一下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的尝试,他曾试图把希腊哲学和《圣经》结合起来。也许还可以细细查一下其他的选择,如拿破仑改组法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或者德国的选择洪堡模式,或者在美国赠地运动时代做出的选择,或者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创办的新大学,或者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所做出的选择——所有这些选择都是对最好应该教什么的新的考察的有意识的尝试。但是 21 世纪将有不同的需要。

另外可以从列举 21 世纪预期会出现的重大思想和重大问题开始,以便学生可能更好地对付新时代的挑战——了解这些挑战并分析对这些挑战的各种不同的反应。

当然“两性、种族和阶级”将会在列举的单子之内,但是不会是考虑的惟一题目。在1930年,奥尔特加肯定会把“群众的反抗”的后果作为一个“大主题”放在议事日程上。其他可以列出供考虑的可供选择的题目是这些:

- (1) 宗教和民族性在近代生活中的作用;
- (2) 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和解决冲突的一般题目;
- (3) 工业文明的病理;
- (4) “信息革命”的含义;
- (5) 环境的未来——包括人口爆炸的冲击;
- (6) 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
- (7) 现在正在兴起的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
- (8) 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失败,和它们向新的社会形式转变中的问题;
- (9) 全球经济中的竞争;
- (10) 世界的比较文化;
- (11) 决策过程;

其他有待考察的有关问题大概是这些:

- (1) 应该只选一个主题,还是几个主题?(我赞成几个)
- (2) 这个主题或这些主题应该是什么?
- (3) 应该给学生在这些主题中一个选择机会吗?(我赞成选择)
- (4) 课程中应该有多少分配给这个主题或这些主题?(我赞成在一所四年制院校本科阶段大约三分之一课程“自由教育”)
- (5) 谁应做出以上决定?
- (6) 如何能说服教授教这些比较宽阔的主题,而不单独

教他们的专业？

(7) 如何能把科研应用到宽阔的问题,而不是在一个时间只应用于一个狭窄的问题？

(8) 应该有新的机制管理这个新的方法吗？奥尔特加建议,像上面提到的,设置一个“文化学部”。

(9) 应该努力使全体学生接受“普通文化”的教育吗？(我的回答是“绝对是的”,而且这个回答要求依靠若干院校——包括中学——而不只是大学。)

(10) 什么应该是需要研究的“时代”的界定？我已经建议一个下一个世纪重大问题的单子。但是,奥尔特加把“时代”看做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他写过“他自己一代的历史世界”^①——每个人自己生活的时期。他特别提出当每一代人在45岁至60岁之间有“十五年支配”的十五年 and “启导”(initiation)^②的一代以前的十五年的重要性。言外之意就是大学应该准备学生在30岁和60岁之间参加社会的生活。但是奥尔特加承认,每一个时期在它自己内部既携带过去的残余,又携带未来的种子。

据我所知,在美国2400多所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没有一所曾经考虑过这种以普通文化为中心课程的分析 and 规划工作。

我自己对奥尔特加的建议的评价如下：

奥尔特加的建议值得仔细考虑。除了其他的贡献以外，

① 克里斯汀·塞普雷加：《奥尔特加的历史思想》，第121页。

② 克里斯汀·塞普雷加：《奥尔特加的历史思想》，第125页。

奥尔特加的建议将给学生一种“拓宽的学习经验”，^①与专门化一起进行，帮助他们既进行横向的思考，又进行纵向的思考。而且，做得好，将对他们的生活非常恰当。

如果从若干可供选择的建议中选择奥尔特加的建议，那么，关于一个主题或若干主题的选择——而且我强烈赞成若干主题，由学生从中选择，非常重要。所作出的选择应该根据学术上的原因，而不是根据其他原因。我对“性、种族和阶级”表示怀疑，不是作为若干主题中的一个主题，而是作为一个而且仅有的主题，没有仔细考虑其他选择。在我看来，近来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匆忙做出判断，不符合学术生活的特性的情况。

不管选择什么主题，应该认识到，在各系严格的标准以外的教学有它的危险——適切性可能压倒严格——教材的最仔细的选择将是必需的。每一个主题应该尽可能地认真对待。

应该强调目的：“探讨当代的重大主题”；随着这些重大主题改变它们的形态，课程内容应该灵活。

每一个主题的分析，不仅应该为了主题本身，而且应该给学生比较一般地对当代的重大问题进行批判地和建设性地思考的经验——如何处理他们的学习，如何提出有创见的反应。

^① 见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学院课程的使命》，第13页；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大学校园的改革》，纽约，1972年版。奥尔特加的建议确实包括“拓宽的学习经验”，但是有一点重要的限制条件：它必须面向未来。

高等教育的使命

最后,我想把奥尔特加放在一幅包括很多位置的巨大的画面上。画面上每一个位置代表一个高等教育主要应该做些什么的观点(实际上做些什么是另一回事)。

一元化大学主要单一中心任务举例

当代的重大主题:希腊大哲学家。

过去时代的重大思想:① 赫钦斯② (“经典著作”)和他的很多追随者,也包括孔子的经典著作。这个模式宣称重大的思想已经发现,而且已经写下。教育的目的在于把这种传统的智慧传给未来的世世代代。

领导人员的训练:纽曼,③ 在英国 19 世纪中期著《大学的理想》一书,是培养一个人“能胜任任何工作”的“自由教育”的最重要的倡导者。

新的知识:从 1809 年柏林大学的创办开始,近代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在一切领域探讨真理和知识的发现,把理性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传统结合起来,形成近

① 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当代的重大思想。而且这一类还可以分成:一个人自己的文明的思想;其他文明的重大思想。

② 赫钦斯:《美国的高等教育》,耶鲁大学出版社,1936 年版;《学习的社会》,1968 年版。

③ 纽曼:《大学的理想》,伦敦,1927 年版。

代科学研究的基础。在美国弗莱克斯纳接过这个主题,在他著名的医学教学改革中做出了范例。^①

高层次专业训练:古希腊的智者派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成对照,主要关心通过逻辑学的训练提供人才,担任公职。这种专业训练模式,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占有优势,如在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别处的大学为教会或国家培养内科医生、律师、牧师和会计。在美国,富兰克林是“最有用的”知识的重要倡导者。^②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在明治维新以后创办的日本几所帝国大学,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商业和科研机构集中训练了大批精英团队。

特定社会的高雅文化:传统的牛津和剑桥(1850年以前)。这些大学只为人口中少数人服务,为在一个坚实地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保存一种精英主义的高雅文化而设计。

社会的既定的道德:天主教、穆斯林、儒家和耶稣教的学院和大学。^③ 全世界信奉圣伊格内修斯的教海的耶稣会大学、中世纪巴格达的宏伟的智慧宫,以及从加尔文日内瓦大学派生的荷兰、苏格兰和美国的耶稣教学院,都把伦理和宗教的信念的传播作为它们教和学的基础。

社会的改造:“革命”前的革命教育和活动。

① 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给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报告》,1972年版。

② 富兰克林:《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1749年版。

③ 哈佛学院的创办人说,哈佛学院的创办,“旨在促进学问,并把它永久保存到后代;担心当现在的教派教长死后,留给教会无知的教长”。见《新英格兰的最早的收获,1643》。

多元化大学的多元任务举例

奥尔特加：专业训练，科研，领袖能力训练，指导个人自己的生活的准备。

拿破仑式的大学：国家的专业训练和文化。

前苏联（原坚如磐石的苏联）：政治意识形态和专家治国的能力。

全部高等教育的开放任务举例

近代美国高等教育：除别的以外，“自由教育”，专业训练，科研，补救训练，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教育机会均等，建立一个“全民受过教育的国家”。^①

长远的趋势是：①从惟一的大学到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②从一个，到少数，到很多任务；③从为少数人，到为很多人，到为大多数人服务。五十年前，奥尔特加在每一次转变中都站在中途。他感觉到一所统一的大学本身是不够的（因此他想像在边缘有科学实验室）。他建议若干使命，而且知道这些使命并不是彼此相容的。他为群众的教育感到困扰，但是没有为群众提出什么建议。

奥尔特加的最重要的新的思想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追溯到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准备大学生既为了社会的领导，又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管理，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思想和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且，这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的时刻现在正再次来临。

^① 鲍恩：《国家的状况和高等教育的议事日程》，旧金山，1982年版。

第十二章 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

以下这篇陈述,是在美国高等教育从 1960 年至 1980 年发展最快的时期所发布的一个多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有关美国高等教育使命的描述。这篇陈述取自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一个报告。我把它包括在这里,因为这个报告经过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讨论,反映他们经过若干次冗长的讨论之后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我草拟了这个报告全文,正如我草拟其他报告一样。这里提出的使命适用于整个高等教育,而不只适用于任何一所院校或部门。我们假定这些使命的责任将在各院校之间有区别地进行分配。

应该注意到,我们的目的是强调“学生的普通教育”,后来在关于学院课程的使命的一个报告中,^① 补充了特别强调“拓宽的学习经验”。拓宽的学习经验的目的,是给予学生在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内部学习纵向思维以外,并对主要问题学习横向的思维的机会——正如公民必须充分能够做到,高级官员也必须做到,而且作为终生学习的基础;既能进行跨学科的思维,又能在学科内部进行思维。对于这种拓宽的学习经

^①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学院课程的使命》,旧金山,1977 年版。

验,参见我担任主席的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①

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后来也得到《给青年一个更好的机会》的声明的补充。^② 这个声明还有一个目的:“通过教育,指导和帮助,特别通过社区学院,关心一般青年的福利。”这种对青年福利的关心,在瑞典指定给中学,在英国指定给青年中心。

现在我将增加另一个目的:帮助社会从比较实利主义的消费转到比较文化的消费形式。实利主义的消费极其大量地利用稀有的物质资源;文化的消费就不那么大量地利用物质资源。实利主义的消费常常使自己的目标不能实现,导致维布伦(Veblen)的“摆阔性的挥霍浪费”、谢托夫斯基(Scitovsky)的“不快乐的经济”^③ 和赫希(Hirsch)“富裕的挫折”。^④ 文化的消费具有比较多样的享受,但是较少竞争性的享受形式。目标是以对环境较少费用,获得较大的满足。用谢托夫斯基的话说,目前的生活作风是“在能量和可耗尽的资源方面是那么昂贵”。“补救的办法是文化”。因此高等教育应该更加集中注意“消费技能”,更加注意课程的文化丰富,和更加注意周围人口的文化设施。

卡内基报告提出五个主要目的。但是,就委员会对几个研究的注意力来看,集中注意第三个目的:扩大“对中学后年

① 全球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克尔):《美国为它的未来作准备:教育中的全球观点》,纽约,1987年版。

② 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给青年一个更好的机会》,旧金山,1979年版。

③ 谢托夫斯基:《不快乐的经济:关于人类满意和消费者不满意的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④ 赫希:《生长的社会限度》,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龄组的教育的公正原则”。我们认为在那个历史阶段公共和私人团体政策最应该集中注意的领域。我们对公共政策的主要贡献是对现在被称做“佩尔助学金”的建议,这种助学金已经成为联邦对教育机会均等的主要贡献,目前(1992)支出每年达 55 亿美元。

当我再一次审视这一陈述并看一下其他有关目的的陈述,包括本章附录中的那些陈述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卡内基报告中有关高等教育目的的阐述,在某些方面,和很多国家所提出的目的和实践是多么的不同。

(1) 卡内基报告提出的目的没有包括“广度的要求”。中学确实有这种要求,在学院水平,广度要求多半是在跨系的政治争夺中切开的结果,所选的课程多数在助教的协助下以例行的方式进行教学——主要的例外撇开不谈。

(2) 卡内基报告提出的目的没有提出有关特定的文化或一些文化的永存问题(“文化遗产”),而近年来在美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争论的问题。卡内基报告也没有提出特定意识形态的永存问题。从而,虽然不是直接有意,卡内基报告抛弃纽曼、罗宾斯、奥尔特加和其他人的有说服力的辩护,同时不仅抛弃共产主义之下的实践,而且抛弃其他政府形式,例如法国的实践。长时期来我自己的观点是应该给学生一个鉴赏世界各个文明的最著名的经典著作的机会。

(3) 卡内基报告提出的目的也没有特别提到领袖的培养,除其他人以外,像纽曼和奥尔特加,包括杰弗逊提出的那样(“天才的贵族”)。我认为我们只是假定在民主社会,领袖将是从小优良的教育过程和其他经验中涌现的。

此外,我们并没有提到一个社会阶级的永存的问题,例

如,这在英国历史上和在美国,在较少的程度上是这样做的。相反地,我们想要通过强调一个敢作敢为的机会均等的计划更往前地走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作为一个一般的概括,可以这样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职能”(为劳动市场的训练和以资助为基础的科研)正在压倒高等教育的“自主的职能”(高雅文化的保存和应答个人好奇的学问)。^① 不过,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并不压倒高等教育的“私人生活”^②。“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包含除教师和学生以外的其他人所做出的一切影响学院和大学的计划和决定”。这些“其他人”包括联邦和州政府机构以及法院,他们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已经明显增加。“高等教育的私人生活是实际发生在教室,图书馆,课桌上和办公室里的事情——从事教和学的教师和学生的一个个时刻,一天天的活动和相互影响”。这种私人生活仍然主宰着校园的日常生活。以下要讨论的私人生活,包括“纯粹的学习”和“社会的评价”,特别是后者,远比以前明显。

当然,有好多人相信,高等教育应该只有自主的职能和只有私人生活。对维布伦来说,真正的大学不应该有任何公共的职能或者任何公共的生活:“不文明的大学必然被交给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学科,因为那是原始风尚的性质;而不文明的大学仅仅是同样不文明的精神状态的另一种有点升华的表现。不文明的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老于世故

① 采用马丁·特罗著《关于从大众化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的转变的思考》一文所用的术语。

② 采用马丁·特罗著《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一文所用的术语。

的,它的学习带有同样的情况”。相反,大学应该只关心“对知识的无私追求”,关心“无所事事的好奇”,甚至并不献身于高雅文化的保存。但是,他确实认为应该以一种“工艺的本能”追求“无所事事的好奇”,而不是纯粹的无所事事。^① 迈诺格(Kenneth Minogue)赞成专心无所事事的好奇:“所有关于大学不论确实,还是应该服务社会,关于大学应该是学术界以外的什么事情的工具的观点,都是否定学术独立和把不相容的价值观强加于学术界的手段。”“为什么大学应该服务社会?”这样提问是错误的。迈诺格说,“为什么社会不为大学服务?”^② 这样提问才是正确的。

如果大学的惟一目的是为大学教师的无所事事的好奇服务,那么可以问:谁应该供资金给大学——是消费者的大学教师? 偶然的富裕的捐助人? 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教会(事实上为了其他目的给予经费)? 事实上,在近代“不文明的大学”有大量的满足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因为教授们有那么多自由使用的时间。有些人把他们的全部时间都花在无所事事的好奇上;很多人花他们一部分时间。为这种无所事事的好奇提供的资金多半为了“不文明的”目的,但是一部分用来资助迈诺格所谓“秘密的大学”。实际上,这是促进无所事事的好奇的尽可能好的办法。以下讨论的作为“自主的职能”的“纯粹学习”和“评价”,由于和其他比较“大众化的职能”有联系,成为可能。照我们看来,这些大众化的职能是功利主义的,但是它们并不是不文明的。

① 维布伦:《美国高等教育》,新泽西,1993年版。

② 米诺格:《大学的概念》,1973年版。

这一章最后附有关于各国高等教育目的的简短陈述以资比较。

1973年卡内基委员会这个关于高等教育目的的陈述,在1993年和以后也许似乎有点古怪和过分乐观。虽然我们确实看到在校园出现的“政治上的分歧”——至少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正确的。从1973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好的并不怎么多。

但是,我仍旧把它看做近代美国所制定的关于什么应该是高等教育的目的的最好陈述。说明了这一点以后,我想对1973年卡内基报告发表二十多年以后,报告中所展开的主题提出若干防止误会的说明:

目的1:学生个人的发展。学生的目的已经更加转向职业和收入。很多学生对普通教育很少感兴趣。^①

目的2:促进人的能力。公共政策已经更加强调为经济服务(照我的看法,过分强调)。科研经费的资助,现在比过去更多的根据政治的影响,更少的根据科学的价值。

目的3:社会公平。有点较高的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比例。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学校的自己选择的分离,而不是整合,以及在校园和广大公众中不断增加的强烈不利的反应。法律上,情况不断改善;事实上,比我们所曾经想的走得更远。校园成为比过去分成更多部分的社会。

^① 阿斯廷等的研究表明,从1966年至1990年,大学一年级学生强调把“财政上非常富裕”作为“生活目标”的人,从44%上升到74%;而强调发展“有意义的生活哲学”的人却从83%下降到43%。见戴伊、阿斯廷、科姆:《美国大学一年级学生,二十五年趋势,1966—1990》,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1991年版。

目的 4:纯粹学习。相反,公共政策更加强调“有目的的”学习。

目的 5:对社会的批判性评价。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学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已经变得更加有批判性。教授中更多的人属于“中左”,“左派”中更多隶属于校园内外的“政治纠正”学说。第二个变化是受到批评的社会公众,更多的人更少倾向于接受批评。高等教育完善的声誉已经受到损害(比我所设想有正当理由的更加厉害),而且高等教育的道德权威削弱。很多校园具有一种更加剥削的形象——在科研,在教学,在体育运动,在领袖的个人行为,在为报酬的服务。

所有这一切不仅反映校园的变化,而且反映美国社会的变化。有更多的失望和更少的希望^①,但是希望仍旧有,而且这个目的的陈述提出了那个希望。

根据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希望的最大的根据是,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完全压倒曾经被期待的巨大的人口统计的下降,而对高等教育的私人费用的回报率和有记录的历史上的回报率一样高。在未来的十年内,希望的最大根据是,社会比以往更加需要高等教育的目的。愿希望触发永恒。

^① 克拉克·克尔:《美国高等教育的忧患时期:20世纪90年代和以后》,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主要的主题

(1) 今天,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着目的上的争论。这些争论既影响学校的内部的实施,又影响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外部的关系。一个有点类似一个世纪以前——但没有那么紧张——的有关目的的再审查的时期即将到来。

(2) 在我们看来,今天和预期中的将来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

①为学生个人智力的、审美的、伦理的和技能的发展提供机会,并在学生比较一般的发展成长中,提供能建设性地帮助他们的校园环境。

②普遍地在社会上促进人的能力。

③为中学后年龄组扩大教育的公平。

④学问和智慧的传递和促进。

⑤为了社会的自我更新——通过个人思考和说服——对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价。

这些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各高等院校对某些目的将比其他目的关系更大。所想像的目的和与这些目的有关的履行,都不能同等地应用于一切院校。

(3) 我们对这些目的实际履行情况的评价是,第一个目的一般合适;第二个目的优秀;第三个目的不能令人满意但在改进中;第四个目的优秀;第五个目的过去十分不平衡,未来不确定。

(4) 我们特别建议改进如下：

第一个目的：更加注意学生的普通教育，他们的职业准备机会，以及他们的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加关心影响学生发展成长的环境的质量，特别是更加把学习与工作和服务结合起来，更加在校园把各年龄组混合起来。

第二个目的：更加稳定地提供联邦的科研经费，特别是对基础研究，并集中注意最多产的个人和项目；做出重大努力，到这个十年末，减少保健人力领域的赤字；大力扩充“终生学习”的机会。

第三个目的：坚决努力为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群体希望升大学的年轻人提供学院的学额，给他们适当的财政资助，并尊重他们的文化背景；更大地关心对全部中学后年龄组可以得到的机会，和中学后的教育对达到社会公正的全部贡献。

第四个目的：和更稳定地资助科学一起，给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创造性艺术更多的科研资助。

第五个目的：使管理对社会的批判性评价的运行有更好的规则和理解；公众对这种活动的重要性有更好的认识。

(5) 自从创办哈佛大学三个多世纪以来，已经积累了给高等教育规定的目的和与这些目的有关的职能。美国高等教育开始时强调古典文化和当时的道德教诲的训练。后来增加了注意经济增长、民主政体的发展和一般对社会的服务。现在所履行的职能既是大量的又是复杂的。

(6) 在高等教育内部，有关核心目的可以找到三种主要的理论观点：①核心目的应该和探索价值观和价值观的社会化有关；②核心目的应该为知识的持续演进和目前社会的技能发展的事业服务；③核心目的应该帮助为某种被指定的社

会类型铺平道路,或者帮助使某种被指定的社会类型永存。这些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在美国国内战争以前是至上的。

第二个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曾经占优势。第三个观点现在对仍旧占优势的态度构成主要的挑战。对这些理论的争论近来变得更加活跃。

(7) 在未来,对于目的必须期待有持续的争论,最后,最可能导致目前占优势的一方得以延续,但是受到一些实质上的修改。但是同时,争论也许十分紧张,虽然争论紧张的水平是周期性的。我们相信,高等教育和美国社会都应该警惕对目的的一个“麻烦时期”的可能性,应该理解对目的一致“旧时的好时光”可能不会很快回来,而且应该认识到现在在校园里存在“政治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对在校园和与社会对学术努力的基本逻辑所经常发生的对抗具有重要影响。

(8) 高等教育面前现在有很多与目的有关的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关于目的的更基本的理论观点,但是这些问题就它们本身来说就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在养父母地位(*in loco parentis*)的旧时的政策已经被抛弃,是否关心学生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要是这样,应该如何表达?为了纠正历史上和现在的不平衡,在招收学生和聘用教授时,对少数民族成员和妇女是否给予特殊考虑?是否建立分配额?是否实行抽彩的方法?现在是否存在有利于上大学的人而不利于不上大学的人的不公平的差别待遇?高等教育应该寻求以分化的结果推动机会均等,还是不顾能力和努力根据等级和学位,寻求一律的结果的平等?有组织的教授,作为法人团体,对于和学院的福利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上的争议是否表明态度?校园是否反对周围社会的多数人的意

愿,成为促进未来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基地?

(9) 在各自发展和轮流被对方塑造并形成有目的的相互关系时,高等教育和美国社会有着共同的利益。幸运的是,美国高等教育表现出对变化的环境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使得美国高教系统与一些其他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只对政府的指示做出反应的其他比较僵硬的高教系统区分开来。而且,幸运的是,美国社会表现出对高等教育的巨大的独立程度的大力支持和忍耐,虽然这些情况现在可能正在减少。

(10) 校园是一个关心价值观的场所,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教堂;关心公共政策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政党;关心学生发展成长的环境,但是它并不是家长;关心它自己的事务的有效管理,但是它并不是管理他人事务的商业企业;关心政府强制权力的运用,但是它既无政府的权力,又无政府的责任;关心它的成员的生活的物质条件,但是它不应是一座“公司城市”。有些人寻求使校园部分地成为一个教堂,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父亲或母亲的替代人,或者一个商业管理单位,或者一个替代的政府,或者一座“公司城市”,但是,这些都不是校园或者应该行使或者能够有效地行使的角色。

校园首先是一个学习的中心,用赫钦斯的话^① 越来越变为一个“学习的社会”。它是对一切需要教学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人,给予和接受高水平的教学的杰出的场所,是通过科研和反思获得知识并且使知识可以给予所有对它有兴趣的人的杰出的场所。“探求真理和学问是大学的核心价值”。^②

① 罗伯特·赫钦斯:《学习的社会》,纽约,1968年版。

② 哈佛大学管理委员会:《大学的性质和目的》,1971年版。

赞成目的再估价的势力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经历着巨大的变革,美国的高等教育也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保持美国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原则被再肯定。美国西部让给农业,工业遍及整个北部和东部。新的移民群体开始大量到来。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期,经济扩张的时期,政治上人民党的主义的时期。献身于家长地位,献身于《圣经》,和献身于欧洲文化的“古典的”学院,让位于向科学研究开放,向新的专业和职业的训练开放,向为社会服务开放,向对来自一切收入阶层的学生的更加欢迎的态度开放的“近代的”学院和大学。大约在1820年开始建立的各种势力,在1870年至1890年间达到一个高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形成的高等教育新模式,直到最近,除了局部战斗以外,大体上没有受到挑战。

再一次,重大的——但多半十分不同的——势力在起作用。包括:

(1) 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展到少数民族群体成员,扩展到妇女,扩展到成人。高等教育已经从它的精英阶段前进到它的大众化阶段,而且现在正向普及入学的阶段前进。这对学生总数,对院校及其较小意义上的社会的规模,对学生的兴趣——较多技术性的兴趣和较少严格的学术性的兴趣,以及对已经入学的学生的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有着很多冲击。上升中

的进入高等教育的期望的革命现在正达到它的最后的高潮。

(2) 新的知识对社会的运行处于更加中心的地位。新的知识已经和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一起成为影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的知识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也更加重要。而且高等教育是创造新知识的焦点。因此,高等教育在社会内部比过去对更多机构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且更加和它们联系在一起,包括“军事—工业复合体”。高等教育也对更多个人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3) 在高等教育内部接受训练,而且常常聚集在高等教育周围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内部人数比较多,同时对社会的工作也比较重要。但是,他们信奉很多观点,包括支持“敌对文化”。一些知识分子反对现状的新的社会斗争,标志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家。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对抗的影响。旧时工厂中工人和资本家在产品份额问题上的斗争,在它的社会意义上,让位于在校园和媒体一些知识分子和很多其他公民在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方向问题上的更加新的斗争。

(4) 社会正在重新考察价值观和生活风格的过程中,校园沉重地卷入这个考察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可能在产生的过程中,正如它们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期产生一样。在国家的观点对国际的考虑问题上的争论,在比较强调生产中的竞争对消费中的平等问题上的争论,以及在个人和国家各自的作用问题上的争论,标志着一些争论中的重大问题。

(5) 学生在变化中。他们来自比较放任的环境。在学院他们比较适应他们发展过程的整体。他们中有很多人

的情况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持行动主义分子的态度。他们较少愿意被“社会化”接受别人所提出的标准模式。

这些就是要求在高等教育的目的和职能方面有一个新的面貌的一些势力。说高等教育具有“教学、科研和服务”的目的,不再足够了。教学为什么目的?科研为什么理由?为谁服务?

我们特别关切这个时代——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和这个地方——美国——的目的,尽管承认高等教育的有些目的应该既是普遍的,又是永恒的。

我们接下去提出五个主要目的,我们相信,美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应该以这些目的为方向,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评价在这些领域进行。我们的改进建议也从这些领域提出。

目的一:学生个人的教育和为发展成长提供建设性的环境

现在全国校园有大学生 900 万人。在学院的年代既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影响他们毕业后一生的一个独特的机会——他们在学院时,比他们在入学前或毕业后的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常常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他们自己的选择决定他们自己生活的进程。对他们来说,在他们的发展中,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选择的时期。

学院能够以几种方式通过提供以下各种机会帮助学生的发展:

获得对社会和个人在社会内部的地位的一般的了解——这是“普通”教育的任务,它包括与历史和其他文化的性质的接触。

在多种多样的智力活动的环境中做出选择,使学生有一

个比较好的机会找到一个和他们的兴趣和才能相配的环境。

发展“批判的”精神,意思是“检验和挑战……过去未经检查的假设”以及未经检查的新的观念的能力。

将有助于获得适当的职业的训练。

调查和强化文化的和创造性的兴趣以丰富生活;提高表现的以及言语的和数学的才能。

研究伦理学的问题,形成价值观和生活目标。

制订出和他们的“感情的发展”相联系的问题。

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聚会,并和他们一起工作,从而“学习和人们相处”。

参加给运动的、艺术的和其他课外的兴趣出路的各种课外活动。

参加提供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接触的工作和服务活动,及使用技能和履行责任的经验——这可以要求临时辍学。

从校园团体的职业专家和合格的成人,按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办法获得指导和咨询。

我们的卡内基教授和学生意见调查委员会,表明大学本科生对这些机会中的几种机会所指出的重点,但是应该指出,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是所问的具体问题的俘虏,但是,从这一系列资料看来本科生自己对下列问题特别重视,而且按这样的顺序:①他们的“感情发展”;②“学习与人们相处”;③形成价值观和生活目标;④详细掌握一个专门领域;⑤全面的普通教育;⑥一种职业的训练和技能;⑦创造性活动的出路;⑧谋生的能力。

当学生们被问到他们有关以上每一个领域结果的评价时,他们通常报告说,他们得到了“很多”或者“一些”他们所想

要的东西。最低的评价是在职业训练方面。没有提出有关与排在上列清单之首的“感情的成长”有联系的结果的问题,当然,学生还没有知道他们的谋生能力将是怎么样。

大学本科生的反应表明,他们把学院经验看做和他们的总的发展成长有关,而不单独和他们生活的认知的和职业的方面有关。因此他们指望从他们的学院经验得到比作为一个机构的学院常常能够和甚至应该提供的东西更多,特别是在个人发展领域。严酷的事实是,在作为一个机构的学院所能提供的东西最少的领域,他们一般指望获得最多;但是学生可能在学院环境中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有机会比他们在所能得到的一些其他环境中所能做到的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目标。因而学院经验比学院本身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因此出现两个问题:通过直接机会的形式,学院应该提供些什么机会?学院能够帮助提供什么样的环境,这种环境将有助于学生获得学院没有直接责任的那些个人目标?

对学院经验的一个比较宽阔的发展方法,超越单独的智力发展,是跟上心理学领域,例如在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著作中的新的见解——学院的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认知的和感情的活动彼此关系密切。然而学院不能而且不应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担负直接的责任。那个责任在男女学生上大学的时候主要属于学生个人。学院的主要直接责任是通过教学和通过与学院有关的活动,帮助智力和技能的发展,和在较少程度上也帮助审美的和道德的发展。不管怎样,学院确实也提供一个由聘请的教授,招收的同学,雇用的教练员和顾问,提供的文化计划,提供的服务机会,正在实行中的传统和规则,以及其他成分组成的重要环境。但是,这只是学生在

其中生活的几种环境之一,其他环境由家庭、教会、通信媒体、职业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提供。除此之外,发展成长能够在很多环境发生,而且对有一些,学院校园无论如何并非理想的场所。但是,学院是发展智力训练和好学与专业能力的杰出的场所。因此学院特别应该把它的注意力专用于它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和使学生获得在任何别的地方不能那么好地获得的东西。学院首先是一个学生能够通过学习丰满他们的心灵的场所。我们相信,学院对待学生的“全面主义”既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相信,学院在以下这些领域具有一个根本的教育发展的责任:

(1) 普通教育,包括“对成为一个自我管理的政治共同体的一个自我管理的公民是什么意思的理解”^①;

(2) 在某一特殊领域的深度训练,包括职业训练;

(3) 学术行为的高标准的建立;

(4) 得到校园共同体的成年成员和职业专家的指导、咨询和示范;

(5) 为学生供应起刺激作用的文化生活;

(6) 提供工作和服务的机会。

学生应该可能从这些基本的校园供应自己构建以下各项:

(1) 必不可少的学术技能;

(2) 选择,然后进入一个职业的能力;

(3) 履行他们的公民责任的基本能力;

^① 罗伯特·赫钦斯:《学习的社会》,第 223 页。

(4) 创造性兴趣和能力。

他们也可能得到总的校园环境的帮助,发展一个全面的道德方向,在社会情境中的能力,以及一种身份、自治和个人正直的意识——但是这些明显的是环境的副产品,不是直接的校园责任。

目的一的定义。校园有一个基本的责任为它的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①发展对社会的理解;②获得在被选择的领域的学术的和技能的能力;③达到适当的学术行为标准;④探索文化兴趣和提高文化技能。校园有一项次要的关切的事情,提供建设性的校园环境,而不承担学生“感情上的成长”的责任。

目的二:在整个社会促进人的能力

在工业社会的早期阶段,一个社会的财富和潜在的福利大量地依靠所投入的物质资本的数额和近代化部门吸收的劳动力的百分比。美国现在有资本投入的高积累,逐年能够加到这个积累的数额就不是那么显著了。潜在劳动力中的多数人现在已经被从生存农业、手工业、店务管理和持家抽出来,进入合理化生产和服务。与通过更多的资本投入和把人们更多地转移到商业化部门更加复杂的方式来提高人的能力相比较,新的重点现在需要放在,而且正在被放在强化个人的贡献,而较少放在资源的大批积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形成。

高等教育通过以下方式卷入这个促进人的能力的过程:

- (1) 提供新的思想和更好的技术的科学研究;
- (2) 把新的思想传播到农业、工业、政府和各行各业、非

官方机构和个人的服务机构；

(3) 发现人才,并把人才开发到它的最大限度有用的水平；

(4) 帮助有才能的人,把他们自己导向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领域；

(5) 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妇女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进入有活力的领域,并增添他们地理和职业的流动性；

(6) 增添人们整个一生的个人技能,并从而增添他们给社会的“社会回报”和增添他们的个人收入；

(7) 通过科研、训练和对保健机构的咨询服务,促进人民的健康水平；

(8) 为广大公众提供教育和文化的机会；

(9) 一般地增添社会适应变革、解决问题和更加有效地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

我们承认,在上面提出的作为“教育发展”的一部分的为学生个人的技能训练,和为社会提供高层次人才之间的交错,但是方向不同——一个朝向满足个人的愿望,而另一个朝向满足社会的需要。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被很多人首先看做增加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方法。现在注意力需要通过促进人的能力更多地移向纯社会产品。

目的二的定义。高等教育具有重大的责任:①发展和得到新的思想和新的技术;②发现和训练人才,并指导人才更加有用处;③一般地提高广大公众的信息、理解和文化的鉴赏和机会。

目的三：对中学后年龄组的教育公平

专制主义的原始成分是人才的垄断，人才垄断使群众陷于比较愚昧，并保证知识的均势在富人和统治者一边。如果像委员会所认为的，那时一个自由的政府的基础根植于美国人民的意志之中，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跟着有一个建立在那个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那么这种垄断应该被打碎，平等的知识的手段（平等和自由的惟一保障）应该通过立法规定，变成所有阶级的共同财产……在平等的教学的手段被全体人民获得以前，自由仅仅是一个无意义的词，平等仅仅是一个空洞的阴影。（费拉德尔菲亚工人劳动党的声明，1828）

美国是历史上以宣告保证给所有它的公民社会公平的意愿形成的第一个国家。这个历史的目标，近年来，随着穷人、少数民族和妇女提出的爆炸性的更多平等待遇的要求，已经提高到新的重要水平。一度曾被视为神圣的目标已经变成在短时间内要完成的政治必需。

这个目标的达成，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责任，并非基本上是单独教育的一个责任。但是教育机构有义务在这项任务中进行合作，甚至对这项任务进行领导，既因为它和他们自己的人类进步的理想一致，又因为它是对社会的一个合法的服务。但是社会通过政府必须提供基本的政策和资金。

我们把教育公平勾勒为表明能力的合理的机会均等，而不是描绘为不顾成绩，单凭给所有个人的等级和所授予的学

位的学术结果的平等。高等教育对实现这样界定的社会公平越来越重要。机会的均等,特别是指获得一种教育,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和更加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机会的均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广大人民的期望是受初等教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是受中等教育;而现在是受中等教育后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复员军人的经验,学生来自以前从未和高等教育接触的家庭和社团,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现在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极大地增加了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对社会公平的需求。

1960年,加利福尼亚州保证为中学毕业生普及高等教育。一些赠地大学早就向中学毕业生广开大门,但是为所有学生提供学额并没有得到保证,而且采用各种方法劝阻或者拒绝他们入学。为所有希望入学的中学毕业生保证学额,现在正通过其他司法权——如1970年的纽约市——展开,并将继续展开,直到它们涵盖全国为止。要保证普及高等教育,既要求为学生提供很多新的学额,又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财政资助。普及高等教育还要求更多注意新的学生群体的特殊需要和兴趣——补习性的课程、考试、课程的调整,除其他一些调整以外,弄清楚历史、文化和诸如黑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等各种群体目前的作用得到适当的处理。

在过去,少数民族群体和妇女在教授任用方面受到歧视。我们反对这种歧视。还有,如果一个系或一所学院既从少数民族群体和妇女又从占多数的男人吸收它的教授,这个系或学院能够成为一个更为平衡和更加有效的机构。我们相信,这样的系或学院能够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也为女生和少数民族群体提供试图仿效的“模型”——但是这

种“模型”必须是在学术上值得仿效的。当然,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好平衡和更加有效的环境的办法,应该和其他比较传统的学术成绩标准一起考虑。但是,这些其他标准从来不是完全确切,而且总是多维度的,而所作出的判断常常是在所实现的和潜在的才能和成绩方面都是有理由相等的一群人,而不是在每个人大大胜过下一个人,一个人明显地突出的一群人中间作出的;通常是对一个特定的工作,有一批有能力的和可以接受的人,从中做出选择。

我们并不建议在教授的任用方面施行一个新的基本原则。各系和各学院常常,而且十分正确地关心平衡——在比较年轻的和比较年长的教授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各种观点和方法之间,在那些对行政工作有潜在的兴趣的人和那些并没有兴趣的人之间,在那些对学生的兴趣特别关心的人和那些并不特别关心的人之间,等等。对系或学院来说,平衡,和因而更大的潜在的效率,是任用人员时的标准的准则。标准的问题不是一个候选人不管领域、年龄、兴趣、是否是最好的人,而是考虑平衡和总的效率上候选人是否对系或学院是最好的人。我们证实平衡的原则,而且我们相信这个原则也应该扩展到考虑种族和性别,在那里,这种考虑可能增加整个系或学院的效率——在那里,激发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的学生的能力是重要的,在那里,对他们的特殊问题和态度的敏感性是需要的。我们支持学术上的卓越,虽然我们对卓越的解释比传统的解释有点更加宽阔。应该为工作选择最好的人,但是所谓最好应该解释为包括,和很多其他特征一起,对将受影响的整个学生群体的福利的考虑。

因此我们相信,在雇用工作中,应该给少数民族群体的成

员和妇女特殊的考虑,当这种人具有能胜任大学或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其他分配的任务的训练和背景的时候,以及这种特殊的考虑对创造一个更加有效的整个学术环境的时候,有以下两个要求:①以前被拒绝接纳的群体的成员完全胜任他们被任命担任的任务,②他们的任用增加整个系或学院的效率,排除通过以前被拒绝接纳和受到歧视的群体任用大学或学院教授而降低学术标准的可能性。

我们反对限额和抽彩的制度。我们并不认为各种类型的人必然应该在所有活动中相等地有代表。人们并不都想做相同的事情,他们也并不都同样有资格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有同等的机会满足他们的兴趣,和取得被考虑资格。

我们承认,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一些人和有些妇女(像有些多数民族的男人一样)过去可能较少有机会,也许比别人需要更多帮助(例如在开发科研记录方面)或更多时间(例如一个担任兼职工作的人)以表明他们的成就。但是,这些乃是在学术传统内部能够处理的过渡性的和边缘性的问题。

因此我们提出关于教授的观点,正如早先提出关于学生的观点一样:在进入点有一些特殊考虑,但是维护业绩的质量。我们建议:①比过去经常做的情况更加主动地搜寻少数民族成员和妇女,把他们安排在待评估的候选人“人才库”中;②保持从这个“人才库”内部选拔个人的优秀的原则,但是对优秀的解释,比过去通常的解释较宽。对平衡的各个方面的考虑,我们已经把平衡提出来作为一个系或学院最有效的全面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旦高等教育接受中学后年龄组的多数人进入它的校园——正如美国现在做的那样——留在校外少数人情况变得更

加严峻。由于进学院的人得到津贴,不属学院的少数人可能越来越感到他们的机会被剥夺和受到歧视。除非采取有效的行动,这种被剥夺和忿恨的感情只能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有两条可能的一般行动路线可用。一条是从普遍进入前进到普遍出席。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方向很不明智。不喜欢学术生活的年轻人将成为它的“俘虏”——已经有很多这种勉强的上学院的人。他们的时间和社会的资源将大量地被浪费。太多的年轻人已经是上学院的威望的受害者,而且学院已经被过分强调作为一个授予地位的机构。这种学生来自所有社会经济群体的家庭,但是也许特别是来自那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另一条行动路线是为年轻人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可供选择的发展渠道——例如学徒计划、服务机会和部分时间技能训练,并且根据需要给予和上学院的人相似的津贴。情况的逻辑指向这样的方向:当整个中学后年龄组的成员试图挑选他们的机会和寻找改善他们的生活机遇时,关心的是他们的福利。这正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和对比较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已经得到的注意相比,必须给予处于较少有利地位的人越来越多的注意。

高等教育——不是作为一个直接的目的,而是作为它的继续发展的一个后果——更加一般地影响经济上的公平。它减少受过高度训练的人力的不足,从而缓慢地经过一段时间和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的运作,减少对这种技能所支付的酬金。它教育人们不要为了收入依赖共同劳动,因而,通过制造愿意做不合意的体力劳动的人的不足,缓慢地提高给他们支付相当的补偿。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缩小来源于就业的收入。来自占有稀有的训练的比较高的收入比较地减少。当收

人的分配处于一个合理的适度范围以内时,一个民主国家本身能够比较和平地生活。

高等教育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人们不问遗传的背景可以得到社会的好处,可以在社会中起一个更加完美的作用,可以更加惬意地被吸收到社会之中,而不是被部分地拒绝站在社会之外。

因此,高等教育在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要求成为公平的一个工具;帮助保证家长的不利条件不应该必然妨碍子女;帮助保证长处不论在哪里发现,可能有机会提高,但是对于长处的金钱回报将不会过分大;帮助保证每一个年轻人为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为了对别人和一般的对社会服务的缘故,有一个合理的发展他们自己的机会。高等教育要有效地做到这一切,必须把它看做一个比较大的中学后教育系统,甚至还要超出这一点,成为这个年龄组的所有成员的中学后机会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将越来越变得和第三级教育联系起来,而第三级教育将越来越和全国青年的整个机会结构联系起来。

目的三的定义。高等教育有一个联合和帮助社会的其他机构为中学水平以上寻找教育机会的人们提供教育机会的义务。

我们极大地关心机会的均等,但是我们也关心机会均等的驱动不要采取在学术生活中破坏标准的方向。标准的维持要求按照成绩不同待遇——有些学生能够比其他学生走得更远和更快。教育公平的意思并不是指根据所给的等级和所获得的学位的一律的结果的平等。人们的才能和兴趣是不同的,他们应该既与他们的才能又与他们的兴趣成比例地得到

不同待遇。一个民主国家不仅要求对所有它的公民机会均等,而且也要求对杰弗逊所谓“天才的贵族”有特殊的机会,假如都给予一个获得资格的平等的机会。在学术生活中也是这样——特殊的天才应该给予特殊的机会,而特殊的天才只能被公正地挑选出来,如果成绩的标准得到维护。在学术生活中,机会的均等和结果的均等并不是一件事——在其他任何地方也不是一件事,我们的建议旨在保证前者。给予不同才能和兴趣的机会均等导致结果的分化。所以,学术结果的平等将是显示才能和兴趣的机会均等的否定。

目的四:纯粹的学习——支持智力的和艺术的创造性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卓越的纯粹学问的场所。这并非总是这种情况。科学研究在校园以外开始,直到19世纪为止,并没有进入大学。很多社会科学和思辨的社会思想也是在学院以外完成的——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在大学以外工作。文化的创造力在历史上也在校园以外找到它的家。所有这一切已经明显地改变,并且正在继续变化。美国的校园已经变成,而且越来越是一个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创造性艺术和社会思想中创造性和思考非常丰饶的环境。它吸引着很多最有能力的学者和很多比较有才能的艺术家;它给他们提供经费;而且它给他们一个自由和鼓励的氛围。

由于社会变得更加依靠和致力于学问和创造力,而且能够更好地担负得起资助校园,校园也成为一个这种活动的更

加重要的场所。“大学是西方文明继承的一个机制”^①,而且是保存和扩展“伟大的学问链条”^②的主要手段。

在很多国家,现在高等教育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学问的卓越的护卫者。美国,一度在文化上依靠欧洲和远东,现在凭它本身的资格成为学术和艺术创新的中心。美国一度在它的文化上是模仿性的,现在已经成为创造性的,而校园乃是这种新的创造力的一个最好的场所。现在美国在才能和复杂的技术能够传播人的思想的任何地方,具有鼓励好奇心和智力探索的财富和自由。

我们承认在基础研究的意义上的纯粹的学问以后可能导致应用研究,而应用研究依次导致新的技术,新的技术可能增添扩大人的能力。但是纯粹的学问,除了它可能有任何随后的应用以外,符合它自己的目的,而且常常从不同的动机引起。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目的列出,除了以后可能具有应用的用处以外,值得支持。

我们也承认,学问和创造性艺术活动来自不同的传统,在学术生活中已经有十分独立的历史关系,而且常常彼此关系紧张——人文科学中的学者常常是创造性作家或艺术家或作曲家的评论家,而且有创造力的人常常看轻人文科学这种作为一种枯燥和学究式的活动的学问。然而,我们已经把两者和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问集中在一起。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为它的动机利用好奇心和内部的激励,它们各自要

① 埃里克·阿什比:《19世纪大学的理念的未来》,《密涅瓦》6(1967秋季),第3—17页。

② 丹尼尔·贝尔:《谁的权利》,1971年版。

求大量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得到并不依赖表明有早的“报偿”的资源。在它们的活动中,它们各自超越我们所提出的其他目的。它们的目的比教育学生,或促进社会的能力,或改进社会的公平,或批评公共的政策和行为更加“来世的”。

目的四的定义。高等教育具有一个基本的义务,从事保存、传播和阐明过去的智慧;发现和分析过去的史料:为目前的科研和智力创造性提供一个环境;和为未来保证经过训练的心智和继续不断的兴趣,以便人类知识的储存可以保持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超出参照任何当前的实际应用。这里我们包括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人文主义的学问、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和思辨的社会思想。

目的五:为自我更新评价社会——通过个人思考和说服

由于对所谓大学的批评的职能的混乱状况,我们选择了评价这个词,而不是比较习惯用的批评这个词。批评的职能是:①有时据说是发展“批判的”精神——与“技术的成分”相比较的“批判的成分”;②其他时间据说是通过教授和学生个人,行使社会评论家或评价者的任务;③还在其他时间据说是采取直接行动,由大学本身反对社会——“批判性的大学”。我们以这三种含义中的第二种含义使用评价这个词。我们包括第一种含义作为教育学生的一部分。我们反对第三种含义。

美国到现在大体上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起始阶段,虽然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全部完成过。但是后现代社会仍旧有很多问题要控制:除其他很多问题以外,贫困的减少,种族、民族和性别歧视的终结,价值观的再检查,城市的整修翻新和自然环境

的保护。除这些具体的问题以外,我们面临保持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问题,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将使我们能够面对正以不断增加的速度冲来的现在无法想像的未来的问题和机遇。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改革的经典问题曾经是“我们能够如何医治这个或那个能详细说明的病害?”现在我们必须提出另外一种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设计一种将能继续不断地改革(即更新)它自己的制度,从目前能详细说明的病害开始,并继续前进到我们现在不能预见的病害?”^①任何社会能萎缩和衰退。一个社会保证它自己自我更新的能力,是这个社会的批判性的检查。高等教育在美国通过这个检验中能够起一定作用。

在国家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大学教授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除他们同胞中的很多其他人所有的东西以外,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设备,更多的评价具体问题和建议补救办法,以及在总体上对社会进行评估和建议改进的制度上的自由。大学教授还有接近另外一些事情的机会:“科学方法:按照科学方法,没有经过公开的检验和逻辑上能够再现的证据,并不推翻老的假设,或接受新的假设;科学方法责成调查人联系具体的问题而不联系发出问题的人或团体;科学方法规定评估人义不容辞要根据结果做出判断,而不是根据真实的或转嫁的意图;而且科学方法迫使每一个有关的人谦卑,这种谦卑的态度来自懂得,所有一个人的理论必须每天经得起公正的判断,可以加以精练,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将被改正。”^②

① 约翰·加德纳:《自我更新:个人和创新社会》,1963年版。

② 本大维的书面评论,芝加哥大学,1972年10月23日。

学生参加这种自我更新的努力,他们在校园有机会进一步发展他们对各种机构进行批判评价的能力和根据事实和分析自己下决心的能力。当然,在一个民主国家,这种批判能力,所有公民都是应该有的,但是学院的学生有一个特定当前的机会来精练这种能力。

这个帮助社会自我更新过程的目的,在我们看来,并不含有高等教育机构或者它们的主要管理团体诉诸直接的政治行动的意思。我们的意见是,应该根据以下六点考虑的任何一点本身抛弃直接的学校政治行动:

(1) 这种活动和新知识的自由探求不一致。这种活动可能足以既约束学校,又约束它的各个成员,从而减少后者对真理的真正自由的探求。学习可能受到损害。

(2) 这种活动可能使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四分五裂,因为它们寻求表明立场。有效的管理可能受到损害。

(3) 这种活动在取得它的即时的目的方面将常常是无效的,因为社会不会跟随,而且甚至可能正好相反——学术上运用语言的技能没有像做学问那样有效。即使这种活动特别有效,它一般会更加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它很可能导致对高等教育较少支持和更多外部的控制,很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和社会疏远。大学走进政治影响的冒险,违反机构中立的原则,这个原则对和国家在政治上分离是必需的。独立性可能受到损害。

(4) 学术团体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很可能在紧张的危机时刻和在直接责任实行这个立场的环境中发表,因而不很完全可能或者是经过有学者风度的思考或者是可操作的责任心的结果。因而它们也许并不代表学术界最好的成就,然而

它们也许看起来好像是代表了这样的成就。高等教育应该怀疑像巴黎大学的教授赞同发现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犯了异教和巫术罪以及德国教授支持希特勒这种事件。高等教育经过长期和艰苦的斗争,使自己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地方观念的影响,以独立作学问的名义使自己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影响。判断的训练可能受到损害。

(5) 政府的目的是很好地利用权力的执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很好地利用真理的探索。这是两种十分不同和甚至并不一致的活动。正如政府直接干预高等教育内部真理的探索是不明智的,高等教育机构试图直接干预政府权力的执行可能同样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把两者混合起来,政治权利腐蚀真理的探索的机会,比学者可能控制权力的机会还大。而且,权力的行使常常导致卷入伪善。正直的意识可能受到损害。

(6) 学术人员,以他们作为公民的角色,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够通过政党和其他行动群体寻求政治影响。

所以,应该选择的方法,乃是仔细的思考,经验的证据,逻辑的论证,以及个人和志愿群体的说服的方法。这些方法也是纯粹做学问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个人的评价行动应该首先从作为灵感来源的纯粹学问产生。因此我们支持一种“满足一个压倒一切的条件建设性的持异议,这个条件是:有关一个学科的意见状况,必须以这个学科的其他专家准备赞成的方式转变。要做到这一点,或者通过提出可以接受的新的资料,或者通过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解释旧的资料。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形式的异议,而且是难于学习的。但是,正是这种持异议的训练,在相距很大的领域如神学和物理学,从继

续存在的权力主义的和毫无生气的情况中拯救了知识”。

学术人员,以学术人员的身份,应该寻求真理,不是权力。“使大学政治化将是毁灭大学的首要的社会目的。”只有在非政治化的大学里,学者才能“思考而无需决定,观察而无需参与,批评而无需改革”;只有在这样一所大学,他们才能充分地“思考和观察而没有偏见,批评而没有恐惧”,而且学术生活的这些品质应该加以爱护,“因为没有无私和无畏的批评,社会将丧失它自我更新的力量”。

对社会的有效的批评,更加可能来源于高质量的学风,而不是来源于学术机构对政治承诺的潜在的自我毁灭的追求。“……一所大学为了在它的围墙以外获得权力所付的代价是自由的丧失。如果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支持任何压力集团或任何政党……它损害它的自由。”

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应该牢记①他们并不是社会内惟一有权评价社会的人——这是全体公民的一个一般的义务,②他们并不必然比社会中的其他人已经或者赋有较高的道德意识,或者较好的概括判断的品质。他们对道德或者对判断都没有特别的垄断,要是抱有或者宣称任何这种幻想,可能是自拆台脚。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只是在时间、设备以及由他们支配的制度上的自由有所不同。有这些财产可用,增加他们有效和负责使用的需要。

无论如何,记住这些限制条件,作为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它确实具有对社会的组成部分和对社会的全部,由它的教授和它的学生以他们个人的资格,保卫评价社会的权力和设施的供应的目的。

目的五的定义。教授和学生,作为他们的学术活动的一

个组成部分,应该具有通过个人的思考和说服从事社会评价的自由和机会。

目的六:接近 2000 年

高等教育对社会的需要做出贡献的可能性,随着高等教育积累更多的知识和新的技术,随着社会发展和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的活动和关系的网络而发生变化。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从不同的文化的观点来看,又经过多少世纪来的积累,应该定期地进行重新评价。这样一种检查现在无论在校园还是在社会都在进行着。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学生和教授有很多现在没有被充分满足的期望。广大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目的,以及从他们的观点看到的一些消极的结果,比在早先时代普遍变得更加感到成问题。社会也在很多方面正在变化,除了很多其他情况,包括按人口计算更多的教育,更加富裕,更加城市化。不断地出现更加新的技术(特别在电子领域),在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成员中产生更高的期望,对大学毕业生出现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情况,新的生活风格,关于环境的新的意识,对通过人的手设计将来的新的兴趣。总之,这些势力将极大地改变周围的社会,因而将对高等教育的目的具有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以前几节已经提出的,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复杂的。在美国,长时期来就是这样。在很少国家,高等教育主要地自愿对服务社会 and 机会均等负有在美国这样的重大责任。

评价一个具有比较简单的责任的系统——例如,一个具有提供高层次人才和讲授一套意识形态理论的义务的系统,

例如在俄罗斯；或者，作为另外一个例子，主要准备学生担任教师和公务人员，并教他们一种高雅文化的历史和内容的系统，例如历史上在法国，那要容易得多。作业是具体的，成绩的测验是相对地确切的。

美国的情况十分不同——作业是比较自我强加的，或者至少更加须经自愿的接受，而且比较复杂，结果，成绩的测验多种多样。于是，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机构如公司和政党比较，没有比较简单的所积累的赢利或所获得的选票的检验。

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多元的，构成的机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业绩受到很多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的总的业绩，按照我们的评价，①在纯粹学术和在全社会促进人的能力的领域一直来优秀；②在学生的教育进步领域一直来一般令人满意，但是可能有重大改善；③在教育公平的领域一直来最不合适——虽然现在有重大改进在进行；④在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一个有效的环境的领域，一直来最不确定——很少确定的东西可以知道；⑤在帮助对社会进行批判性评价这个领域，一直来最不平衡，最有争论，和最需要澄清。我们深信，在这些高目的领域的每一个领域的业绩，不管它目前处于什么水平，都能够改进。美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从 1870 年以来，曾经表现出对以赠地运动开端的改革，和比较新近的走向普遍入学的运动的压力做出反应的适度的能力，尽管其间通过很多其他的改革。虽然已经发生的很多改革曾经在外部的鼓励和压力下完成，高等教育并不像在有些国家那么僵硬，在这些国家，只有一次社会的大变动曾经破坏它的路线的历史进程——例如法国的拿破仑革命或者俄罗斯的列宁主义革命。美国高等教育曾经幸运地经过，而且现在也经受继续不断的内

部改革,虽然有时十分缓慢和十分有节制。

从忠实地复制现存的社会,到尝试制作一个全新形式的社会,在这个连续体上,美国的高等教育或多或少处在中途。它曾经既从事于支持社会,又从事于改革社会。它曾经完善传统的现状——特别是在1870年以前,强调高文化和道德人——但是它也曾经通过科研的影响和加大接近知识改变传统的现状——特别是从1870年以来。

我们指望,将来高等教育将表现出一种同等的或者甚至更大的意愿承认继续不断的改革,而且表现出一种同等的或者甚至更大的能力帮助塑造未来的社会——甚至比从1870年以来还要多。

附 录

其他有关高等教育目的的陈述

罗宾斯(英国,1963):在我们整个报告中,我们假定作为一个原则,高等教育的课程应该使所有凭能力和成绩上有资格学习它们,而且希望学习它们的学生都能够学习这些课程。^①

罗宾斯描述了高等教育的四个目的,它们是:技能的教学,增进一般的心理能力,促进学习,和传播共同的文化,并且强调基础广阔的学位的需要,特别是在英格兰。^②

莱弗休姆(英国,1983):在下一个十年,高等教育必须面对五个基本问题。对于大学和决策者,最普遍的问题将是设计一个能够有效地对下降中的中学毕业生人数做出反应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第二个问题是入学机会……我们论证说,英国的高等教育既应比过去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入学,又应有更大范围的人口能够入学。第三个问题是多样化。我们的论点是,大学不应试图涵盖每一个学术或职业学习的领域。

① 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勋爵):《高等教育报告》,伦敦,皇家出版局,1963年版。

② 威廉斯和布莱克斯通:《对逆境的回答:在严峻气候中的高等教育》,载《莱弗休姆高等教育的未来研究计划》,高等教育研究会,1983年,第5页。

有些专门化很可能产生比较有效地完成的高质量的工作。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政府的控制和资助。没有一所主要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大学能够指望完全自由。但是,政府或者政府的机构的中央控制太多可能阻碍革新和学校的发展。第五个基本问题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务任务。这要求比过去对最广义上的继续教育与应用研究和开发予以更大的关心。

我们的基本前提是,高等教育机构比给全日制的年轻学生提供三年制专门化的荣誉学位课程有着,而且务必具有宽阔的多的社会职能。……需要特别重视鼓励科研和成人的继续教育。^①

瑞典高等教育,68 大学法(1968):68 大学法从高等教育必须使学生为以后的职业活动作好准备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显然,这并不是说,在一所大学或学院,每一个学习单元都应该直接地和一种职业联系起来。意思毋宁是一个人的整个基本教育应该使他为一种职业作好准备……由于教育应该作为发展劳动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劳动生活应该构成教育更新的一个重要来源。^②

瑞典的“文化政策”(1974):瑞典议会一致地勾勒了七个具体目标:

(1) “为保护言论自由做出贡献,并为使用这种自由创造真正的条件”;

(2) “为抵制文化活动场所内部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做

^① 威廉斯和布莱克斯通:《对逆境的回答:在严峻气候中的高等教育》,载《莱弗休姆高等教育的未来研究计划》,高等教育研究会,1983年版,第24、130页。

^② 瑞典1968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斯德哥尔摩,1973年版,第9页。

工作”；

(3) “在文化领域内部,推动活动和决策职能的权力下放”；

(4) “计划工作,着眼于被忽视群体的经验和需要”；

(5) “创造艺术和文化更新的条件”；

(6) “保障我国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继续健康”；

(7) “促进跨语言和国家边界文化经验和思想的交流”。^①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1987:在经济和发展组织国家,国家报告建议大学应完成十项主要职能。

(1) 大学被首先指望提供普通的、中学后的教育。

(2) 目前关心的第二件事是从事科研和做学问。

(3) 大学的第三个职能是帮助满足“专家社会”的人才需要。

(4) 第四个,并与最后一个职能有联系的职能,是习惯上在研究生阶段提供的高层次专门化的教育和训练。

(5) 政府和公众指望大学通过它们的科研、教育和训练,帮助加强经济的竞争优势。

(6) 大学为那些将在公共服务、工业、商业和大量各种各样的职业寻找高层次就业机会的人充当筛选机制。

(7) 为工人阶级的子女提供一个社会晋升的渠道。

(8) 大学被指望给它们的地区和邻近的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9) 大学在诸如为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平等机会等某些

^① 乔克斯顿:《瑞典文化》,1971年版。

国家政策方面起着榜样的作用。

(10) 大学为男男女女以后在社会履行领导任务作好准备。^①

^①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威廉·泰勒):《审视大学》,1987年版。

第六编 对未来的竞争中的各种想像^①

引言

怎么看未来？像过去或现在一样吗？更加好些？更加坏些？答案部分地视观察者天生的性情而定。答案也视进行观察时的周围的环境而定——20世纪90年代早期，周围环境并不顺利。答案也视一个人怎么看过去而定——我的观点是高等教育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答案也视一个人把什么看做前面的巨大问题而定——正如以前各章已经表明，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无论如何，首先，我想答案视一个人怎么看在前进的文明的背景内部发展中的高等教育的任务而定。第十三章看一下具体的“新的视野”。第十四章看一下高等教育越来越处于世界各国的真正中心。

^① 本章原发表在《未来高等教育制度的观点》一书中，广岛，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1976年版。

第十三章 冰河时代还是新的视野 ——“教育的车轮”

围绕工业化世界,20世纪70年代是高等教育的悲哀的十年。公共资助由于学生运动的浪潮的反作用已被削减,经济资源由于一系列衰退被缩减,大学校园已经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宽阔的国际基础上在内部被政治化和分成几部分。而且高等教育的未来常常被认为可疑,过去很少这样。1976年,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举行了一次有关高等教育的未来的研讨会。主持那次会议的前日本文部大臣永井道雄新近写了一篇悲观主义的预测的文章,引用黑格尔的话,“当薄暮降临时,密涅瓦(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开始它的飞行”^①——那就是说,当白天即将结束;因此知识来得太晚没有多大实际价值。我在会议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高等教育的新的曙光正在破晓,以更多的方式为更多的人服务,比过去任何时候对他们有利。

“冰河时代”的说法被抛弃,赞成“新的视野”,高等教育正在上升,不是下降,而且正在增加预期无限的新的职能——会议报告人综合我的议论成为一个“无限职能”的主题。我相

^① 永井道雄:《薄暮前的一只猫头鹰》,1975年版。

信,这将是下一个世纪全世界整个高等教育的一个继续不断的重大主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我们又处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悲哀的十年。财政资源,特别是对于公立高校,处于危险之中。过去一个世纪,我们经济生产率的增长处于低点。其他为公共资助的竞争者——诸如我们基础结构的整修,以及帮助儿童和青年——需要更大(而且常常这样是对的)。由于教授的脱离教学,校园里政治上的争论,各种各样的丑闻,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已经降低,再一次出现新的“冰河时代”的恐惧。但是,问题不仅仅来源于外部。校园里有“唯我的”一代和“政治上正确的”一代的教授成员——这两个一代人具有十分不同的思想,本书第十章所提到的公民训练的职能常常被忽视。校园较少地是一个社会,更多的是一座没有建成的通天塔(Tower of Babel)。比如说,由于这一切理由,20 世纪 90 年代结果比 70 年代更加是一个“忧患的时代”。在 70 年代,校园的政治化是学生造成的,那个时期大约持续一个世代(五年);在 90 年代,校园的政治化是由有终身职位的教授领导的。经济危机也是短期的——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崩溃以前大约五年;在 90 年代,生产率的增长处于更加深刻的衰退,而且巨大的国债不易早消除。在 70 年代,种族的整合仍有希望;在 90 年代,不断增长的分离成为持久的事实。70 年代是一个短期失望的时期;90 年代是一个预期中的较长的“忧患的时代”的时期。^① 所以,在 90 年代,较难有信心地考

^① 克拉克·克尔:《美国高等教育的忧患时代》,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虑长远的趋势。但是,尽管在 70 年代,危机几乎更加是全球性的,因而看来好像几乎比较反映普遍的发展,在目前,否定的期望由于它自己的原因几乎比较局限于美国。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十年都曾经像 70 年代和 90 年代。80 年代看到高等教育经历人口统计上的繁荣,而不是预期的萧条。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是一个校园欣快症的时期,一个无限前景的时期。历史上的其他的时期曾经被认为比较好,另外的时期比较坏。我们需要一些历史的观点的意识。除了重大的期望和巨大的恐惧的周期以外,什么是世俗的趋势呢?很多十年,在它们出现的时候,需要在几个世纪的背景中来看。本章就是对这种比较长远的前景写的。

高等教育,像多数的人类机构一样,总是在转变——有时比较快,有时比较慢。当前这个时期,以相对地迅速的转变为标志,不是以转变本身的事实为标志。但是,我们的时期是独特的,与其说是因为转变的迅速,不如说是更多地因为转变的方向。

我的核心问题将是当前的转变的方向——从什么到什么?我的评论是纯理论的,因为,尽管我们对我们曾经是在哪里甚至我们现在是在哪里有一些概念,但是对我们正在走向哪里去并不能肯定。然而我们希望知道,既是出于好奇,又是为了我们能够试图指导这个过程,或者至少有效地适应这个过程。

但是,我想预先指出,高等教育在过去比大多数其他的人类机构改变得都要少。它当然比国家改变得比较少,在过去八个多世纪来比经济事业单位改变得要少。早先的波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仍旧可以辨认,而且它们同时代的高校仍然

以几分相似的形式在运作。很多或者甚至多数,当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经济的机构能够这么说。

这使得我相信,今天的大学,像昨天的大学一样,也许比社会的其余部分的大多数改变得少;这是一种相对静止的机构;它并非或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接近于衰败,或者像其他人希望的那样接近于一次重大的改造;它将继续变化,但是比它周围的社会变化得要少。

为什么大学,它在历史上曾经是高等教育内部的占优势的机构,是一个相对地持久的机构,有很多好的理由。它具有某些持久的目的,包括保存过去人类发展的记录。还有,多数社会大部分时间都曾经给大学特别程度的自治以处理它自己的事务。法国需要一个拿破仑,或者德国需要一个希特勒,或者俄罗斯需要一个斯大林征服大学,即使在那时,一些自治的成分幸存下来。

给它自治,大学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对它自己的事务高度保守的机构。教授处于事业的中心。而且,听任教授们自行其是,他们很少改革。他们主要按一致意见管理校务,听从他们年长的成员,而且经常赞成同事们不应提出可能造成不和的有争议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保持现状。总的说来,学生接受教授的职务上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来来往往相对地迅速。行政人员倾向于给予较少权力,他们也是来来往往。这两种潜在的变化的来源通常是沉寂的。

超出这些因素,自从发明印刷术以来没有基本的技术上的变革影响大学的运行;虽然新的电子设备可能产生这种基本的变革。另外,超出一定的不过分的规模,没有巨大的规模的节约,因而大学没有变成像有些政府和经济的事业那样

庞大。

如果以上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们正在研究一个相对地稳定的机构的演进,这种机构除了它周围的社会经受一次革命以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巨大而又突然的起伏。所以,除非发生一次社会革命,或者发生某种其他大变动的的事件,我并没有预见预示大动乱的变革。

现在,我想首先讨论我并不认为正在发生的转变,很多舆论正相反,然后其次,讨论我确实认为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转变。

让我指明,我将主要谈论美国,而且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十分不同于在别处所发现的特征。因为在美国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在别处发生,或者在任何别的地方将会发生。美国的模式不再是从西欧的模式衍生而来,而且它们并不必然构成别处能够仿效的模式。

但是,高等教育确实具有某些跨越很多国家的共同的成分。它是许多机构中最具国际性的机构。教授成员、学生和思想在各国之间以只有商业和工业中的最高级人员的流动、原料和成品的流动,以及技术的流动可以相配的方式来来往地流动着。因而,高等教育比多数其他人类努力的领域的有组织的活动更加是一个国际的社会。

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有很多特别相似的成分。两国都是非常重视它们教育系统的先进的工业社会。在主要工业国家中,它们和苏联一起,在第三级教育方面有着最高比例的学生。但是,日本和美国在决定它们的招生人数时响应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响应管理部门的规划。这两个国家也十分独特,在它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有强大的私立部门,而且大量地

利用两年制学院。因此,它们具有比通常更多共同的东西,包括某些共同的问题。

黄金时代到冰河时代?

在美国,今天(1976)一个占优势的观点是,高等教育已经经历了它的最好的日子,现在正经历着它的最坏的日子,还有更多坏的日子要来;高等教育爬上了最高的群山,现在正在下降进入最低的山谷。这个观点一部分是正确的。

大约从 1945 年到 1965 年是一个黄金时代。高等教育的人学人数极大地扩张。有三次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复员军人入学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战争之后和越南战争之后。公民权利革命把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带进高等教育,很快更高比例的妇女跟着进入高等教育。在这些当代具体的发展以外,高等教育正从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随着赠地运动缓慢地开始的大众化入学阶段,走到一个普遍入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一个具有最低限度的技能要求,或者甚至只有一张文凭的中学毕业生,如果需要,保证可以得到一些财政资助,并为他们保证在某所第三级学院得到一个学额。

大学的科研开支,基本上来自联邦政府资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起开始扩张,然后,在前苏联人造卫星的挑战以后继续扩张。在 60 年代早期,大学的科研开支以每年递增 15% 的速度上升。

创办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个州都建立了社区学院。

师范学院成为综合性学院。很多学院加添了哲学博士学位，除了历史上的十所或二十所研究型大学以外，不少大学真正成为科学的“卓越的中心”。

高等教育从事巨大的公共利益事业，享受很高的公众的信任，而且获得大量的新的财富。

在美国历史上，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进步。这样的进步决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再次发生。结果，出现了我一度称做“成功的危机”的事情。学生的浪潮被容纳，并没有新的浪潮在望。做出了巨大的科研进步，至少这些进步一时似乎竭尽了现有的可能性。像为巨大的经济增长时期训练了大量有技能的人员一样，培养了大量的学校和学院的教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一些过剩的训练能力。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批评社会——关于公民权利，关于越南战争，关于环境的恶化，以及很多其他事情。总的说来，尽管批评被接受，甚至起了作用，批评也受到忿恨。有一些重大的胜利，但是它们现在已经过去，而且它们有着一些代价。新近的重大胜利使得目前的比较不过分的成就看来好像相当的失败，旧时的胜利成为看起来是新的失败的背景。

但是别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在劳动力市场给大学毕业生支付的工资级差大量地下降。出生率在有记录的历史上达到它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更少未来的学生，因而也就是更少教师的需要。新的优先考虑事项吸引公众的注意。一次衰退和一次萧条减少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岁入，也减少私人的收入。

因此一个冰河时代被某些人预测，被很多人害怕；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已经正在感受到冰河时代。有人提出，入学人数将下降 40% 或者甚至 50%，消灭私人部门的大部分；生活

那么经常集中在校园周围的个人,可能声名狼藉,而且将继续声名扫地;教授薪水实际上已经下降,而且将保持下降;科研经费实际上已经下降,而且将保持下降;州和联邦机构的控制已经大大强化而且将保持强化。也许在美国历史上,在高等教育中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在凝视将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少的希望。

也许,但是也许并不。新近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比较报酬已经下降,但是它们已经降到 50 年代中期的水平,这种水平至少是适度良好。而且,就业所得到的高于开始的薪水,得到一个职业,它将产生未来一生的收入。一个职业所得到的比收入要多,有纯净的满足;一生的所得比一个职业要多,有全面的满足。无论如何,上学院还是“值得”的。结果,很可能入学人数将稳定而不是将下降。

用于学生奖学金(复员军人除外)的联邦和州政府的资金仍旧在上升,在州的一级上升十分迅速。联邦政府的科研和开发资金现在实际上稳定。甚至稍有增长,而且恰好低于它们历史上高峰的水平。州的高等教育经费(它们是大学资助的主要来源)在学生运动期间,不只是在总数上而且作为个人实际收入的百分比都已提高;各州对公众的意愿十分关心,公众对教育仍有高度评价。

除了黄金时代的最重要的年代以外,今天高等教育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处于较高的资助和活动水平,而且至少有两个新的高峰仍旧要攀登——联邦和州对学生的资助(除了复员军人)和州对私立院校的资助。在历史上,高等教育难得既有那么好的资助,又感到那么不愉快。

确实看来,高等教育社会正如它在 60 年代过分欣快,现

在在 70 年代过分沮丧。那时,现实并不像它在学者心目中的形象这么好;现在,今天它在学者心目中的形象并不这么坏。黄金时代多半是黄金。但是,宣布的新的冰河时代只是跟有点霜差不多。

旧的视野和新的视野

真正的转变是朝向要做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对太新、太多和太不相容的饮食有点儿不消化的问题。转变是从有限的和或多或少的学术职能到无限的职能的转变。高等教育(或者,更好地,中学后教育或第三级教育)越来越被利用在任何被认为可能对私人或公共福利做出贡献的地方,而且有时不注意贡献的学术内容。高等教育现在较少地属于学术行会和上层阶级,较多地属于广大公众。

高等教育的漫长的历史,包括一个从少数职能到很多职能的延续几个世纪的运动,最初缓慢地增加,但是比较新近,迅速地增加。早期的大学开始是目的有限的机构——主要地从事专业人员的训练,诸如律师、会计和办事员,帮助不断扩张的商业和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波洛尼亚大学);或者学者和牧师的训练,帮助教会从黑暗时代恢复过来(巴黎大学)。后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在一个比较文明的贵族统治兴起时,增加了“绅士”的教育;在民族国家变得比较重要时,增加了高层公务员的训练。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独立地做

学问逐步地发展,社会批评家的职能也逐步发展。近代大学从增加科学研究和训练有技能的人应用新的工业技术开始,近代的军事科学被用来鼓励这些发展。服务的职能主要的是科学的一个副产品。

在美国,现在新的职能正在增加,但是并不是单独在美国:

(1) 社会公平的促进。促进机会的均等(和间接地促进挣得的收入)现在是一个清楚的目的。为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普遍入学和肯定的行动是两个主要的方面。

(2) 生活质量的促进。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在他们整个一生为了消费和生产的目的是接受教育。高等教育越来越少只是为成人就业作准备,而越来越多成为一个人整个一生的一部分。大学校园正在成为主要的文化生活中中心。

(3) 政治改革的促进。超出学者风度的批评,展现着有组织的政治改革的尝试。从1968年至1970年出现了通过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政治改革的规模最大的尝试。在现代社会,未来的尝试是地方性的。(高等教育的政治化能够,而且在某些地方也确实由社会的主要人物采取利用高等教育的机构的形式进行直接的政治灌输。)

展望未来,至少展现两个新的职能。

(4) 对青年的剩余责任。青年是一个主要没有得到某种有组织的方式关怀的比较大的群体,另一个比较大的群体由“无结构的”劳动力市场的参加者组成——没有得到家庭的关怀,没有得到福利公司或福利联合会的关怀,也没有得到福利国家的关怀,这个群体常常处于社会机构之外。高等教育越来越为这种青年提供一个“椭圆形盘旋”(holding pattern,

飞机在机场上空等待腾出着陆跑道时所作的飞行方式。译者注)(在军事上这样做)教育与工作和社会服务经验的更好地整合清楚地即将到来。

(5) 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正如永井道雄曾经提出过,前面可能还有考虑全社会和长远需要的职能。^① 全球的问题变得更加相互联系和复杂。并非市场,并非官僚政治的计划,并非社团的行动,并非专门化的科学研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某种对很大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机制,因为这将在最高层次进行持久的思考。这个潜在的职能既对科研又对课程具有明确的含义。其他新的职能可能被一些人认为包含高等教育的庸俗化和大众化。但是这个新的职能的含义是明确地精英主义的。

早先的(而且在继续的)一系列高等教育的职能多数是关于:①专业训练;②考虑个人的道德和行为;③进行专门化的科学研究,这些职能本质上是比较学术性的。有些新的职能,虽然不是全部,是比较准学术性的——和学术上的努力有联系,但是只是部分地围绕学术的原则和标准进行组织;但是有一个新的职能,关于社会未来的有组织的思考,具有最高的学术性。

比较旧的一系列职能比较以生产为导向,比较新的一系列职能比较以消费和社会改革为导向。比较旧的系列职能也比较以个人努力为导向,比较新的系列职能比较以集体行为为导向。比较旧的系列职能也多半与图雷内(Alain Touraine)所谓“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有联系;而比较新的系列职

① 永井道雄:《薄暮前的一只猫头鹰》,第44页。

能更加强调社会秩序的改造。改造的职能比较有争议,而且比再生产的职能更加难于既整合进高等教育又整合进社会。

另外,比较旧的职能合情合理地彼此一致,或至少变得彼此一致,虽然在研究学问和职业训练和道德灌输之间和中间总是有一些紧张关系(学者对智者派对道德主义者)。比较新的系列职能已经引起另外的紧张关系。政治改革职能和权力关系大,和真理关系小;福利职能和需要关系大,和业绩关系小;消费主义者职能和个人利益关系大,和道德行为关系小。

我提出这些职能作为描述的事情。不是作为提倡的事情,虽然我确实提倡某些职能的某些方面。(见表9)

当前改革的多数创新,像早先一样,来自高等教育以外。在历史上,专业人员的训练,公务人员的训练,技术人员的训练,甚至绅士的培养,都是外部引起的。科学首先也在学院的园林以外开始。也许只有人文主义学问和社会批评的职能可以说主要地在内部发生的。现在,政治改革的努力也是在内部发生的。因此,这些职能可以说是自我选择的职能,它们对教授的愿望是最核心的,对社会必然是最正当的。但是,每一个比较旧的由社会选择的职能都已经内化。比较新的职能(政治改革主要地除外)也多数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来自公共政策或来自消费者的利益。它们现在正在被内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非常痛苦,正如在大约从1820年至1890年期间科学进入美国古典的学院和大学一样。

表 9 有限的职能和无限的职能

比较旧的系列	比较新的系列
专业训练	社会公平
个人道德和行为	生活的质量
专门化的科学研究	政治改革
	对青年的责任
	整合的思考
重点	重点
学术性的	准学术性的
生产	消费
个人行为	集体行为
再生产的	改革的
全部	全部
部分地一致或者至少	不一致的和在某种程度上
相容的	不相容的

高等教育与其说是社会的一个发源的部分,不如说是社会的一个响应的部分;而且它必须响应很多至少最初它并不喜欢的东西。现在,艰巨的任务是,在维持学术的完整性和保存提高科研和高层次专业训练的精英职能的同时,吸收新的职能(“整体思考”的职能可能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高等教育有新的顾客——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和成人;新的争议——对于既定的社会给予支持,进行改革,还是甚至

予以破坏；新的课程——一方面补习性的课程，另一方面，空闲时间的兴趣；新型的教师——更多兼职型教师和更多应用型教师；新的评分标准——既避免学生失败，又奖赏胜利；新的入学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标准；新型的学位和证书；新的财政和管理方法；新的鉴定方法——英国一度称做“金本位”的方法不再足够；新的机构——大学不再具有这样一个中心的任务。

作为所有这一切的一个结果，很可能有更多有具体目的学校（诸如美国的业主专有的学校）和在综合性大学内部更多主要有独立的具体目的的单位。在我一度提出的同样的势力中，有一些势力引起“多元大学”，现在这些势力正在把其他类型的学校和所有高等教育分成几部分——不只是大学。在同一大学以内同一单位以内发展将比较少，而在老大学的新单位和新的大学发展将比较多。

充满着混乱，分化职能、协调学校和部门更加困难。冲突增加，比较新的学校挑战比较老的学校。问题也在激增，现在什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和受教授控制的？现在什么应该是“大众化”的和受市场或公众控制的？^①政府应该资助消费和政治的职能，还是只资助生产和福利的职能？一所大学应该试图包含很多职能，还是应该涌现几种专门化的学校？一般的说来，可以说明，公共政策将需要越来越走向职能的分化，财政资助模式的分化，管理机制的分化。

^① 见马丁·特罗在所著《美国高等教育的精英职能和大众化职能》一文中的讨论，载尼布利特主编：《高等教育：需求和反应》，伦敦，1969年版，第181—201页。

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可能暂时稳定,但是职能正在扩张,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后者是更加重要的现象——目的的迅速积聚。这是我们现在被卷入的转变的方向——职能已经扩张,目的已经分化。离心力正在取代向心力。高等教育较少地是社会内部的一个一元的成分;第三级教育更多的是全社会的一个方面。“学习的社会”正在到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将更加全面分布在整个一生和很多高等学校。旧时的学习机构在数量上变得比较不那么重要,虽然它们在社会中质量上的地位可能提高到作为生产新的思想和培养最高层次的专业人员的中心。

这意味着一个创造性的时代,一个前进而不是紧缩的时代,一个可能进步和不是不可避免倒退的时代。柏拉图说过,“教育的车轮一旦启动,速度总是不断增加”^①。我认为这是指导教育的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原则。我们目前就处在一个“教育的车轮”的速度调整到一个历史性的加速度的漫长的时期之中。

① 柏拉图:《理想国》第四卷。

第十四章 高等教育和外部历史 不能彼此回避

以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当前周围社会的演进正在冲击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很多方式中的几种：①迫使高等教育比过去更加鲜明地朝向既服务于民族国家又服务于普遍的学术界；②使高等教育比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强有力地面对由于对遗产、对平等和对功绩的承诺所提出的有冲突的需求；③向高等教育提出挑战，要求寻找不是单独适合精英的高等教育而是要适合大众化和普及的高等教育要求的结构；④社会恰恰在本身更加意识到它的道德上的困境的时候，因此要求高等教育更加直接地面对道德问题；⑤社会由于要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多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因此要求高等教育重新考虑它的使命和目的。

在美国，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强化的要求，以及由于高等教育机构比作为同一的实体更多地通过它们的各个“社会阶层”^① 做出反应，高等教育

^① 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型，1960—1980》，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造”。^①

(1) 对于在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提出的进行更多科研的要求,教授们热情地做出反应,使大学成为马奇卢普(Fritz Machlup)所谓“知识产业”^②的核心部分,并创造我曾经取名的“联邦拨款大学”^③。在这个过程中,专门化缩小了文理科学学习的范围。教授市场变得更加成为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而且在影响机构行为方面更有力量。(德国的教学自由[*lehrfreiheit*]的影响上升到新的高度。)

(2) 对于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更加有技能的劳动力的要求,学生们迅速地和进攻性地作出反应,选择更加以专业为导向的课程和专业(德国的学习的自由[*lernfreiheit*]的影响也上升到新的高度)。

(3) 对于联邦政府实体所引导的给予少数民族、妇女和社会其他处境不利的分子更多机会的要求,大学校园的领导多数由高层行政人员提任,他们既适应历史的必要性,又适应他们自己的同情心。

这些创新都是外部的,但是反应却是内部的——每次反应由校园的一个不同分子,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领导。经过改造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很多人塑造的——没有一个分子能够单独索取荣誉,或者受到责备。

但是事情有它的反面,而那一面是正面——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在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也已经发展了一个

① 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的伟大转型,1960—1980》,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编导言。

② 马奇卢普:《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③ 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章。

重要的第四个维度,而且在这里创新多数来源于大学的内部。

(4) 大学主动地直接冲击社会。最特别的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大学已经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中心。那个中心不再由人民主义的农民或工人组成,而是由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所谓“敌对的文化”(adversary culture)组成。他看到一个“以大学为基地的”艺术和思想的“敌对文化”^①。他注意到我的关于他确定为“超级大学”(super-university)的讨论。^②他说这种讨论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种情况的未来的合理的投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那么世俗和实际,或者是那么稀有和奇怪,以致大学不愿进行同情的考虑。”当大学和现实发展了一种“最亲密的关系时”,大学应该部分地成为社会的一个“批评的方面”,这是自然的,而早先大学却“扮演保守主义的堡垒的角色”。现在相反,“敌对文化……已经形成……一个阶级”而且这个阶级“不是没有权力”;而且它的基地是大学。

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指出,“思想常常导致异议”。它所以这样,因为思想不仅包含真正的东西,而且也包含正确的东西;但很多也是错误的。阿伦特写道,“思想本身是危险的”——“对一切信念危险”,而且它导致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并因而在知识分子中导致一种“无家可归的情况”^③。然而思想又是人的本质。因而,作为具体的结果,发展了60年代的学生反叛和90年代的教授领导的“政治上的

① 特里林:《超越文化》,1965年版。

② 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二章。

③ 阿伦特:《思想》,纽约,1977年版,第176、199页。

纠正”。学生和教授中的政治活动分子组成的“社会阶层”是其中的发起者。

所以社会已经搬进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已经搬出进入社会,或多或少同时发生。

(5) 高等教育甚至更加普遍地已经成为新知识和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为中心,而且知识现在使世界出现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样四处活动:新的技术;新的理解——像关于环境;新的态度——像对于人的发展和人权;新的技能——像在专业服务和公共操纵一样;对过去和现在许多实践的新的批评。

知识原先是为了真理起见(例如亚里士多德),然后为了对自然的权力(例如培根),然后为了国家的领导(例如拿破仑和洪堡),然后也为了个人的能力(例如杰弗逊),然后为了领导的素质(例如纽曼),然后为了金钱(例如富兰克林和马奇卢普和一切工业社会),现在为了所有这六项(和其他目的)一起。结果,对于知识和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最中心的无论什么机构必然是对整个社会更加是中心的,而且和整个社会更加缠绕在一起。大学曾经是一个城邦,像汉萨同盟(中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以德意志诸城市为主——译者注)和意大利的商业城市,主要是自治的。现在更像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而且屈从它的法律和法庭,但是对国家并非没有影响。

因而高等教育既不能回避历史,社会的历史也不能回避高等教育。现在高等教育是新的思想,更高的技能,文化的传播,个人抱负的提高和满足,不同意见的表达,以及领导能力的创造的最大的独一无二的来源。高等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作为一个结果,更少脱离社会,而且在将来这很可能越来越正确。

跋：回顾与前瞻

有那么多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仍旧想要母校永不改变——包括很多男校友、很多教授成员、一般公众中的很多人。事实上，母校确实比社会多数其他部分较少改变，这是母校钟爱情结的一种控制——但是母校也确实在改变。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我自己读本科的斯沃思默学院回到它恰好在大约1930年时的样子，我读研究生的伯克莱大学回到大约1935年的样子——在每一种情况，留恋过去的追溯，黄金时代中的最好的时代：但是我同样愿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随着时代而改变，甚至在一些改革中带头。当然，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完美的，但是未来必须更好。

为了说明在本世纪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多少变革，并提出在下一个世纪可能发生多少变革的问题，以下有两篇有关我所熟悉的大学的概略。有关其他变革的指标，见表10。

另外的人会熟悉其他一些校园，可能很好地反思它们的历史替代。这种反思可能将至少导致以下这些观察：

(1) 回忆起的母校几乎总是在改观的过程之中；

(2) 改变的东西受到某种有意识的控制；

(3) 由于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纪，对于那些处于有影响的地位的人，很可以问一下下面的问题：我们最想保存什么遗

产？我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拥有对如何探讨这些问题作出决定的最好的机构吗？我们有什么机会，我们如何能尽量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如何能尽量利用我们未来的历史？

在当代历史的过程中母校如何变革

斯沃思默——1900

学院有 200 名学生，多数来自美国中部和大西洋沿岸各州。半数是公谊会成员，贵格会教徒可优先入学；其他学生多数来自主要的新教各派，偶而有一个犹太教的人（通常一个或两个）。按照贵格会教徒的惯例，学生男女各半。考虑到很多学生来自农村，设置了家政和农艺课程，而且校舍的一部分仍旧包括农庄房屋。为没有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办了一所预备学校——有些农村地区没有中学。教员 30 人，指望教员是知名人士，有些教员确实是“知名人士”。

课程是标准的人文学科、文学和科学，在比较职业性的领域，设有教育学和工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语言中是重要的课程；历史侧重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英格兰和美国——现在称做“西方文明”的有限的形式，集中在美国公共机构的起源。强调宗教。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是必修课程。每天早晨必须参加宗教仪式，读基督教《圣经》，举行贵格会的默祷。要求全体学生在礼堂参加星期日礼拜，不管他们的宗教偏爱如何。

课程涉及到贵格会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设置了灌输“良

好公民品德”的课程——社会科学的学生研究社会问题如“犯罪和惩罚,精神病患者,贫穷和慈善事业,经济公寓,酗酒,黑人问题,社会新住宅区。”19世纪80年代有一门国际法课程集中体现“和平与仲裁内容”^①。

表 10 统计描写

	斯沃思默		伯克莱	
	1900	1990	1900	1990
教员				
校长任教	是	是	是	是
标准专任工作量(每周时数)	12	9	12-15	5
专业学院教授和文理学院教授比	0.11:1	0.06:1	0.28:1	0.86:1
学生教授比	7:1	9:1	20:1	17.6:1
设教务长职位	否	是	否	是
每一专任教授联邦科研经费(美元)	0	6700	145	23750
课程				
概况中课程门数	100	800+	500	3000+

① 《斯沃思默学院概况》。

	斯沃思默		伯克莱	
	1900	1990	1900	1990
必修课程 a	5	0	2	3
学生				
本科女生与男生之比	1:1	0.9:1	0.85:1	0.87:1
研究生百分比	0	0	10	40
少数民族本科生百分比	0	11	0	58
领取校、州、联邦财政资助学生百分比	24	47	3	本科生:48 研究生:72
职员				
非学术性职员与学术性职员之比	0.3:1	2.7:1	0.4:1	2.4:1
公共关系和筹集经费职员人数	0	28	0	138
学生辅导专家人数	1	9	1	约 400b

所有数字系最好估计数。来源包括概况和其他学校文件以及个人通信。

a. 必修课程：

斯沃思默, 1900 年：

圣经文献:旧约全书,新约全书

英语:修辞学和作文

数学和天文学:立体几何和平面三角

体育

斯沃思默,1990年:“分类课程”要求,但无具体的必修课程。

伯克莱,1900年:

男生:体育

军训

女生:体育

伯克莱,1990年:

大学要求(如入学时未修过):

Subject A(英文作文熟练)

美国史和制度

伯克莱校园采取拓宽课程要求。1991—1992年实施:
美国文化(若干门论述美国历史和社会中的种族、文化和
种族问题的整合性和比较性的课程之一)

b. 负责本科生事务的副校长办公室的专任职员。包括
非主科学术指导、就业计划、研究生院指导、学生学习中心、
EOP和集体指导。略去保健、心理、学院、系以及宿舍指导等。
在伯克莱校园,各单位都设置指导员。

有力地实施养父或养母地位的工作:

不喝酒,不抽烟,不玩牌。

乐器只是新近才被允许在校园使用——1895年有
第一架钢琴。

每天要求有一小时体育锻炼,必须上体育课。

每天晚上在晚餐前在客厅举行有指导的一小时社交活动。允许青年男女在客厅社交活动时间和在教区会堂的门廊彼此交谈。

不允许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学院房屋及其附属建筑、基地等同行，也不允许“在同一个雪橇上滑行”。

所有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在学期中，未经特许不得离校。

行为报告和学业成绩报告一起寄交家长，包括进餐时间迟到。

在这个制度下，男生由校长监督，女生由女学监监督。在那些日子里，和在别处一样，女学监在校长之后，是校园的第二把手，而且是“正确关系”的指导。斯沃思默大约到这样的地步，以“火柴盒”闻名，因为有那么多学生彼此结婚——毕竟的确在社交活动时间有在客厅彼此交谈的机会。

体育运动很重要，运动队被叫做“小贵格会教徒”，宾夕法尼亚队作为“大贵格会教徒”。迟至我在校的时间（1932级）我们仍和海军、陆军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比赛。两个主要联合会投手，奥格登（John Ogden, 19号）和厄恩肖（“Moose” Earnshaw, 23号）最初为斯沃思默比赛；橄榄球的马克斯韦尔奖是以传说的斯沃思默的马克斯韦尔（“Tiny” Maxwell, 07号）的名字命名的。

学术方面的管理已大量地掌握在教授手中，包括一切课程事务。在学术领域以外，控制也有力地以管理人（董事）部及其委员会为基地。董事部全部由公谊会的成员组成——全部是开明的贵格会教徒，因而半数是男性，半数是女性。董事部第一批非贵格会教徒（两人）是1938年任命的。董事部根

据一致的意见运作,如果做不到,经充分讨论后按大家同意的执行。董事部成员多数来自费城、巴尔的摩和纽约。

有一些职员为全体学生和教员所熟悉,而且有广泛影响,如1900年的警卫员海曼(Johnie Hayman),后来在我的学生时代的电话接线员——所有悲伤过度心碎的人的知己艾米(Amy)和拉夫(Ruff)——男子体育运动教练员,和有求必应的优秀个人指导。

学校总图书馆藏书14000册。

每年膳宿学费400美元。

毕业生大量地进入医学、法律和教师的职业,以及比较新的工程职业。

斯沃思默——1990

斯沃思默在九十多年里逐步地发展,但是在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e)院长任内(1921—1936),斯沃思默也有过一次“再生”的经验。艾德洛特曾经是一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爱上了牛津和英格兰。他主持美国罗兹基金会很多年。他因把英国的“荣誉学位”制度引进斯沃思默而为众所周知。从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中,挑选能力最强的学生修习荣誉学位课程,每学期举行两次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实在是集体辅导班(标准的研讨会规模是六名学生),而且经常在教师家里举行。每个学生每周提出一个报告,通常采取书面方式,供其他学生和教师讨论。两年结束时,由校外主考人举行笔试和口试。这种课程做几件事情。它给斯沃思默一个新的和独特的个性。它吸引了一个在学术上更有才华的群体,这又转过来吸引在学术上比较有才华的教师。斯沃思默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一样,早就欢迎信奉犹太教的成员进学生和教师群体。

斯沃思默在 1990 年在吸引具有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AT)和美国大学测验(ACT)最高分的学生方面,在学院中仅次于威廉斯学院,并且和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一道,在 2400 所非专门化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位居前八名。斯沃思默于 1900 年在旧道德方面领先;1990 年,在竞争剧烈的院校中领先。

艾德洛特不止把荣誉学位制度放在适当的地位,他还排除了一些“次要的”科目,如修辞学。修辞学教授被派到牛津进修一年,“专攻”米尔顿的教学。艾德洛特聘请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他还强调所有学生都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而且,当我在校时,除校内的体育运动外,40%的男生和女生参加学院间比赛,“健康的心灵寓于健康的身体”。“第一流”的旁观者消遣的体育运动的重要性被降低。

斯沃思默开始从中部大西洋各州以外吸收学生——1990 年,40%的学生仍旧来自中部大西洋各州,但是总的说来,来自 48 个州和 41 个国家。越来越少的学生(和教员)有贵格会的背景,在学院的生活中,旧时贵格会家庭的作用减小。基督教教友会的聚会所已经远不是校区生活的一个中心。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贵格会的传统,包括在斯沃思默社区内部比一般更加努力对他人忍耐和理解,对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革的强烈的承诺,以及(特别在董事部内部)努力于意见一致的决策。

艾德洛特领导的大改革对个人的一个后果是 20 年代后期对他的一次造反——反对减少学院的宗教倾向,反对体育运动重点的改革,反对把学院的学术方面放在首位,反对艾德

洛特在与董事部和教员的争论中占的优势。艾德洛特勉强地胜利了,而且从此成为斯沃思默历史上的大英雄。他的成功是惊人的,因为这发生在一所要不然是以意见一致为基础而且在结构上强烈地反对院长权威的学校。艾德洛特不是引起“会议意识”的“会议的秘书”。贵格会教徒没有传道士或牧师。但是,斯沃思默有它的艾德洛特。

斯沃思默在学术上变得更加著名,它也变得更加庞大。1990年有学生1300人,它不再是一个人人相识的面对面的社区。像别处一样,它也变成更加以性别、种族和少数民族的界线分成几部分,在情感上部分地这样划分,因为在一个这样规模的校区,学生难以形成完全孤立的群体。1990年,有半数学生继续是女生,但是,在全体学生中,有5%是非洲裔美国人,3%是亚裔美国人。3%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只有少数(3%)有贵格会关系。不再有任何养父或养母地位的规则。学生被劝告,不是受巡查。

现在开设的课程和研讨班有800种以上,不是100种。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古典的课程几乎已经全部消失。巨大的改革是,第一,科学的兴起,然后,新近增加了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活动课程——对生活上比较爱享乐反感的严肃的贵格会教徒的态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90年,共有教师200人。他们都从事大量的科研工作。很少人住在斯沃思默自治市,更多配偶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生涯,几乎没有人参加星期日礼拜。教师像历史上那样完全支配学术事务——艾德洛特年代除外。院长再一次必须慎重考虑,看看什么权力,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与教师和董事部以及其他行政人员分享(学生将不分享任何他们的独立性)。

1990年,图书馆有藏书70万册。学费、膳宿费每年21000美元。补习课程已经取代预备学校。毕业生多数仍进入历史性的职业——甚至更是这样。在校园不再含着眼泪唱“亲爱的母校”。对成就的羡慕取代了对从前贵格会教徒的社区的慈爱。

伯克莱——1900

如果说斯沃思默是一所英国式的学院(贵格会式),伯克莱乃是一所德国式的大学(强调赠地)。伯克莱之所以是德国式的,在于它强调科学研究和古典学科,以及对个人独立性——没有学生宿舍,很少校内体育设施,很少养父或养母地位的规则——只有反对偷窃,破坏财产和欺诈的规则,禁止在距校区一英里以内出售烈酒;但是它是赠地式的,它有一所很有名的农学院(每年举办八十到一百次由教师领导的“农民讲习班”),它还强调大学间进行的运动会——两者对公众都具有吸引力。校长惠勒(Benjamin Ide Wheeler, 1899—1919年在任)是德国留学生(海德堡大学博士)和德国文化的一位爱好者——这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巨大谴责。董事多数是着重赠地的。

伯克莱于1900年创办的过程中在学术上已经足够出名,成为美国大学协会的十四个最早的会员之一。它有力地走向更多的哲学博士学生——从1890年至1900年博士生人数增加10倍。只有哈佛、哥伦比亚和耶鲁有更多的研究生。伯克莱的专业学院包括建筑,并开始新的专业“东方研究”。惠勒校长在他的第一次年度报告(1900)中说,伯克莱的学位保证获得赞誉,伯克莱是“加州的骄傲”。

学生总数 2200 人——研究生占 10%——只有哈佛、哥伦比亚、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学生总数较多。60% 的伯克莱学生来自两个县(旧金山和阿拉米达,阿拉米达包括奥克兰和伯克莱)。另有 20% 来自农村地区,因为他们的父亲被列为“农民”。只有 4% 来自别的州。他们几乎都来自公立学校,而东部规模大的私立大学大量地从私立学校招生。几乎半数学生是女生——伯克莱总是为男女青年提供平等的入学机会。

全校对男生惟一的课程要求是体育和军事科学,女生是体育。但是,三所“普通教育学院”,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我们现在称做“分类要求”的课程,多数在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合起来几乎等于全部课程的一半,五分之一的上课时间分配给主课,五分之二分配给选修课,选修课新近在哈佛首先倡导。很多分类要求实在是一个课程名单中的“半选课”。正如惠勒校长在他的第一次报告中说,伯克莱当时像在它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实行“以合理的保守主义为特征”的教育政策。70% 的学生是在“学术性学科”方面——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比例,30% 在职业领域。力量雄厚的职业领域是农业、医学、工程和商业。45% 的女生准备当学校教师。在接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的比例方面,加利福尼亚只是在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马里兰之后。伯克莱的学生,几乎惟一根据中学校长的推荐入学。

学生生活大量地由学生管理。强有力的学生联合会管理体育运动计划和书店,并主要负责学生纪律。班级成员很重要,二年级学生欺负一年级学生,四年级学生有单独为他们安排的座位。大学生联谊会和大学女生联谊会大约包括全体学生的 10%。其他学生或者住在家里,或者住在经过批准的私

人办的供膳的寄宿舍。在惠勒任校长期间,女生学监在影响学生生活方面,仅次于校长,是校园的第二号人物。全体学生至少名字都熟悉的教授,在20世纪早期有两位特别有名——一位是在希腊剧院讲授莎士比亚的盖雷(Charles Mills Gayley);另一位是讲授近代欧洲史的一门普通课程的斯蒂芬斯(Henry Morse Stephens)。每月举行两次有教授和校外报告人参加的大学会议,由校长主持。

学生费用据当时计算,在任何主要大学中属于最低的,远低于哈佛的费用。学费免收,很多学生住在家里或者房租合理的供膳的寄宿舍。

教员共110人。只有30位正教授(占27%),讲师40人。全校本科生课程500门,或者每位教师差不多五门。标准的教学负担是12至15小时。教师多数来自美国东部的著名研究生院。图书馆藏书有不同估计,约8万至10万册。哈佛有60万册,哥伦比亚30万册。

管理大量的是在董事手中。影响最大的董事是赫斯特(Phoebe Apperson Hearst),他捐赠了若干座主要校舍,而且主动提供第一个校区计划。在惠勒以前,校长们保存所有房间的钥匙,指定教师的办公室面积和上课的教室,向董事报告每位教师完成课堂教学任务的时数和学生上课情况。惠勒获得任用照管房屋的工友的权力,假如他迅速把他的行动向董事报告。惠勒做到使董事宣布,所有教师和董事通讯应该通过校长,而不通过个人接触,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就惠勒的人格来说,他是校区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大演说家,而且学生和教师很容易接近他。他骑一匹白马在校区周围巡逻,停下来倾听学生和教师的请求,从马背上做出决

定,不用和任何委员会或任何职员磋商。他的影响比他的正式的权力所指示的影响要大得多,他曾经在海德尔堡大学被人介绍是“从一个民主国家的君主来访问一个君主国家内的民主”。

伯克莱——1990

在九十年间,伯克莱变得几乎比以前著名得多,规模大得多,又比以前多样化得多。早在1964年,在由美国教育理事会主持的一次调查中,伯克莱被评为“美国发展最平衡的著名大学”,而且在后来大约每隔十年一次的两次调查研究中得到证实。它不再只是十四所最有名的大学之一。这种发展早在国内战争之后大学从南方聘请著名教授时开始,接着在科学方面特别是化学在刘易斯(G. N. Lewis, 1912—1941)和后来物理在劳伦斯(Ernest Lawrence, 1927—1958)的领导下,继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荣誉全面地增加几乎和科学方面已经存在的荣誉相匹配。在1964年时,伯克莱所有被评估的系(共二十九个系)全部被评为全国前六名。

伯克莱变得规模比以前大得多——1900年时学生2200人,1990年时,增加到31000人。来自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学生多于来自其他地区的学生;15%的学生来自其他各州;7%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研究生占全校学生的40%。本科生的入学管理现在比较科层化,多数根据中学的等级,但是也根据学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美国大学测验)分数,而不是根据中学校长的个人判断。1900年时,现在所谓的祖籍英国人大约占本科生的100%,但是在1990年时只占42%(亚裔美国人29%,非洲裔美国人7%,西班牙裔美国人15%,其他7%,包括外国

留学生)。

到 1990 年,学生生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学生团体”,而是一系列以性别、种族和民族地位界定的飞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非常活跃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始,校园生活已经变得非常政治化,接着是在 30 年代围绕经济变革和世界和平的争论的鼓动继续政治化,到 60 年代的“自由发表运动”(言论自由已经充分得到保证)时代,政治化大大加速,然后在 80 年代,随着强调性别、种族和民族问题继续政治化。一个受害者是大学的会议,现在很少开会,部分地由于学生活动分子破坏的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参议员麦卡锡时期,由于 1949—1950 年的宣誓大争论和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教师变得高度政治化。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大学由于对学生生活的政策从德国模式改变到英国模式(在赠地大学中加州大学是最后一所大学进行这种改革的),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修建了学生宿舍(现在容纳单身学生 4600 人,有家属的学生 1020 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学生会会堂,体育运动和娱乐设施大大地扩充。学生开支,包括各种费用,现在估计加州居民每年 7200 美元,非加州居民 13000 美元。

教师 2000 人。不再指望,也不可能做到,多数教师会很熟悉他们自己的系以外很多教师,更不用说熟悉全体教师,而且系已经成为多数教师接触的自然单位。非常多的教师有很强的校外关系,靠喷气式飞机和传真机的帮助当咨询和学者。对有些人,真正的母校是首都华盛顿的资助机构。现在多数教师住在伯克莱以外,而且多数教师配偶都有她们自己的工作。现在校园更少是一个面对面的社区,更多是很多事业中

的一项事业。在里根任州长期间,生师比大大恶化,从每个教师 14.7 个学生增加到 17.5 个学生。正教授占全体教师的 63%,讲师占 13%。没有一个教授普遍为学生所熟悉。农业不再是校园的中心,工商管理现在处于更加中心的地位。相反,新的重点是生物科学——未来的荣誉更多要依靠这里的发展,而不是别的任何地方。

现在本科生的课程有三千多门。体育和军训的要求过去了。相反,学术评议会授权,学生选修一门论述种族民族问题的课程,作为惟一的全校本科生都要学的课程。现在伯克莱在强调“多样化”方面是学术上的先锋。图书馆有藏书 700 万册,与哈佛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道,被评定为全国三个最大的大学研究型图书馆之一。

管理已大大地改革。伯克莱只是加州大学九个校区之一。在 1900 年只有伯克莱和若干专修科单位,包括基本位于旧金山的一所医学校,惠勒校长曾经认为“控制不了”,可以脱离关系。1990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在一个总体规划(1960)之下,与社区学院,加州的学院和大学进行了调整。董事会放弃全部项目控制。每个校区的校长具有比 1900 年时大学校长决不会梦想的,多得多的最后权力。现在,校区的校长是有权力的新人。教师评议会在惠勒校长任期结束时,在 1919 年的“革命”中已经接管了大部分决策权。从那以后,教师管理比全国别的任何地方更加坚强。现在没有一个人骑一匹白马绕着校区巡逻。

到 1990 年,斯沃思默和伯克莱在学术上都已经变得更加出名了,也更少致力于古典文化和更多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了。在理智的努力方面更少一般化,在一切方面更多

专门化。较少强调信仰,较多强调理智。两校也都变的更加大了,在它们的构成上更加多样化了,不那么统一得像社区了。养父或养母的地位已经过去,政治上的行动主义得到强化。管理上更加充分分享;较少属于个人管理,较多属于科层管理。每所学校更少是一所独立的和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城邦(或村邦),更加和社会成为一体。在精神风貌上较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尚,更多是后现代风尚。

但是 1990 年时两校仍旧可以认出它们是本来的样子的后裔。两校都承认它们的传统。斯沃思默作为一所仍旧具有一些贵格会风味的英国式的学院,伯克莱作为一所仍旧具有对公共服务的某种承诺的德国式的大学。两校仍旧是美国高等教育精华的榜样。两校仍旧正在美国社会内部发展。两校都将在 21 世纪继续变化,而且,再一次地以不能预先完全预期的方式变化。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